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图例

-  省、自治区、直辖市界
-  县(市、区)界
-  乡、镇(街道办事处)界
-  铁路
-  高速公路及编号
-  国道及编号
-  省道及编号
-  县道及编号
-  设区市界
-  县(市、区)界



2014 · 07, 4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跟随罗荣桓挺进东北 林月琴 04

【峥嵘岁月】

在另一条战线上
——解放战争中的华野总留守处 老后方 09
怀念陈若克同志 刘锦如 14
沂蒙山腹地游击战 耿玉衡 17

【名人素描】

国士——牟宜之 卞文超 梁胜楠 21
宰相王导 清风慕竹 25

【文化掇英】

被历史遮蔽的辉煌
——确认刘洪为珠算发明人始末 靖一民 30
临沂出土文物之青瓷胡人骑兽烛台 高 昂 35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6

【蒙山沂水】

“东莞”地名南迁与青、徐士族南渡（一）
李 沅 43

【探索发现】

临沂钩沉之符氏巾幗 高 雷 49
司马牛与邱輿 王庆全 54

【典籍考辨】

清“乡饮介宾”《执照》《司照》解读 凌东晓 56

【影像沂蒙】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略影——
挺进东北 本 编 58

【诗画赏析】

《王岱之墓志》与《兰亭序》真伪之争 王炳毅 60

【史料辑存】

日军侵华文献：华北治安战肃正讨伐的一般要诀
大好河山 62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周姓（中） 赵丹峰 65

【沂蒙名医】

冷家女儿心最热
——感受冷飞燕 刘凤才 71

【沂蒙乡亲】

“翻译女神”杨梅 高雪萍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青瓷胡人骑兽烛台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青瓷胡人骑兽烛台》）

封底：明·王世贞《清明雨中过穆陵关》/胡石 书



地 址： 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 276000
电 话： 0539-8727560
邮 箱： 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 <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 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跟随罗荣桓挺进东北

林月琴（罗荣桓夫人）



林月琴，1914年1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小商人家庭。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35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率领妇女工兵营担负筹备粮草，运送弹药等繁重、艰苦的人力运输保障任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担任过粮食局妇女运输连连长，后调中央卫生所护理班任班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经何长工同志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2月，调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1937年5月，与罗荣桓结婚。

1938年5月，林月琴同志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机要处秘书、党支部书记。1939年3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直属队分总支书记。1941年4月至1942年底，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1943年1月任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政治协理员，1948年5月，林月琴创办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并任校长。

解放后，林月琴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兼罗荣桓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林月琴受到打击迫害。1978年5月，林月琴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顾问。

林月琴同志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第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

林月琴1955年9月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11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90岁。

(1945年)10月24日,我们从临沂出发。荣桓、罗生特大夫、我和警卫员一部车,机关分乘几辆卡车。当晚在莒县停了一宿,第2天到达诸城。由于胶县由伪军摇身一变的国民党部队所占,诸城到胶县的公路不通,我们只好在诸城住宿。

第3天是徒步行军,荣桓坐担架。在过胶济路以前,一次行军休息时,医务人员照例从荣桓的担架上将尿血的瓶子拿出来,一面晃动,一面察看。机要科一名新调来的小同志看到了,惊讶地小声叫了一声:“血!”荣桓亲切地看了看他,微笑地摇摇头说:“小鬼,不要喊呀!战士们流血牺牲都不在乎,我尿点血有么子关系?”

过铁路的那天晚上,正在急行军,突然荣桓的担架断了,队伍不得不停下来。警卫部队立即派出了警戒。管理处长何敬之同志连忙派人随向导到附近村子里找门板。由于护送的部队不大,停留的地方离铁路又近,大家都为荣桓的安全担心。可他却十分沉着,反而安慰大家,叫大家不要着急。他再三嘱咐去找门板的同志,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要打借条。

找门板的同志去的时间不长,就听到村子里狗叫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便于部队夜间活动,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狗都打光了,可这一带以前是敌占区,村子里还有狗。俗话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顷刻间,远远近近的村子里都传来狗叫。有的同志担心惊动敌人,荣桓却风趣地说:“现在不是日本投降以前了。现在,狗一叫,敌人会吓的更不敢出来。”

受到他沉着、镇静的气度的感染,同志们才不那么紧张了。事情也真被他说中了,果然是平安无事。等到找门板的同志回来,绑好担架上路,夜已经深了。

11月5日,我们到达黄县龙口,一进码头,只见岸边是一队队等着上船的部队,港湾内外,满眼是船,其中小汽船很少,大部分是帆船。嘈杂的人声和喧嚣的涛声交相震荡,一派繁忙景象。我们上船之前,许世友同志赶来送行。

荣桓和许世友同志早在陕北就互相认识。许世友同志在延安进“红大”学习时,听过荣桓的课;荣桓也在那时就知这是一位带传奇色彩的战将。他们先后到山东,在工作和战斗中很快互相熟悉起来,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临分手了,荣桓问许世友同志:“你留在山东了,有何打算?”

“准备打仗。”许世友豪迈地回答。

荣桓点点头,紧紧握住他的手。停了一会,他指着身旁的枣红马,说:“把它留给你吧。”

这匹马陪伴他已经四五年了。但自从他尿血以后,由于身体虚弱,却很少骑。在上个月大反攻时,各线战事都比较顺利,但就是临沂城迟迟未打开。他当时很焦急,曾不顾病重想骑这匹马到前方去。同志们对他再三劝说才作罢。这次要进军东北,护送的骑兵部队又将他这匹马带到了龙口。现在他要渡海,将这匹战马送给许世友同志,也可以算得是物得其主了。

许世友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怔了一下,便随手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从腰上解下来,双手托着,回赠给荣桓。

荣桓渡海乘的是一艘小汽船。同船的有参谋处长李作鹏、保卫部长苏静、供给处长何敬之、卫生部副部长王雨田、罗生特大夫和他的英文翻译方政,还有上述人员的家属。我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和肖华同志的小女儿也都在这条船上。机关人员和部分警卫队分乘另外5艘汽船。

为了防备在海上碰到美国军舰发生麻烦,我们穿的都是胶东区党委准备的便衣。荣桓穿的是长衫,化装成商人。我穿的是一件旗袍。记得我还是在家乡当小学生时,穿过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参加革命后,15年过去了,从来都是短装,此行穿上旗袍,还真有点别扭。至于警卫人员的枪支,有的掖在怀里,有的用绳子绾在船尾水下,既不易被发现,也



罗荣桓与林月琴
在东北

便于万一情况有变时，可以立即提上来使用。

起锚时，龙口海湾里风平浪静。我们都站在甲板上同送行的人群招手，观看着缓缓后退的码头。人群、房屋越来越远。海岸终于成为一片山峦。同志们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齐鲁大地，告别了根据地的父老乡亲，都有些恋恋不舍。我们这个船队速度比较快，超过了两边一艘艘帆船。在甲板上纵目远眺，汽船、帆船星罗棋布，可真是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景象十分壮观。当海岸终于消失，四顾茫茫一片的时候，起风了。浪头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已经逐渐散开的帆船象树叶一样在波峰浪谷之间，时隐时现。我们这艘汽船此时也象喝醉了酒，不住地摇晃。一个大浪打过来，船于是大起大落。甲板上开始有人呕吐，我也感到恶心。同志们纷纷退进船舱，咬着事先准备好的防晕船的咸菜疙瘩。但是不管用，一个吐开了，象是传染病一样，我们都跟着呕吐起来。

我也象当时渡海的大多数同志一样，第一次坐海船。不仅如此，这一次数万大军的渡海行动在我军历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次。而这一波澜壮阔的行动是在没有气象预报、缺乏通信联络、没有导航设备的条件下进行的。几百艘渔船，十来艘汽艇，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启锚了。尽管许多人呕吐了，有的船只漂到鸭绿江口，有的漂到兴城，还有漂回山东又渡过去的，但这一壮举终于在几个月之内胜利地完成了。

在我们这条指挥船上，不晕船的只有荣桓、罗生特大夫和一个警卫员。荣桓以前对我说过，1926年他从青岛到广州，坐的就是轮船。那是一条货船，载人的船舱都在水下，又拥挤又闷热。许多人都吐了，但他没有吐，他走上甲板吹海风，一点也不晕。想不到20年过去了，他得了重病，仍然适应海上航行。

荣桓一向爱干净，这时便忙开了。他和那个警卫员一会儿打扫船舱，一会儿去倒痰盂。我这时已经晕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忙活，却帮不上手。

船长看到他去倒痰盂，忙走过来阻拦：“首长，别倒了。吐在地下不碍事，待一会儿我们来扫。”但他不听，仍然在忙碌着。

下午，在渔船左方出现了岛屿。有的警卫员挣扎着要到船尾去守住枪，万一遇到敌人，他们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参谋们忙告诉他们不要紧张，对他们说：“一个多月以前，部队还没有渡海，胶东军区许司令员就派部队把内外长山列岛都控制起来了。这些岛上都设有兵站。”

汽笛长鸣几声，汽船缓缓地靠上一个岛屿的码头，船长告诉我们，这叫砣矶

岛。由于风浪太大，汽船要停泊在这里避风。我们都下了船，当晚在兵站住了一宿。

第2天清晨，风势稍减。有的同志看到晕船的人太多，建议再歇一天。荣桓不同意，他说：“不行，时间宝贵，越早到东北就越主动。晕船嘛，苦一点，可死不了人。”

船队又启航了。开始船身还象摇篮一样晃动，不久，风浪越来越弱，汽船平滑地向前行驶，我感到头不怎么晕了。傍晚时分我也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而荣桓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甲板上。他向参谋要来地图，一面听船长介绍，一面对照着地图看着从眼前掠过的大小钦岛、城隍岛等大小岛屿。过了不久，日落了。在汽船左方，殷红的太阳在海面漂浮着，比平时要大得多。满天彩霞映照到海里，把这壮丽的海景装点得更加气象万千。同志们大部分都跑到甲板上，默默地欣赏着这灿烂辉煌的海上落日……

半晌，只听得陪伴荣桓的船长说：“过了城隍岛，就算离开山东了。前面不远就是旅顺口。”

荣桓顺着船长指的方向用望远镜观察着。过了一会，他又往右转了一个角度，看了好一会，指指前面，问道：“那是什么？”

船长举着望远镜看了一会，回答说：“是一条军舰。”

听到他们的话，我也将视线转向东方。暮霭之中，只见海天茫茫……又过了一会，我也看到了。首先看到一闪一闪的灯光，接着看到了越来越大的黑糊糊的舰体。这艘舰艇正朝我们驶来。荣桓放下望远镜，回头吩咐大家都回到舱里，他对大家说：“有一艘军舰正向我们开来，还不能判断国籍，如果是苏军的好办。万一碰到的是美国的军舰，大家一定要沉住气，不要慌。现在，按预定方案分头作好准备。”

大家立即忙碌起来，晕船的也都振作起精神。警卫人员都上了甲板，有几个人守住船尾，随时准备将水中的武器拖上来，其余的都掖着短枪，站在两舷。机要人员准备好火柴、煤油，随时准备销毁文电和密码。供给处长也将携带的黄金，分散藏在船舱里。

军舰上机器的隆隆声越来越响，探照灯光柱在我们船上扫来扫去，两艘船越来越近了。这时，已经看清楚，是苏军的巡逻艇。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情绪由紧张转为好奇和兴奋。靠舷以后，一位苏军军官用俄语说了一通。我们船上的俄语译员翻译道：“苏军舰长问我们是什么船。”

“告诉他们我们是运输船。”荣桓对翻译说，翻译大声作了回答。

“船上载的是什么人？”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翻译又将荣桓的话译成俄语。

巡逻艇上喊道：“你们上来一个人。”

荣桓派苏静同志带翻译上艇去交涉。不一会儿，苏静同志回来报告：“红军艇长请罗司令员过去谈谈。”

于是，荣桓带了一位警卫员和苏静同志一起登上了巡逻艇。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又从巡逻艇上回来，荣桓下令，船队按第二方案改向东走。那艘巡逻艇掉了个头，鸣笛数声，向北开去。

开船后，荣桓向大家谈了刚才上巡逻艇的情况。

他们刚上艇时，苏方表现并不热情。因为荣桓穿的是长衫、戴的是礼帽，那艇长似乎不大相信他就是山东军区的司令员。为了消除他的疑问，荣桓让警卫员从皮包中取出一幅照片给艇长看。这幅照片还是红军刚到延安时拍的。这位艇长认出了毛泽东同志，也认出了荣桓，立即站起来，向荣桓敬了一个礼，并说：“司令员同志，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请原谅，我是在执行任务。”

于是，艇上的气氛融洽了。这位艇长还让水兵端出咖啡招待。在谈话中，这位艇长说，虽然苏联在外交上承认国民党的政府，但根据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并不阻止八路军在东北活动。我们这支船队可在除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港口登陆。



听了这番话，我们才明白，那艘巡逻艇向北是返航旅顺口，而我们这支船队却要向东，绕过大连湾，再北上到黄海岸边寻找港口登陆。

我们在貔子窝登陆以后，荣桓立即吩咐何处长联系去沈阳的火车。当时，日本投降不久，苏联红军只占领了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我们也刚刚到，一切工作都没有头绪。因此，我们在貔子窝等车皮就等了两天。第3天，好不容易来了一趟火车，还是运货的闷罐车。我们上去一看，车厢里到处都是马粪、草料，可能是刚刚运过马匹。荣桓急于赶到沈阳，同已经于9月到达东北的东北局彭真、陈云等同志见面。他决定，不再等了，就乘这趟车走。于是，我们便大家动手，七手八脚将车厢打扫干净，在地上铺上马褥子，放下背包，大家就挤坐在这闷罐子车内。有位同志皱起鼻子，闻一闻空气中仍然残留着的马粪味，耸一耸肩膀，说了一句：“到了东北，还坐这号车！”荣桓听到了，便劝解说：

“嘿，坐火车比走路快多了。我们到东北，不是来享福，是来打仗的，今后，还要靠两条腿走路呢。”

11月13日下午，我们赶到沈阳后，荣桓立即向东北局报到，同彭真同志和林彪见了面。

相关链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8月中旬以后，蒋介石即调集大批军队，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步向华北等解放区推进。至9月中旬，国民党已调集了37个师、73个旅的兵力，准备向解放区进攻。

根据形势变化，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部署》。命令“山东主力及大批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20日，中央再次致电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执行，越快越好”。由此，一场时间紧，任务重，我军历史上空前的部队大转移展开了。

根据中央的部署，山东分局立即对山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以罗荣桓带领山东主力部队6万人和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内要组织调动大部队和大批干部去东北，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去往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大部分要通过海运，而当时解放区内只有一些木帆船，运力有限，安全也很难保证。为做好海上运输工作，山东军区专门成立了海运指挥部，由许世友任总指挥，并在龙口设立了海运办事处，专司龙口、栾家口的海运工作。

从10月初到11月底，山东军区先后分三批将主力和基干部队调往东北。除第一批部分人员从陆上出关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海路运送的。在缺乏现代运输工具而时间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将数万人的部队从海上运送到东北，无疑是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但是，由于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部署得当，指挥正确，再加上全体官兵的积极努力和山东人民的大力支援，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任务，这不啻是一个奇迹。



在另一条战线上

——解放战争中的华野总留守处

老后方



解放战争时期乔信明在沂蒙山区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在江苏中部地区同12万国民党军展开激战，连续取得宣泰、如南、海安、李堡、丁林、邵伯、如黄路等7次战斗的胜利，歼敌5万余人。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此后，战局向华中转移，中央军委决定调动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主力给进犯解放区的敌人以迎头痛击。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1946年9月华中野战军主动向山东北撤，诱敌。

已瘫痪四年的原苏中军区二分区副司令乔信明原准备随徐海东、张爱萍、刘炎等同志到大连休养。但一纵叶飞司令员深知乔信明在一纵干部有相当的威望，就把乔信明接到一纵队（叶飞纵队）后方留守处休养。叶飞司令员说，乔信明只要住在那里就行了，具体工作由顾复生负责。

当时一纵队的后方留守处驻在沂蒙山区蒙阴县的北楼村，离孟良崮不远。1947年2月莱芜战役胜利后，华东战场进入一个新阶段。蒋介石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开始向蒋家王朝所在地江苏的近邻——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蒙阴县一带即将成为战场，后方人员必须立即转移。后方人员奉令到渤海区，一纵队后方由乔信明负责带去。

由于蒙阴县在沂蒙山区，转移时留守处全体人员走的都是山区的沙土小路。汽车之类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自然没有，马车也没有，甚至马匹都不多，只有几辆牛车拖着行李和妇女儿童，能行走的人员都徒步行军，有的孩子和行李由民工用独轮车推着，有的孩子分别放在两个篮子里，请民工挑着走。乔信明因双腿瘫痪，只能骑马行军，上马下马都要警卫员抱上抱下。尽管自己病痛在身，他还不忘记吩咐警卫员前后照顾有困难的同志。在准备过黄河的大路上他们突然遇到国民党飞机扫射，同志们立即散开。幸好只有行李车被打了几个洞，没有人员伤亡。跨过黄河后，留守处来到李庄。乔信明带领留守处的同志们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做了一些民运工作。



中间坐着的为乔信明，
右二为其夫人于玲

粟裕委重任，留守支前线

1947年春夏之交，到渤海几个月后，华野司令部转移到渤海。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尚未结束，外线出击的新任务又开始了。一天，乔信明突然接到要他立即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谈工作的电报。他想，我不能打仗，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电报不会发错吧？他又仔细看了一遍，没有错，立即坐着担架前去。经过一天一晚才到达司令部驻地，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司令部各个房间里烛光闪闪，人影绰绰，滴滴嗒嗒的发报声音与嘀铃铃的电话声交织在一起，指挥机关一片繁忙景象。乔信明的担架刚进庄子，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把担架抬到这里来！”接着一只有力的手伸过来和他握住了。

“路上辛苦了吧？”

“粟司令！你还没休息？”

“蒋介石不批准嘛！”粟裕同志诙谐地说。

粟裕同志看他在炕上坐定后，就说：“你大概也很想快点谈工作吧？我们就抓紧时间吧，你不感到疲劳吗？”

“不疲劳，又没走一步路，倒是你太累了！”

“我吗？抢着时间就是胜利！”他回头对站在一旁的警卫员交代说：“谈完工作，你们首长立即就要回去，你们快去准备担架。”然后他就和乔信明亲切地谈了起来。

粟裕司令员亲切地对他说：“我们主力已外线出击了，要打大仗，打恶仗，要和蒋介石进行决战。歼灭他的主力。司令部马上要走，这里留下一大摊后方机关，有几万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动员到前方去。现在各纵队和总部都有自己的后方，有的以师为单位，甚至还有以团为单位的。他们都各自为政，其中有小部分人员，思想也比较混乱：有的认为部队要开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去了；有的则认为又要二万五千里长征了；还有极少数人有保命思想，不愿上前线；南方人过不惯山东的艰苦生活，想回江南去。诸如此类思想的产生，都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造成的。同时要注意到，这里是新解放区，还有敌特活动，环境极不安定，要和地方配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决定成立一个华东野战军后方总留守



处，由你负责，当然还要给你配备一些干部的。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分散在各地的后方机关迅速集中，整顿组织，整顿思想，减少前方后顾之忧。一段时期以后，还要办妇女大学，提高文化水平。我们华东的女同志，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们原来都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不搞学习，她们会苦闷的，她们决不会愿意在后方坐等胜利。所以要办大学，为她们进入城市工作做准备。……”

乔信明依靠栏杆站了起来，非常高兴，但是仔细看他的两个脚，脚掌却未能着地。

乔信明以前一直战斗在第一线，打仗是内行，却从来没有搞过后方工作。开始他也担心自己挑不起这副庞大复杂的重担，但粟裕同志鼓励他说，前方各部队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老战友，他管理后方不仅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能使他们放心。乔信明就象过去接受艰巨的战斗任务那样，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地开始了新的战斗。

1947年9月，在渤海正式成立了华野总留守处。乔信明任留守处负责人，资凤任政委。那时八九个纵队在后方，如：一、二、三、四、六、八、十及两广纵队，还有总部及野卫留守处共十个大单位，共有4.2万多人。各纵有医院、仓库、教导团、炮兵团、荣归团等。

当时后方的情况的确很复杂，首先是敌情严重。正如乔信明在自传中回忆的那样：

“我们的驻地所在地区是新解放区。驻地就有土匪特务活动。敌人占领小清河（现山东滨州市附近）后，土匪特务封建帮会更大肆活动起来。后来我们就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联防，巩固后方。”

其次是组织乱。各纵队后方各自为政，很分散。总留守处的领导机关成立仓促，没有基础，又限定了时间集中，因而既要忙着建立总留守处，又要了解各纵队的后方情况，所以开始集中时是很混乱的。

在乔信明和总留守处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下，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将分散在渤海东南数县地区的各纵队后方机关全部向指定地点集中。总留守处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决定了当时总留守处的三个任务：

（1）整理各级组织。规定一律以纵队为单位组织留守处，每个纵队只有一个留守处，统一领导。把各纵队自己的医院、仓库、教导团、炮兵团、荣归团和以师为单位、甚至以团为单位的后方机构，统一重新组织整顿，形成以八个纵队为单位的后方留守处和华野直属机关后方和卫生部的后方医院等十大单位。

（2）清理登记各纵队仓库资财和各种弹药及其他物资。响应中央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



总留守处幼儿园的孩子们

号召，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来路不明的经济收入还公；第二，贪污来的经济收入缴公；第三，刻苦节约下来的经济收入自愿献公。乔信明不仅自己带头捐献，还带领同志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有积蓄的同志捐献。最后小公家和私人经济收入及其他物资还公、缴公与献公的总和折算成本币为16255942268元即162.5亿多元。

(3) 动员能去前方的指战员及事务人员去充实前方。总留守处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加强战争观念，一切为前方服务，尽量减少后方人员，减轻人民负担，充实前方。动员了大批同志到前方，到军大及随军学校学习，炮兵、教导团、医院、荣归团等全部到二梯队。结果，在三大方案结束时，总留守处全部人员还不到一万人（留下的只有女同志、小孩子、老弱残废三种人）。

更要命的是当时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一些人对战争形势认识不足，对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不理解；对由苏中撤退到山东，特别是由鲁中撤到渤海，不理解，发牢骚。针对这种思想情况，乔信明和总留守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开展了“三查三整”的学习运动。当时有一、四、六三个纵队的家属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家属队，上至司令员夫人下到营团家属都编在一起。就是“把妇女组织起来学习了”。

经过三大方案和土改三查学习，改造了一些人的不良思想，改变了对当前革命形势认识不清所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不合理的随员按制度精简掉了，加强了劳动观念。后方人员开始集中在一起时，有些同志互相看不起，不团结，后来经过一年多学习，对过去的许多观念有了些认识，大家都开始要求进步，要求学习，要求工作了。有一次战斗中有五个团级干部不幸牺牲，这些同志的亲属一时情绪波动很大，乔信明和总留守处同志做了细致的安慰工作，终于她们情绪稳定下来，也使部分女同志改变了怕丈夫在前方打死了，而拖后腿的情况。

当时总留守处有一些解放过来的残废人员，自恃打仗负伤残废了，就寻衅闹事。乔信明得知后，坐着担架赶去制止。他说，你们这点残废有什么了不起，我都几年不能走路了，还照样工作，你们有什么资格闹事。闹事者一听，自知无理，便不敢再闹了。

兴教办学培养儿童，教育妇女

当时后方有许多学龄儿童，尤其是两广纵队来了之后，有不少孩子都十二三岁了，却因为没有学校而无法受到正规的教育。而总留守处有许多可以当教员的女同志想工作，却没有合适的工作。乔信明夫人于玲看到这种情况，便向乔信明建议办一个子弟小学。乔信



总留守处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



总留守处子弟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

明到前线向陈毅和粟裕同志汇报工作时，便提出了这一想法，两位首长非常赞成，并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但当乔信明提议子弟学校用陈毅同志的名字命名时，陈毅同志却谦虚地拒绝了。后来总留守处又办起了幼儿园。这个子弟学校由王延青任校长（他是日本留学生，在延陵战斗中用日语喊话时，左臂负伤截肢，丧失了一只胳膊。他一直坚持工作，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于玲任副校长，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在聊城段家店时，子弟学校买了十亩地，给学生种大白菜。既加强了劳动观念，又解决了部分生活问题。

1948年6月曲阜解放后，总留守处迁到曲阜。于玲因生孩子已经不当副校长。到曲阜后，校本部搬进了孔府，幼儿园在孔府的花园里，前面住着警卫连。条件大大改善，还为孩子们修建了秋千等娱乐设施。

那时，前方缴获的东西，凡是后方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适用的，就都送到后方来。这样就使后方的同志在吃小米、高粱、窝窝头的同时，还能吃到五磅一听的美制铁罐奶粉；孩子在穿土布衣服的同时，还能穿上美制童装和羊毛线衣。

接着，遵照粟裕同志的指示，准备开办妇女大学。当时女同志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共1000多人，组成了文化大队。于是组织扫盲，高中生当老师。前方战斗很激烈，有时正上课，突然传来消息有人的丈夫牺牲了，于是哭成了一片。为了办好妇女大学，还曾调了文学家黄源同志、数学家孙克定同志和会计学家顾准同志等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当教员。但由于其它工作的需要，他们来了不久，就因新的任务而离开了。但是从这些行动中却使我们看到了粟裕同志办妇女大学的决心和要求。妇女大学终于在1948年秋正式办起来了，章蕴同志担任校长。

解放战争结束后，总留守处妇女大学改名为华东妇女干校。

后方办学，在战争年代是件新鲜事。前方的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妻子、儿女在这样紧张的战争环境里还能上学读书，进幼儿园。所以，每当战争胜利的间隙，根据粟裕同志的指示，让他们夫妻儿女在驻地“会合”时，前方的同志看着提高了文化的妻子；拉着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孩子，抱着白白胖胖、逗人喜爱的婴儿，无不深深地感到党组织的温暖和领导的关怀，在前方艰苦作战的辛劳，一下子都消散了。同志们把对组织的一片感激之情，化作了与敌人拼死决战的勇气和力量，又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之中。

华东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就这样在另一条战线上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怀念陈若克同志

刘锦如

陈若克同志是我于1939年离开革命圣地延安，1940年转战山东抗日前线时认识的第一位女同志，当时若克同志是山东分局组织部的组织科长和妇委委员。她是我的亲密战友、好同志，虽然她比我小八九岁，但她对我这外地来的同志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政治上的关怀，工作上的帮助，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她生前和我相处虽仅仅两年时间，但她那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全部青春的崇高形象，几十年来，在我的心底和头脑中时常萦绕，给我极大的鼓舞。若克同志于1941年因临产期，在日本侵略军大扫荡中被俘，壮烈牺牲了。

我和若克同志一起工作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她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她是工人出身，曾在上海橡胶厂、纱厂、毛巾厂等工厂做工。抗日救亡运动的

风暴唤醒了，她16岁参加工人斗争，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加抗日活动而被工厂开除。1938年8月1日在山西晋城和朱瑞同志结婚。在党的培养教育和朱瑞同志的悉心帮助下进步很快，她的好学精神和上进心是可贵的，她善于学习，善于思考问题，在当时妇委成员中，她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与众不同，往往站得高、看得远。我记得在1940年夏天的一次妇委会议上，她分析了山东妇女运动的特点，说：

“山东是孔夫子的圣地，旧风俗、旧习惯封建势力是顽强的。在日照、莒县一带，有三四十岁的老姑娘不嫁人家，听到八路军来了，就被家长们



作者简介：

刘锦如（1910—1992），陕西省延川县人。1934年7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陕甘宁边区妇联组织部长，是陕北最早投身革命的妇女代表之一。1939年9月受命调往山东工作。1940年任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常委、执行委员，省妇联组织部长，山东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等。1945年在省妇救会改称为省妇联的妇女大会上被选为山东省第一任妇联主任及华东妇女联合会执委等职。

她曾与陈若克同志共同生活、工作、战斗。此文为她生前所写。



朱瑞与夫人陈若克

藏起来。”若克同志一方面指出工作环境的困难，另一方面又鼓励大家要有信心，要足够地估计到群众要求抗战的愿望和积极性，她出主意、想办法，提出山东的妇女组织要多样化适应当时的社会特点，要组织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妇队、识字班和姐妹剧团等。她说：“妇女救国会是中年和老年妇女组成的，如何发动青少年妇女，要通过青妇队、识字班和姐妹剧团等广泛地宣传教育，发挥青少年妇女的积极作用是妇救会的一项艰巨任务。”在朱瑞同志、若克同志的支持、鼓舞、具体领导下，1941、1942年间，山东妇女工作很活跃，发展是很快的，农村中普遍组织了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妇队、识字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男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支前和后勤工作全都落在青少年妇女和儿童团的肩上。担架运输、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信等全由青少年妇女和儿童团担当。青妇队、识字班还培养了不少妇女干部和英雄模范人物。如1949年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董力生同志就是获得“担架英雄”称号的女同志，她光荣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山东省妇救会是1940年7月份成立的。当年冬天以甄磊、大辛（辛锐）同志为正、副团长的姐妹剧团成立了。在妇委的具体领导下，她们演出过许多街头剧、小话剧、歌舞等，如为了反对买卖婚姻演过《小女婿》，反对婆婆虐待儿媳演过《我老娘骑着小毛驴把亲家母瞧》。省妇救会出过一些小报和刊物，如《山东妇女》在1942年出刊，出版过两期，后因战争关系停刊了，1946年复刊，1947年又停刊。还编写过一些妇女手册和识字课本等。当时山东的妇女工作取得的可喜成绩是与朱瑞同志、陈若克同志的关怀、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

我和若克同志于1941年11月初，在沂南的一个村庄——苏村镇附近永远分手了。当时情况很紧急，山东分局得到情报，敌人在沂水、蒙阴、临沂三个县集中了五万多兵力，大扫荡将要开始了。分局紧急动员，大部分妇女同志和老弱病残者都要疏散，有的到群众家里去或到地方组织中，有的化妆掩护。工、农、青、妇的领导同志到基层领导民兵，和基层干部一起进行反扫荡，牵敌主力，掩护我军部队转移，进行坚壁清野，投放地雷、手榴弹，扰敌和阻止敌人的扫荡，保护我军民的生命财产。

当时组织决定我和妇救会的宣传部长戈明同志（刘居英的妻子）随机关行动，因若克同志临产期已到，随卫生部上了大崮，但不幸在部队撤退中被敌人俘虏了。据敌工人员（我们潜伏在临沂城内的同志）讲：当时警卫员扶着若克同志突围时被冲散了，警卫员没有了下落，若克同志被俘。因敌人不知若克同志是朱瑞同志的爱人，打得伤势很重，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了。在被抬进宪兵司令部的时候，惊动了一个被俘的女护士杨以淑，她曾在过去的一年里看护过若克同志，这时她从被押禁的屋里冲出来，伏在若克的头前悲痛地哭起来。若克从容坚定地象平时批评同志一样劝导杨以淑：“哭什么，我们既是中国人，就有中国人的苦痛，哭有什么用！”

若克同志被俘后两三天，生下了女儿。敌人得知她是山东分局书记的爱人后，为了争取她、软化她，给她和孩子送来了许多罐头、牛乳，但她仍不说话，也不吃饭，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让吃。据后来脱险回来的杨以淑回忆，敌人一遍又一遍地严刑拷问陈若克：

“你是哪里人？”

“说我是哪里就是哪里！”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打日本，救中国的！”

“你的丈夫是谁？干什么的？”

“我的丈夫是抗战的八路军！”

若克同志的态度始终如钢铁一般的坚硬，这使敌人恼羞成怒。过了两天，敌人借口替她治病把她抬走了。

几天后，大约11月二十几号听汉奸们传说日本鬼子枪毙了三个女的，其中有一个抱着小孩，“太凶了，脾气太坏啦！审了几天，闹了几天，一点结果也没有，……还喊口号唱歌呢！”听了这些话，所有在场的难友们都沉痛的低下了头。

当我们听到若克同志壮烈牺牲的不幸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但敌人的扫荡还在继续，省委和群众团体的许多同志还未归队，谁死谁活也不清楚。我和戈明同志先从泰山区转回沂蒙山区，去看朱瑞同志的时候，我们看出他的内心十分悲痛，但他还是那么沉着、镇静。他告诉我们秘书长谷牧同志受伤，政府的秘书长陈明夫妇都牺牲了，组织部长李林同志受伤，其爱人甄磊（姐妹剧团的团长）也牺牲了。我们要求设法将若克同志和牺牲的同志们的尸首找回来，朱瑞同志劝我们不必了，牺牲了的同志，有的可能尸首也找不到了，我们知道她们死得壮烈、伟大，她们人死了，精神没有死，没有辜负党对她们的培养、教育，她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她们的牺牲是党的光荣、人民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自豪。尽管朱瑞同志这样劝我们，但到12月初，由做敌工工作的同志通过地方关系，把若克同志和婴儿的尸体运回后方，安放在沂南县于家辛庄于大娘家。

朱瑞同志派通讯员把我和戈明同志找到于大娘家。当验尸时，我们谁也看不出是若克同志了，衣服全部破烂了，头部全是血和泥。只是看到同志们在安放尸体时，把孩子放在若克同志的怀中抱着。但有一条裤腰带，是结婚时朱瑞同志送她的礼物，是苏联产品。于大娘是个抗战的老人，共产党员，若克同志生前和我们常到她家去，我们大家多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她和我们同样悲痛。于大娘说：“我将若克同志埋在我的菜园子里，每天我能看到她。”于大娘请了几位民兵，在她的菜园子里挖了个坟墓。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开追悼会，只是朱瑞同志、于大娘、戈明同志和我四个人，怀着仇恨和悲痛的心情，把若克同志埋在这块永远难忘之地。如果她还在这里埋着，我真想再去看望这块不平凡之地，因为在沂河两岸洒尽了许多烈士的鲜血。

若克同志永垂不朽！



殡葬陈若克现场

沂蒙山腹地游击战

耿玉衡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团工作。一天，师指挥部通知我们营，团干部开会。一进场，就见罗荣桓政委坐在中央，周围气氛很严肃。凭经验，我们预感到有什么大事。果不其然，罗政委见大家都到齐了。开门见山地宣布：为了持久抗日，消灭敌寇，我们部队要化整为零，抽一部分干部到敌后和各游击区去发展地方武装，组建扩建游击队。

大伙大眼瞪小眼，不由面面相觑，在那年月，我们这些人谁也舍不得离开主力部队，去孤军作战。

罗政委看出了大家的顾虑，恳切地讲了一番深入游击区的意义，又讲了一番各解放区的形势，作了任务交代，会便散了。

晚上，罗政委把我叫了去，他给我搬了个椅子，倒了杯水，然后和气地说：“玉衡同志，派你打回老家去，你看怎么样？”

我的家乡在沂蒙山区的沂水县，虽然我出来几年了，也挺想念家乡，但一说要离开主力部队，心里总不是滋味。

罗政委推了推鼻梁上的宽边眼镜，不由自主地笑道：“不大情愿，是吗？”

我点了点头。

罗政委并没有批评我，他把桌上的那杯水端到我手里，语重心长地说：“山东自晚清以来就是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重点。现在日寇又以胶东半岛为基础，入侵中国，更显出其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我们要在山东站住脚，必须先站住沂蒙山区，这样，东西可以控制济青铁路，南北可以控制津浦铁路，掌握制服敌人的主动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沂蒙山，也就有了山东省。”

罗政委讲完这番话，不等我发话，又接着说：“你们都不愿离开大部队，更不愿离开一一五师，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一一五师毕竟只是一个师，一个师的力量终究是单薄的。我们派出这么多的同志，到敌后发动群众，招兵买马，不是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师、团出现吗？到那时，我们的力量更大，军威更振，战胜敌人不更有把握吗？”

罗政委这么一说，我心里亮堂多了。我站起来，向罗政委表示道：“首长放心，明天我就打回老家去，一定完成任务，请首长听捷报吧。”



游击队在敌占区
开展斗争

我告别了罗政委，连夜奔向沂蒙山。山熟、水熟、人更熟，贫苦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纷纷向我提供情况，要求建立武装和敌人干。我趁热打铁，没几天功夫，一支三四百人的游击队成立起来了，而且各村还建立了民兵游击小组。

游击队成立后，武器弹药一时成了大问题。罗政委给了我们几捆大盖枪，山东分局也送来一些手榴弹，加上袭击敌人据点又缴获了一些，武器问题基本解决了。刀枪在握，和敌人斗争的胆子更壮了。

驻扎在沂蒙山区的日军头目叫畑俊六，其手下有五个杀人不眨眼的侏子手，被称为“五虎”。其中有一“虎”就盘踞在沂水、蒙阴一带，名叫东条多怀。东条多怀凶狠残暴，一次他抓起一个县委书记五岁的小儿子，两手一扯，活劈了。这小子不但心狠，长的模样也难看，牛头驴眼蒜鼻子，大嘴一咧到耳根，谁见了谁怕。夜哭的小孩，只要母亲说一声：“东条多怀来了！”小孩便吓得乖乖入睡。他在这一带的绰号叫“东阎王”。

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我们决定要惩罚一下这个狗东西，打一下敌人的气焰，但寻了他几回，始终没碰上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天“东阎王”带着一中队日本鬼子和一伙伪军到犁山抢粮，粮食早已被民兵们坚壁起来了，日本鬼子空手而回。大队人马行至河边时，突然河边草丛里出来一只大黑獾。

“东阎王”一眼看见，便纵马追了上去。他的四个贴身警卫也加鞭尾随，其余的鬼子和伪军看到他们打猎玩，初始还呐喊助威，等他们跑远了，便没有兴趣了，继续向据点行军。

“东阎王”追着进了一个山坳里，山坳东西长十几里，有一个村庄叫张家谷。

正巧，这天我在村里召集妇救会长、粮秣主任开会，研究对付日本鬼子抢粮的办法。突然，哨兵报告说：“鬼子来啦。”我当即停止开会，让三个战士将十几名妇救会长和粮秣主任从村后护送出去，便和其他六名队员做好了战斗准备，我边准备，边感到蹊跷，今天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绝对保密地点，怎么走漏了风声呢？我趴在村前的石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只见一只大黑獾在前边没命的狂奔，后边五个日本鬼子纵马狂追。哦！原来是小日本在打猎。我估计开会的人还未走远，决定不惊动这几个敌人。不料，发了狂的大黑獾已慌不择路，径直朝村里跑来，小日本仍紧追不舍。我吩咐队员们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敌人越来越近，我举枪照着前头的两匹马打了两枪。不巧，打中了第二匹。东条多怀发现了我们后，料到是游击队，挥刀杀将过来。正好，我身上带着刀，便抽刀迎了上去。与此同时，几名游击队员砍杀了“东阎王”的三个卫士。“东阎王”见状有点着慌，刀法

一乱，我顺势一刀削去，正砍在他的脸上，一时血如泉涌，军衣、马背、地上到处都是。

“东阎王”见势不妙，无心再战，一溜烟地逃跑了，我们追了一阵没追上。

几个月后，“东阎王”的刀伤养好了，但却留下了一道三寸多长的大刀疤，疤口紧连着嘴角，嘴也豁了。面一毁，本来丑陋的脸就更丑了，士兵们都不敢正面看他，看后更恶心。

“东阎王”受此侮辱，更加凶恶，一时找不到游击队，就变本加厉地推行“三光政策”。把火往老百姓身上发泄。有一次，他在张庄一口气砍杀了十三个老百姓。还有一次，他烧了刘家峪、贺村、彭集三个大村庄的几百间房屋，人民群众更加痛恨东条多怀，把他原来的绰号“东阎王”改名为“多一刀”。

秋收到了，我们接到罗政委的指示，要保卫好秋收，做好抢收抢藏工作，不让敌人抢到一粒粮食。

为了保卫秋收，治保主任夏新生同志也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夏新生在红军时期就在除奸、搞情报方面很有一套。在沂蒙山方圆几百里很有名气，连敌人也知道他的大名。他来了，我们对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感到要想保卫好秋收，关键还是要狠狠打击“多一刀”。只要把“多一刀”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敌人抢粮行动就会流产。按照这些想法，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制订了。

第二天，恰逢十五大集。夏新生戴着瓜皮帽，架着黑墨镜，手提着大曲，口哼小调，一步三晃地来到离日本鬼子队部不远的地方，故意将墙上贴着悬赏捉拿我的布告伸手撕了下来。

便衣特务报告了“多一刀”。“多一刀”马上召他进来队部。

“你是什么的干活？”“多一刀”问道。

“良民的干活，张庄的甲长史大山。”说罢，夏新生一点头一哈腰，递上了良民证。

“多一刀”接过良民证审视起来。

“太君，您忘了吗？上次您到张庄‘扫荡’，就是我送的情报、带的路，您才抓住十三个匪属。翻译官，那天不是你还赶回两只肥绵羊吗？”翻译官端详着他，似曾相识，不由地点了一下头：“你是史大山甲长？”“对对对！正是在下小人。”说罢他又一哈腰，外带一鞠躬。

这一带的乡、保、甲长很多，“多一刀”和翻译官也很难辨出哪个叫张三哪个那叫李四来。

“多一刀”脸一颤，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厉声问道：“你撕了布告，你知道耿匪的下落？”

“知道！知道！我亲眼看见的。”

“在哪里？”

“大洋钢洋的这个。”夏新生边说边伸出两个手指头，意为两千块大洋。

“多一刀”看着他那副贪婪的样子，狞笑起来。

翻译官在一旁嚷道：“你先别他妈的废话，先说出在什么地方，抓住了再给钱！”

“不不不！翻译官，你的，先去拿两百块钢洋来。”“多一刀”命令道。

“哗啦”一声，钢洋倒在桌子上。夏新生看着白花花的钢洋，故意装出涎水欲滴的样子，一板一眼地说：“报告太君！耿匪昨夜在东崮顶陆村宿营，听说要住两天。”

“你怎么知道他要住两天？”翻译官问。

“昨天陆村的保长叫我去打牌，打到三更天听到狗吠声，我俩出门窥望，就见一溜人直奔村西陆小五家，我俩跟踪而去，听见耿司令，不，耿匪！是耿匪说什么要在这里住两天，还叫什么夏司机、夏司令的，可没见他们坐什么汽车，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司机！”夏新生口吐飞沫一口气说完。

“什么！夏司机！你为什么不上来报告？”翻译官慌忙问。

“陆村离这里十多里，这是下半夜发现的，我一刻没耽误，跑到这里就天大亮了！”

“耿匪的多少人？”“多一刀”恶狠狠地问。

“不多！不多！连那个司机算起来一共七个人。”

夜里，星月无光。夏新生前头带路，“多一刀”一马当先，率领一小队日本鬼子和保安队的一个连，直奔陆村，至离陆村五六里时，“多一刀”下令马队停下，所有的马蹄都用布裹了起来。

陆村地处两山相连的一个山坳里，为了一举成功，“多一刀”命令保安队的一个排迂回到后山截击去路，一个排占领山坳左峰，一个排占领山坳右峰，剩下的一个排，正面出击。

没等敌人布置完，突然，两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两面山头上响起一阵“嗒嗒嗒”机枪声和“砰砰”的步枪声，把刚接近山地的敌人压了回去。“多一刀”听到枪声，知道中计，气急败坏地寻找“史大山”，可“史大山”早已溜之大吉。

翻译官这时也吓得直哆嗦，拉着“多一刀”说：“大队长，快撤吧！我们中了奸计啦！”

敌人乱作了一团。我一看是时候了，命令队员们拉响了地雷。地雷一开花，敌人像没头的苍蝇，乱窜乱闯，有的自己人对自己人开起枪来。

一会儿，山坳两侧的队员也发起了冲击，敌人完全蒙了头。我们趁机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这支来偷袭的敌伪军就这样被解决了。这次战斗歼敌伪二十多人，俘虏了十几人，东条多怀这个作恶多端的倭子手被地雷炸掉了半个脑袋，一命归天。

打扫完战场后，我命令队员们将东条多怀的尸体装在麻袋里，连夜派几个队员送到黄集（因为第二天那里逢集，是这一带最大的集市），把他的尸体吊在集市前的一颗大树上，还附了一张布告，历数了东条多怀的罪状，说明这是他应得的下场。同时还警告那些汉奸、伪军、保甲长们，不要再给敌人卖命，特别眼下秋收时节，谁若帮狗吃食，为虎作伥，就要他在大树上给老百姓亮相。

这些人个个吓得变了脸色，天不黑就上门挂锁，增哨加岗，一个多月没敢出来“扫荡”。我们借这个机会把庄稼收到家里，坚壁了起来，没让敌人拿去一粒。

我们的成绩得到了山东分局的通报嘉奖，罗荣桓政委亲自写信向我们表示祝贺。



国士——牟宜之

卞文超 梁胜楠



牟宜之

牟宜之系山东日照人，出身于乡绅人家，家学渊源，少即聪慧。其姨夫丁惟汾，既是训诂学家，亦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家，曾任同盟会北方负责人，系国民党元老之一。牟宜之自幼师从丁惟汾，素负报国大志，16岁即投身革命，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反专制、反军阀的秘密活动。抗战爆发后，他又舍家纾难，以民国县长身份，接应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挺进纵队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居功至伟。从军后，他亲冒锋镝，带领军民与日寇浴血搏战，后又长期从事敌工和统战工作。

1949年之后，牟宜之担任业务部门负责人，勤勉从公，不求闻达。在“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但拒绝俯首就范，宁折不弯，遂被剥夺工作权利，投闲置散8年之久。后遭逢文革，又被发配至黑龙江“劳动改造”8年。1975年初，困厄于济南，忧愤而歿。

扬鞭策马驰幽燕

1939年，抗日战争战火蔓延，牟宜之接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调令，被委以重任。牟宜之曾对儿子牟华东讲起这段经历。为了从山东到达重庆，他迂回绕过大半个中国。从鲁西北出发，牟宜之先到天津乘客轮南下，经过香港，绕至越南境内，然后进入云南，最终辗转抵达重庆。

这段漫长的旅行途中穿越敌占区，险象环生。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掩护下，牟宜之一路乔装打扮。一次，船舶停靠上海，忽然上来一队日本兵搜查。当时牟宜之几乎绝望：这下撞个正着，肯定躲不过了。面对荷枪实弹的敌军，牟宜之淡定自若，举手投足间，敌军相信“这一定是个大官”，加之他曾在日本留学，与日军简单沟通，敌人竟立正打起敬礼。

来到重庆后，牟宜之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这一段时间，是牟宜之一生中最难忘的珍贵时光。在重庆期间，他和周恩来接触频繁，一起吃饭时周恩来总是亲切地称其为“宜之兄”。对周恩来惊世的才华、过人的精力和高尚的品质，牟宜之印象深刻，这坚定了他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重庆工作一段时间后，周恩来派牟宜之去延安学习。在延安，牟宜之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的形势，并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指示。

由于冀鲁边区形势严峻，牟宜之又派回冀鲁边区工作。于是，牟宜之与邓小平、邓颖超等人一起乘车到了西安，又随邓小平、卓琳等奔赴八路军太行山前线总部。为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行人常常夜里行军，但大家情绪饱满。多年以后，牟宜之写了回忆录《难忘的一次夜行军》。

一个黄昏，队伍终于抵达太行山总部。牟宜之迎面见到一个人，

身穿一件磨得发亮的破棉袄，言语间却流露出将军气质。一问才知，此人是彭德怀。部队缺少棉衣，彭德怀对自己身上硬如盔甲的棉衣颇为珍惜：“满是油泥，正好挡风！”这个细节让牟宜之拿定主意，把全部归自己掌控的财产捐给部队购置棉衣。

誓拼顽躯歼敌寇

回到冀鲁边区，牟宜之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1941年春，他被选为山东沂蒙山区行政公署的专员。此时抗战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牟宜之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牟宜之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同敌人在山沟里周旋，他们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反“扫荡”。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上，牟宜之写下绝命书，鼓舞部队与日寇血战到底。山下炮击，天上飞机轰炸，情况十分危急，我军与敌人彼此都望得十分清楚，敌人用大炮向我军开火，炮弹在牟宜之周围爆炸。牟宜之对着敌人，用日语高喊：“你们打得不准，还得练练本事，才能打着老子！”队伍坚持到天黑，终于利用对地形的熟悉，打开一个缺口，冲出了包围。

敌后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有两三年，牟宜之没有尝过酱油的味道。一次牟宜之生病，不能坚持行军打仗，同志们把他送到一个山洞里呆了一个月。由于衣服不能换，身上长了虱子，忍不住挠痒，结果伤口和衣服粘在一块，钻心地疼痛。原本可以享受舒适安逸的生活，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他没有退缩。1941年牟宜之诗云：“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抗日战争时期，牟宜之成功策动至少四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1946年5月，牟宜之调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在瓦解敌军和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中，他作出了贡献，尤其对一八四师潘朔端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尽了很大力量。

刚正不阿除蠹螟

随着全国逐步解放，牟宜之对和平年代开展建设，充满热情和憧憬。东北解放



1950年山东党政军领导合影，二排左一为谷牧，左二为许世友，一排右一为牟宜之



牟宜之与夫人

后，牟宜之先行来到北平，与时任北平市长的国民党干部何思源秘密接触。两人是金兰之交，牟宜之从中斡旋，力主和平解放北平。北平解放后，牟宜之任首任北平市建设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牟宜之大力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完整保留北京古城原来格局另辟新区”的城市规划思路，遭到主流观点排挤。牟宜之儿子牟广丰提到，一次偶然的事件，牟宜之的警卫员枪走火致人死亡，牟宜之引咎辞职，请求调离北京。

1950年，牟宜之任济南建设局局长；1953年调回北京，任中央林业部经营司长。在牟宜之子女的印象中，父亲一点儿不像当官的，和修鞋的鞋匠结交朋友，和书画篆刻店的老板谈天说地。

1955年的一天，一个篆刻店的老板和牟宜之闲聊，提起“你们单位的李万铭也经常到我这儿来刻章”。当时，牟宜之和担任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李万铭住楼上楼下。牟宜之感到有些奇怪，平时和李万铭接触，他并不是爱好写字刻字的人。牟宜之好奇：他刻什么章？店老板说：都是公章，防空司令部、志愿军十二军什么的。这令牟宜之大吃一惊——私刻公章背后有可能隐藏着大阴谋。牟宜之立即向党委建议组织检查，并力主查办，由此牵出了震惊中外的李万铭政治诈骗案。萧华把他的揭发材料转呈毛泽东，刘少奇亲笔批示后在党刊上登载了该材料，并和罗瑞卿一起称赞了他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与警惕性。

高瞻远瞩展建设

1950年至1953年，牟宜之在济南任济南建设局局长期间，体现出独到的前瞻性理念。

牟宜之来到济南，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满是断壁残垣，大明湖濒于淤塞。当时有人提议，把大明湖水放干，以免后患。对此，牟宜之极力反对。他主张用拆城墙的砖石，垒砌大明湖石岸，防止大明湖淤塞。他还顺势把一所破庙里的牌楼整修一新，当做大明湖的正门。今天，济南方得以保全大明湖这颗明珠。

与今天的满山苍翠不同，解放之初，济南英雄山是一片荒山。牟宜之主张在英雄山大量植树，他指出这样不仅可以美化环境，同时还可以防风固沙。早年留学日本的牟宜之，体现出超前的环保理念。在他主持济南建设的几年中，修复开通了许多条马

路，修建了多座桥梁，如青年桥、西门桥、青龙桥等。在促进济南市容的初步改观、保护和建设泉城的名胜古迹、奠定济南城市规划布局等方面，牟宜之做了大量工作。

一世英雄寂寞收

牟宜之一生中有三件事令其备受打击，痛彻骨髓。

1951年，痛失爱子。儿子牟敦康是牟宜之的骄傲，作为新中国首批飞行员之一，牟敦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击落4架敌机，英勇牺牲。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牟宜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牟宜之被发配到北大荒——齐齐哈尔市郊昂昂溪“劳改”。

1958年，牟宜之被开除党籍。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第二次生命的牟宜之，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段昏暗的岁月里，牟宜之在劳动之余作有大量诗篇。牟华东印象中，父亲总是一边踱步，一边低声哼吟。吟出来就写在纸片上、烟盒上，甚至火柴盒上。对这些无法公开发表的诗，牟宜之敝帚自珍，夹在一本毛选中，放在一个皮包里。这个皮包从驰骋沙场的战争年代伴随牟宜之，直到生命尽头。

1974年，牟宜之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写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说明了自己的处境。邓小平亲笔批复，充分肯定了牟宜之在历史上对革命的贡献，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1975年，牟宜之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希望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伤心之余，脑血栓突发，客死济南。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时，发表了肖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五人署名缅怀牟宜之的长文《有功岂必书之碑》。文尾写道：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牟宜之纪念馆在日照开馆，左一为陈昊苏



宰相王导

清风慕竹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人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曾令白居易“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诗中所描述的乌衣巷，是东晋王、谢两大家族的住所，其中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莫过于王导。

让皇帝戒酒

王导字茂弘，小名阿龙，“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他相貌不凡，惊奇地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

王导承袭祖父爵位，任东阁祭酒，朝廷让他入朝作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都谢绝了。他与琅邪王司马睿关系很铁，晋惠帝时，王导预感到天下将乱，便暗怀起了中兴晋室之志。他劝司马睿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封国就任，自己则担任了司马睿的司马。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一月，晋惠帝被俘，西晋灭亡。王导抓住机会，劝司马睿在建康登基，在江南建立起了东晋政权。

司马睿即位后，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那时许多北方的名士都流亡江南，看到新政权尚处草创阶段，什么都还没个头绪，对前途十分渺茫。在西晋朝曾任州主簿的桓彝来到江南，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失望地对周顗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于是终日忧惧，闷闷不乐。后来，桓彝去看望王导，俩人畅谈世事，出来之后，他面貌焕然一新，兴奋地对周顗说“我见到了江左的‘管仲’，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来到江南的文人雅士，每到闲暇之日，常相邀到建康城外的新亭宴饮。有一次，几杯酒落肚，周顗望着滚滚江水，感叹说：“风景倒还差不多，可举目有江河之异。”此时众人遥想当年盛

况，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王导见了愀然变色，站起来厉声说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象‘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呢！”大家赶忙收起眼泪，向他道歉。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亭对泣”，此后成为许多诗中论及的典故。如宋人汪元量诗云：“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缘无泪洒新亭。”辛派词人刘克庄则在《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中写道：“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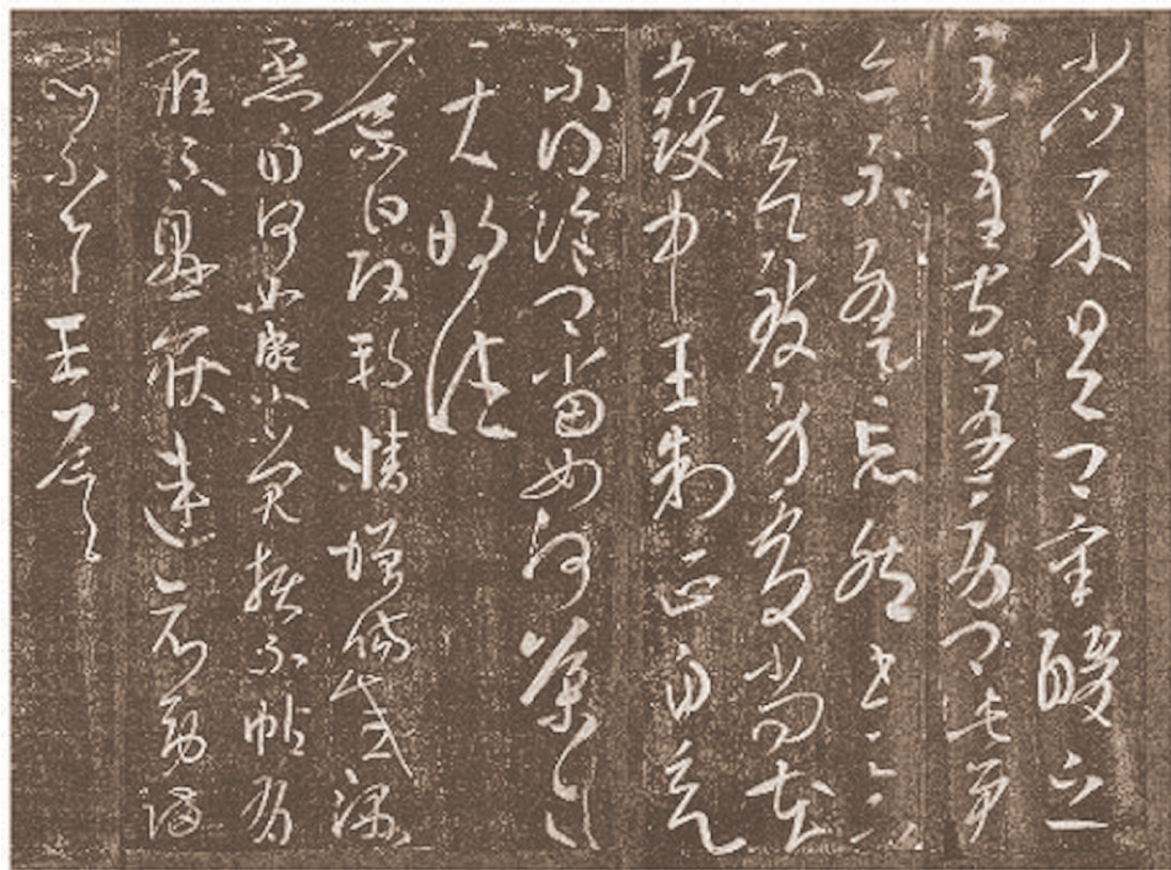
精神萎靡的不仅是这些名士，司马睿有时也借酒浇愁，以至经常荒废政事。一次醉酒后，王导严肃地劝他不要再喝了，司马睿请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过来往桌上一扣，从此戒了酒。他接受王导的四条建议，“接纳士人要谦虚，日常开销需节俭，为政要力求清静，南北之人应安抚。”在君臣的励精图治之下，江南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王导的乐观，缘于他的政治远见，这使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始终保持了一份理性的头脑。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才开创了东晋王朝的新局面，以至晋元帝司马睿感慨地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光着膀子说吴语

建立江南政权，王导居功至伟，晋元帝心知肚明。在举行登基仪式的时候，文武百官列队陪侍，元帝请王导上来一同“升御床共坐”，接受百官朝拜。王导坚决推辞，元帝请了三四次，王导说：“如果太阳也和地下万物一样，那么老百姓该到哪里沐浴光辉呢？”元帝这才作罢，由此有了“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王导的地位无人可及，但他十分低调，事事退让。元帝曾封他为辅国将军，王导加以拒绝，他说：“爵位是国家的重器，不可以轻易赏赐，否则就会混杂天子与



王导书法
《省示帖》

官吏之间的界限，导致混乱的先端，弄乱了朝廷礼法典章。让尊卑雅俗有所区别，就从我王导开始吧！”元帝大为感动，说：“王导德重功高，为孤所倚，本想予以表彰加以殊礼，但他谦虚谨慎严格约束自己，以身作则，为王事尽一片忠心，就顺从他纠正弊端的良苦用心吧。”

即使在世人面前，王导也十分谦恭，不把地位作本钱，不拿权势当资本。为了搞好和江东士族的关系，他曾主动向陆玩请婚联姻，没想到陆玩却很看不起他，说：“小地方长不出大松柏，香的薰草和臭的菰草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我陆玩虽然不才，也决不首先做乱伦的事。”陆玩出言不逊，但王导并不以为意，还是坚持与陆玩往来。一次，陆玩到王导家作客，王家用北方人爱吃的酪浆招待客人，陆玩觉得新鲜，吃得稍微多了些，回去后闹起了肠胃炎。第二天，陆玩致书王导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伧鬼”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陆玩之言虽有几分幽默，但却不无轻鄙之情，王导仅是一笑，不曾放在心上。

不仅如此，王导还屈尊学起了吴语，即南方的方言。一天，南方的名士刘惔去拜访王导，时值盛暑，一进院子，就见堂堂的当朝宰相正光着膀子，动作夸张地用肚皮在石棋盘上依来偃去地降温解暑，并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洵！”“何乃洵”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那时士人崇尚特立独行，行为乖张反而受人称赞，王导的表现立刻打动了刘惔。刘惔访问归来，立即有人打听：“王公这人怎么样？”刘惔回答：“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只听到他在讲吴语。”放下身段学说吴语的王导很快赢得了江南士族的心，他们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俗话说“地低成海，人低为王”，肯于低头的王导并没有失去威望，反而提升了他的名气，为他广泛地开展交际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协调北方皇族、贵族与南方士族关系的中流砥柱。

一举一动吸引人们的目光

东晋初创，百废待举，国库空虚，财政时常入不敷出。治理国家跟居家过日子一样，开门柴米油盐事。作为宰相的王导，不得不经常想法子弄钱，好在他从不缺少这份智慧。有一年，晋元帝要搞点民生工程，财政部门汇报说，国库里的银子已经花光了，只剩下几千匹粗丝布，拿到市场上根本没人买。王导很淡定，说：“你们去拿几匹布送到我家，我自会有办法。”晚上回到家，王导亲自设计，让人裁制了一套衣服，第二天，穿上它去朝廷上班。果然，在那个崇尚个性的时代，王导的衣服显得特别抢眼，越看越有气质。几个素来倜傥的名士耐不住心痒，向他打听从哪儿订做的衣服，王导一笑，说：“你们要是喜欢，我那儿还有点布相赠。”很快，穿这种粗丝布衣服就成为贵族阶层的新时尚，民间效仿者更是如过江之鲫，一时间弄得“洛阳纸贵”，这种粗丝布价格暴涨，一匹布从没人要，到卖到了一两金。王导见时机成熟，让人从国库里搬出这些布匹销售，很快弄了一大笔钱，解了燃眉之急。

王导成为风尚的引领者，缘于他在文化上的地位。魏晋之士以旷达为风，讲究“玄妙”“雅远”，王导堪称这方面的领袖。他时常在府中举办由名流参加的“玉柄麈尾”辩论聚会，这是一种高品味的文化沙龙。那时的名士，都手持一种类似道家拂尘般的玉柄麈尾。麈，据传为麋鹿的一种，体大尾长。相传麈与群鹿并行，摇尾左右，可指导群鹿的行走方向，有群伦领袖之概。麈尾饰以玉柄，是清谈领袖的重要道具，以示仪瞻表率，风神超迈。

这种辩论会称为清谈，一般由王导亲自主持，另有名士做宾谈、陪谈。辩谈有“辞喻不相负”的特点，即讲究辩论求胜而互不服输的言语过程，重视的是清谈本身的美，至于

到底谁说得更有道理并不重要。清谈的语言都非常玄妙。有一次王导曾以康僧渊深目高鼻而戏弄他，僧渊即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这种玄而又玄的辩论时间通常很长。一次王导与殷浩清谈析理，一谈就谈到了三更，意犹未尽。每次举办这样的聚会，都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不仅辩论的内容、形式，甚至会上的花边消息，在第二天都会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

正因为如此，王导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人们的眼光，使得他“淡妆浓抹总相宜”，随便穿上一件粗布衣服，都能引来社会的追风者，这就是名士的风采。

“和稀泥”和发脾气

王导长期居于相位，奉行“不存小察，弘以大纲”的执政理念，务以清静为根本，不过他有些做法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因而饱受诟病。

山遐为余姚县令，实行严刑峻法，上任八十天就查出私藏人口一万多。其中大豪强虞喜藏匿的人户最多，按律应当处死，山遐欲绳之以法。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县中豪强恨得咬牙切齿，一齐向王导告状，诉说虞喜有高风亮节，不该受此屈辱，还诬告山遐私造县舍等种种罪名。最终的结果是，王导将虞喜释放，而将依法办事的山遐撤职。离职前，山遐还曾写信给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请求留任百日，待彻底查清逃户后，再受朝廷责罚，自己死而无恨。何充因此替山遐申辩，也受到连坐免官的处分。

王导兼任扬州刺史，曾派遣八部从事巡视扬州境内各郡县。从事们回京后都来见王导，纷纷汇报郡县长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你听到什么了？”顾和回答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听信传闻苛察那些小事。”王导大加赞赏，诸从事面面相觑，若有所失。

另一贵族庾亮十分看不起王导的所做所为，在他掌权后，一改王导的宽和政治，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引发了社会上层的严重不满，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又重新激化起来，终至爆发了叛乱。

平定叛乱后，王导二次上台，恢复了“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宽松政治，及至晚年，王导面对怠于政事的指责，意味深长地说：“人说我糊涂，后人当思此糊涂。”

王导的糊涂，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作为来自北方的政权，与江南士族的矛盾十分尖锐，王导为政上一些“和稀泥”的做法，看似软弱又有失公正，但却缓和了矛盾与冲突，不仅稳固了刚刚建立的政权，更开创了东晋百年的基业。对此，陈寅恪先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

王导还有个毛病，就是“惧内”。老婆曹氏好嫉妒，容不得他纳妾，王导没办法，只得私下里买了一个宅子，用来安置其他的姬妾。有一天，不知何人走漏了风声，曹氏一怒之下，要去兴师问罪。王导得到情报，急忙命人准备车驾赶去，朝廷为他配备的公车不过用牛牵引，速度太慢，急得王导把手中的“玉柄麈尾”当作了牛鞭子，狠命地敲打牛屁股。司徒蔡谟听说这事后，取笑王导说：“朝廷恐怕要为公加九锡了。”王导很惊讶，客气是说不敢当此功劳。蔡谟又说：“不过我没听说要赏赐别的什么东西，只知道有短辕的牛车，长柄的拂尘。”王导这才知道这是拿他开涮，气地对人说：“我和各位贤能一起在洛阳游玩时，哪里听说过这个姓蔡的小子！”

元帝司马睿对王氏家族占据半个朝廷的局面不甚安心，便有意安排自己的心腹占据重要位置，不断削弱王氏兄弟的权力。王导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满，每天正常上下班，工作依然十分勤奋。手握兵权的王敦可没有这等好脾气，他打起“清君侧”的旗号，公然反叛朝廷。此时的王导更加没有脾气，因为按照法律，叛逆之罪是应该诛九族的。他既不逃跑，

也不反抗，只是每天清早便率一家二十多口人到御史台前请罪。王导的谦卑让怒气冲天的司马睿也失去了下手的理由，加之朝中多数大臣认为王导无辜，他只得赐还王导朝服，并召见了。王导一见面就诚恳地请罪说：“逆臣贼子，哪一个朝代都有，但没想到，本朝的逆臣贼子却出在我们王家！”听了王导这一番自责的话，司马睿感动得竟然光着脚从龙床上走下来，拉着王导的手叫着他的字说道：“茂弘，我正要你将大任托付给你，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其实王导并非没有脾气，只不过他知道对谁发和在什么时候发。晋成帝时，苏峻发动叛乱，一直打进首都建康，文臣武将都四散而逃。偌大的宫殿里只有王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等几个大臣，他们一同登上御床，护卫成帝。叛军此时已没什么顾忌，舞刀弄枪，想加害皇帝。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导脾气大发，他凛然厉色，大声斥责叛军的背逆之行。苏峻为王导的气势所震慑，下令退兵，始终没敢加害皇帝。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王导不是没脾气，只是未到爆发时。

在历史上，王导是个复杂难以定论的人物。他是个名相，也是个学者；是个清流，又是个懒士；是个佛徒，还是个棋手；是个糊涂的明白人，更是个惧内的大丈夫！只有一点应该没有疑义，他是个无愧于时代的风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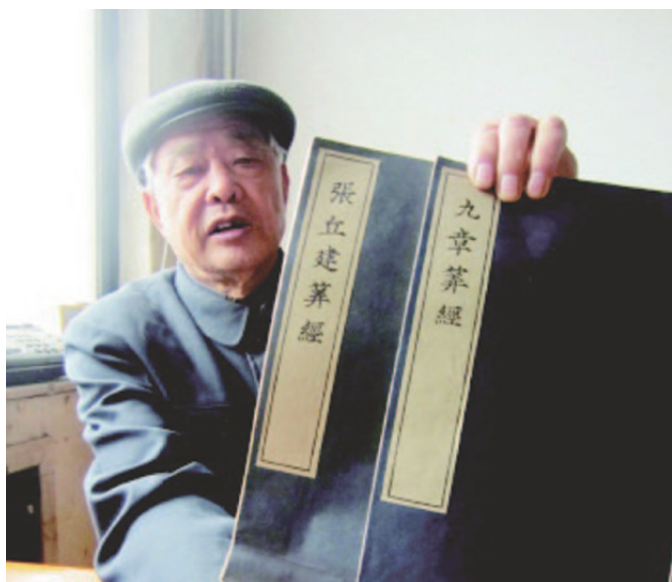


南京王导、谢安纪念馆来燕堂

被历史遮蔽的辉煌

——确认刘洪为珠算发明人始末

靖一民



2007年，英国的《独立报》将全世界的科学发明与创造进行了梳理，挑选出能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科学发明101项，中国的珠算发明列第一位；同年11月19日，印度的《印度时报》也把全世界的科学发明进行了排队，第一名仍然是中国的珠算发明。毫无疑问，珠算是人类科技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难怪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曾说：“中国计算机方面应该比谁都先进。中国的算盘是最古老的计算机。”

然而，就是这一称雄世界达1800多年的计算工具，长期以来却被误认为源自罗马，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山东临沂一位名叫靖玉树的算学专家才坚定地指出：“珠算是中国人发明的，发明者是东汉时的蒙阴人刘洪。”

靖玉树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在珠算界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外国人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而且国内的个别珠算权威也对此观点进行打压。于是，一场长达28年之久的学术之争，成为世界珠坛关注的焦点……

日本向中国认错之后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算学专家山崎与右卫门发表文章说，算盘源自罗马，经中国传入日本，由日本传播至世界各国。这一观点，引起了我国珠算界的强烈反对，以中国珠算泰斗华印椿为首的中国珠算界人士经过大量考证，

批驳了日本学者的“中国珠算西来说”，确立了“珠算是中国发明的”科学论证。1981年，日本珠算史研究学会会长铃木久男终于公开承认，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同时，他也希望中国能确认珠算是什么时间、由哪个人发明的。但当时国内对珠算发明人的猜测颇多，却无一定论。

1982年6月，山东省首届珠算史研究会在蒙阴县召开。中国科学院、中国珠算协会以及部分省市的专家和学者都出席了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身为山东省珠算史研究组组长的靖玉树明确指出，珠算是东汉蒙阴人刘洪发明的，并详细阐述了刘洪的基本情况及其珠算发展的脉络。

刘洪（约129—210年），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今山东蒙阴县）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刘洪自幼勤奋好学，具有渊博的知识。《后汉书》说：“洪善算，当世无偶。”因此，在汉灵帝光和年间，由太史蔡邕推荐，他被调回京师，专门从事历法研究。在此期间，他除了按照皇帝的旨意参与“考验日月”，审核、课校他人呈报上来的研究成果外，还把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汇集起来，写成《乾象历》《七曜术》和《九章算术》等专著，并和蔡邕一起补续了《汉书·律历记》，其中许多资料都被后来的《续汉书·律历记》所采用。据东汉东莱人徐岳所著的《数术记遗》记载，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珠算，就是这位古代科技奇才发明的。

刘洪为什么会发明珠算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天文学发展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天文学始终与占星术紧密相连，而中国的天文学则是与数学拧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数学书——《周髀算经》本身就是一本历法书。天文学家们为了弄清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就要进行复杂的运算，由于这些运算要求极其精微，其产生的数学内容也就极为深奥，因而便产生了“天文数学”。3000多年来，“天文数学”一直是中国数学的前导，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天文学家，也基本都是数学家。如：西汉刘歆作三统历、东汉李梵造四分历、后汉刘洪造乾象历、杨伟（刘洪的学生）造景初历、阚泽（徐岳的学生）著乾象历法、姜岌造三纪甲子历、何承天造元嘉历、祖冲之造大明历、刘焯造皇极历、傅仁均造戊寅元历、李淳风造麟德历、僧一行造大衍历、徐昂造宣明历、姚舜辅造纪元历、元代郭守敬造授时历、郭守敬的孙子郭伯玉造大统历……尽管有的数学家不一定懂天文，但天文学家却一定懂“天文数学”。

在东汉之前，人们使用筹算计算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计算方式虽然很实用，但由于摆弄费事，占面积太大，对计算较大的数据很不方便。正因如此，刘洪才会对计算工具进行改进。据宋刻本《数术记遗》记载，刘洪曾以问答的形式向他的学生徐岳传授珠算，虽然没有明说珠算是他发明的，但在他之前再无人传授珠算技法，亦无珠算的记载。由此可以认定，珠算就是由刘洪发明后，又把使用珠算的技法传授给他的学生的。况且，英国和印度都说算盘创自公元190年，而此时的刘洪约50多岁，正是他学术研究的成熟期。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肯定了这种说法，认为算盘的创立不会早于东汉。由此，靖玉树在梳理了大量的史料佐证后，肯定地说：“大体可以认定，刘洪就是珠算的发明人。”

靖玉树的论点，立时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共鸣。专家们都为寻找到了珠算发明人而兴奋，便一鼓作气，通过了大会决议：承认汉代刘洪为珠算创始人。最后，中国珠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新表态说：“这次会议虽然是山东组织的，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今年8月，中日珠算史、数学史研讨会将在北京召开，这次蒙阴会议，即可定名为北京会议的预备会。另外，北京会议上将成立中国珠算史研究会。既然珠算的发明者是蒙阴人，这个研究会的会址就可以设在蒙阴县，请蒙阴推举一位负责人担任中国珠算史研究会的会长。”

李新既是全国著名珠算专家，又是中珠协重要的领导人，他的讲话不仅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声，而且实际上是代表中珠协承认了刘洪是珠算创始人。听了李新的讲话，大

家都很振奋，他们准备进一步完善资料，向世界宣布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一场长达28年的学术之争

翻开中国的学术研究史，会发现许多重大的课题研究都是几经风波，最后才有了定论。如同红学家们争论了几百年，仍没把《红楼梦》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一样，珠算的创始人也不可能一锤定音。就在蒙阴会议散会四个月之后，从陕西省传来了不同的声音——著名数学史、珠算史专家S明确表示，他不同意靖玉树观点，亦不承认刘洪是珠算创始人。

S是珠算史研究权威，又是中珠协领导人，他一表态，许多认同刘洪是珠算创始人的学者大都不再多言了。与此同时，S竭力争取，将新成立的“中国珠算史研究会”会址由原定的山东蒙阴县，改到了陕西省的西安市。该研究会成立之后，迅速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

首先，S发表了论文《唐代创始算盘论》，把算盘产生的时间从汉代向后延迟了500年。这样，就彻底否定了刘洪。但这一观点很快遭到靖玉树的质疑，他反问：“如果说珠算是唐代发明的，那东汉时期编撰的《数术记遗》中就有珠算的记载怎么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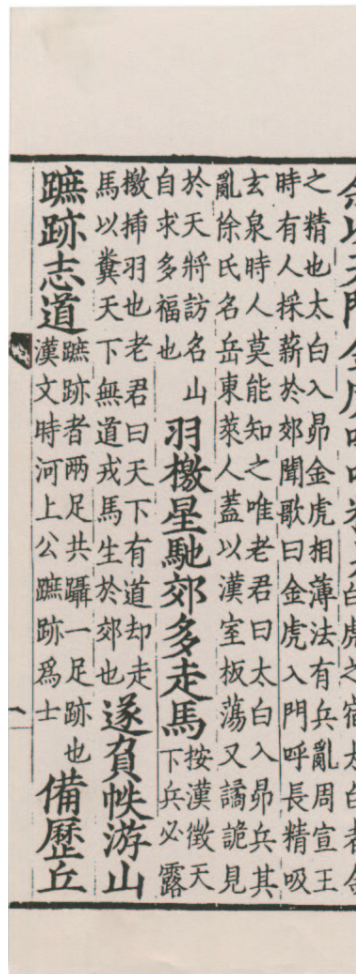
靖玉树的反驳很有力量，但许多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毕竟S当时是中珠协的领导人，身处基层的靖玉树敢公开质疑他的学术观点，等于搬了一座大山挡在了自己的面前。但了解靖玉树的人都知道，他虽然只是临沂供销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却是一位性格倔犟、在学术问题上喜欢挑战权威的算学专家。特别是他挑战日本和哥伦比亚专家的事，在珠算界曾被传为美谈。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户谷清一提出了“增成一法是初期的归除法”的观点。靖玉树经过研究认为，北宋沈括的“增成一法”和唐代徐仁美的“增成玄一算法”都是补数体系的算法，这种算法都只能来自珠算，由此认定“增成一法”并非是“初期的归除法”。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把著名算学家朱永茂的补数法与李新的“五字乘除法”混合成一个整体，写出了多种正反剥皮等法，并理出补数体系的10种乘除，使珠算补数既有自身的体系，也全面混入了倍数的多种方法，从理论上否定了户谷清一的观点。户谷清一是日本全国珠算教育联盟研修委员长，他看了靖玉树的论文后没有反驳，而是让日本的珠算刊物转载了这篇论文。

1991年4月25日，西班牙的埃菲通讯社报道：哥伦比亚有位名叫塞拉诺的“电脑人”，他在美国“拉美合作协会”表演了用脑计算10万年以内的哪一天是星期几，所计算的结果基本正确，埃菲社称赞其“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同年5月19日，中国的《参考消息》报转载了此报道，并引用了哥伦比亚独立日和发现美洲新大陆日两个例子。靖玉树看了报道后发现，仅这两个日期就计算错了一个，他立即撰写了《创世界新纪录的塞拉诺答案是否正确》一文，纠正了塞拉诺的错误，并指出：塞拉诺的算法虽然保密，但我们也会完全会算，而且会在三天内教会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使这个小学生的水平也达到“电脑人”的水平。因此他得出结论，这位所谓“电脑人”的算法，不过是数学游戏，是伪科学。

靖玉树挑战学术权威的事例还可以列出很多，如：他专门撰写了论文《中国珠算史疑案寻真》《珠算史旧案存疑》等，纠正了珠算界很多错误的认识（前一篇被日本的《珠算史研究》《政经论丛》两家刊物转载）；1991年，中国科学院的孔国平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发表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中国从元代就会使用射影定理和相交弦定理。”靖玉树却指出，中国在西汉时的《九章算术》中就已使用这两个定理；有人认为，西方的数学比中国先进，靖玉树却不认同，他撰文说：“西方数学是在引进了中国的‘十进地位制’后，才有了较大发展。而‘十进地位制’传入西方的载体，就是算盘。”

斯大林说：“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靖玉树就是一位不迷信偶像的人。他认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破解未知之谜，探求普遍存在的真理，从而



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一篇学术论文而言，科学性是前提和基础，创新性是精髓和灵魂，而与科学性、创新性同等重要的是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基于这些认识，他才会不畏权威，发现谁的理论观点有瑕疵，都会毫不客气地与之争辩。正因如此，当S用《唐代创始算盘论》来否定刘洪的功绩时，他自然不会听之任之，所以才立即站出来予以驳斥。

S似乎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他不与靖玉树争辩，很快又推出了新的观点：珠算是“广大人民群众”发明的，并以陕西省1982年出土的陶丸为佐证，提出了“陶丸算祖论”新观点。说算珠就是由陶丸演变而来，把珠算产生的时间提前到比东汉早了1100多年，仍然与汉代的刘洪无关。而靖玉树仍不认同他的观点，专门撰文予以反驳：陶丸出土时，国家考古专家就已认定，此物乃是打鸟弹弓之丸，别无用途。而且，古籍资料中关于泥丸、陶丸、铁丸的记载有近百处之多，却无一处与珠算有关。而且，S本人也找不到能证明陶丸与珠算有关联的史料。所以靖玉树仍不支持S的观点。

然而，就在珠算界对“陶丸算祖论”还在争论之时，陕西省宝鸡市珠算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却把“陶丸算祖论”的论点透露给了新闻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立即予以报道，声称算学家们已认定，陕西省出土的陶丸是西周陶珠，由此推断出珠算已产生了3000多年。随后，不明真相的香港、台湾、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报刊予以转载，把专家们尚未有结论的学术探讨课题，变成了既定事实。在媒体的巨大影响下，“陶丸算祖论”被编入了各种教材、辞典。甚至，直到2008年中国珠算协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送珠算“申遗”材料时，仍然把“陶丸算祖论”的论文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结果，国际珠算界的专家们认为理论依据不充分，未予批准。

千秋胜负在于理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一句名言：“雾气弥漫的清晨，并不意味着是一个阴霾的白天。”是的，尽管“陶丸算祖论”在一个时期内影响了对刘洪发明珠算功绩的确认，但许多珠算界的有识之士和刘洪故乡的人都坚信，刘洪被历史遮蔽了1800余年的功绩，不可能被学术界的不同声音再继续遮蔽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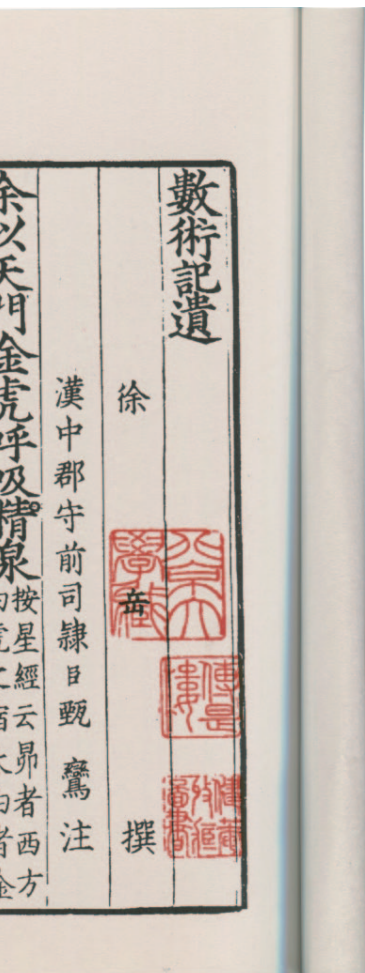
为了确认刘洪是唯一的珠算创始人，靖玉树数年如一日，一方面不分黑白昼夜蹲在史海里翻检各种典籍，写出了《关于刘洪与徐岳的有关活动时间及关系》《关于算圣刘洪的数学水平及其所发明算盘的价值和贡献》《从历代天文历法计算看珠算的历史贡献》《徐岳的生平及其成就》《刘洪年谱》等论文，以更加详实的历史资料证明刘洪就是珠算发明人；另一方面，利用自己曾是临沂市政协常委的身份，不断呼吁地方政府要重视对刘洪的研究，加大对刘洪的宣传力度，加快对刘洪纪念地的建设，尽快认定刘洪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算圣”。

在靖玉树和蒙阴县的共同努力下，刘洪被历史遮蔽了1800余年的功绩再次放射出光芒，而“陶丸算祖论”的研究却没有新的进展。

1994年，在蒙阴县的大力支持下，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8集电视连续剧《算圣》，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由于该剧是第一部描写刘洪发明算盘历程的文艺作品，财政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珠协名誉会长田一农出席了首映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承认了刘洪是唯一的珠算创始人。不久，该剧在中央电视台连播三次，引起了很大反响。

为了弘扬算圣文化，自2000年始，蒙阴县就开始筹建“刘洪文化园”，陆续建设了刘洪塑像和刘洪纪念塔、珠算博物馆、刘洪数学城等。经过数年施工，该园已初具规模，不仅成为刘洪的重要纪念地，而且还成为少儿珠心算基地和山东省珠算培训基地。

2010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派出专家组深入蒙阴县考察，他们对该县算圣文化的



保护与开发给予高度评价，不久即正式命名蒙阴县为全国唯一的“中国算圣文化之乡”。能够将此殊荣授予蒙阴县，等于从国家层面上确认了刘洪对发明珠算的杰出贡献！

2010年5月，世界博览会在上海隆重举行，其中的山东厅共布展了四个展柜，第三个展柜就展示了刘洪发明的珠算法和算盘。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珠算界已普遍承认刘洪是珠算创始人。

马克思曾说：“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在确认刘洪为珠算发明人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最初有人坚决反对，但真理与谬论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凡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就是真理，否则就会成为谬论。靖玉树认定刘洪是珠算创始人，是建立在史料记载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基础上的，所以他拥有真理，不论反对者怎样打压，都无法遮挡真理的光辉；而某些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论点，由缺少科学依据，虽然在某一个时期也能博得人们的眼球，仍不过是烟花一现，终会不攻自灭！

时光流逝，繁华从未退却。2009年珠算申遗失败后，中国珠算协会的领导人认识到，此次申遗失败，不是珠算本身缺少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是由于所申报的材料不被外国专家认可造成的。因此，他们决定修改申报材料，再次申遗。这一次，中珠协不仅吸收靖玉树为“珠算申遗专家组”成员，还把他撰写的确认刘洪是珠算创始人的论文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阿塞拜疆的巴库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特意介绍说：“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随中国人经历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从这简短的评语中可以得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也承认，珠算就是东汉刘洪发明的！

花谢入泥香，月缺还复盈。浩瀚的史海，虽然将刘洪发明算盘的功绩湮没了1800年之久，但就如同花瓣落入泥中仍然是香的、月缺还会复圆一样，悠悠岁月难以遮蔽刘洪闪光的业绩。漫过岁月的长堤，我们的算学家们经过近30年的争辩，终于拂去历史的尘埃，让“算圣”刘洪发明珠算的功绩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使得他终于成为享誉世界的珠算创始人。

这是沂蒙、乃至全中国的骄傲！





临沂出土文物之

青瓷胡人骑兽烛台

高昂



2003年，为纪念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临沂市对王羲之故居进行扩建。4月30日，施工人员在开挖大雄宝殿东配殿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后称1号墓）。6月7日，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又发现了一座（后称2号墓）。专家认定两座均为晋朝墓葬。1号墓东西宽8.2米、南北长4.6米、高3.4米；2号墓南北通长13米、东西宽7米、高4.42米。两座墓葬东西相距30余米，除墓门为石制外，其余均为砖筑。其中1号墓为双室墓葬，为山东已发掘汉晋大中型砖室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山东已发掘大中型砖室墓葬中惟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墓葬出土了随葬品250余件（套），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金器、漆器等，器形有壶、罐、钵、盘、炉、鼎、熨斗、灯、碗、弩机、带钩、手镯、钗、簪、串珠等等。在出土随葬品当中，尤以青瓷胡人骑兽烛台、青铜人物骑兽烛台、凤鸟形铜熏炉等器物造型优异，引人注目。出土的铜弩机上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等30余字铭文；部分漆器的底部有朱书文字“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十年”三个西晋年号。

青瓷胡人骑兽烛台出土于1号晋墓，人兽通高27.1厘米，兽身长20.5厘米、宽10.1厘米。瓷胎通体施青釉，釉层均匀，偏灰，具有明显的晋代越窑系的特征。

胡人骑兽烛台的制作采用了模印与手工精修的技法。神兽与胡人连体成型，内部空虚，兽顶贯一圆孔，似为烧造工艺。

胡人是古代中原人对周围游牧民族兄弟的贬称。胡人骑兽烛台中的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说其胡人，大约与三国中的孙权也有些相像。胡人头戴网纹卷沿高筒帽，上穿短衫、下着十字形纹长裤，足蹬一双网纹履，端坐于狮背上。左手揪兽耳，右手执芭蕉扇于胸前，目视前方，悠然自得，大有魏晋风度。神兽怒目圆睁，仰天长啸，前倾后踞，蓄势待发，动感十足，青瓷胡人骑兽烛台整体造形，动静咸宜，工艺精美，是晋朝代表性的艺术珍品。被国家评为一级文物，现藏于临沂市博物馆。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迎国军老财丧命 惩匪徒屠妇杀贼

1947年正月十七，国民党正式侵占临沂。当时我军早已安全撤出，临沂城实际上是空城一座。因连日国军的飞机轰炸，大部分居民早已逃到农村去了。国军们到达城郊后不敢进城，怕有埋伏，狡猾的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首先占据了城南的金雀山和银雀山，接着向城内发射了几发迫击炮弹，又打了一阵机枪，但是城内仍无动静。他还是不敢进城，于是命令随之而来的临沂王洪九还乡团匪徒在前面开路，国军随后，这才进入了临沂城。

临沂城北门里有户地主张大肚子，对共产党怀恨在心，天天盼着国民党到来。他早就做好了欢迎国军的准备，买了红纸写了些标语，做了些欢迎旗，写了什么“欢迎国军光复临沂”、“重见天日”等口号，还烧了一锅小米汤，买了一挂火鞭，穿上一套高级料子面的皮袍和马褂，佩带着金链的怀表、金戒指，带领着几个伪保长和汉奸流氓在大门外迎接国军。从早6点一直等到快10点，国军才来到。他的长工李二身材高，早望见有军队自南而来。老财马上命人放鞭炮。这鞭炮一响不要紧，只听南来的国军大喊一声



国民党军
进入临沂

“卧倒”，接着又连发了几发红色信号弹。原来国军以为是中了共军的埋伏，稳下神来仔细一听，不是枪声而是鞭炮声，始悟是有人欢迎，马上喊道“起立前进”，很快到了张家大门前。张老财满脸堆笑地说，可把你们给盼来了，请国军弟兄们喝碗小米汤解解渴。这帮匪徒很快将小米汤喝光，接着还要吃的，可张老财无准备。一个军官看见老财佩戴着金链怀表，顺手抢来，说道：“将这表慰问国军吧”，老财不答应，哪容他分说，匪徒们一拥而上，将他的金戒指、皮袍、毛衣等皆剥了个精光。老财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土匪”，这国军听道骂他们是土匪，一齐拳打脚踢，将张老财打了个半死。天气又冷，老财衣服被剥光，被长工李二背回家中，又气又冷，得了气恼伤寒病，卧床不起，请老中医刘宪邦吃了几服中药也未治好，一月后就死去了。这就是有名的欢迎国军的下场。从此临沂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

1947年孟良崮战役打响之际，国民党七十四师被困孟良崮，其他增援部队只在周围观望。特别是八十三师李天霞更是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其中一个团到达蒙阴的坦埠，这个团大多是招安的土匪，军纪败坏。

这坦埠村中有一屠户，夫妻二人靠杀猪卖肉为生。这时他每天杀两口猪，煮成熟肉卖给这些匪兵吃。前来买肉的司务长，四川人，是个胖子，心地十分不良，此人既贪财又好色，买肉时看到主妇有几分姿色，便起了歪心。这天这个司务长去了她家，见其丈夫赶集去买生猪不在家，觉得有机可乘，便边买肉边调戏主妇。遭到拒绝后，凶像毕露，将妇女按倒在地欲行强暴。此时呼救无人，十分危险。这妇人发现身旁有一杀猪刀，便顺手抓在手中。这妇人平时也会杀猪，这时她急中生智，猛地一刀刺进了贼子的胸膛，贼人身子一抖马上就死了。她马上意识到惹下了大祸了，丈夫赶着两头猪回家后，也是大惊失色。最后夫妻俩决定一不作二不休，马上又宰了一口猪，并将贼子的尸体做了处理，将手足及头挖坑埋掉，将内脏和肉与猪一同下锅煮成熟肉，等候国军前来买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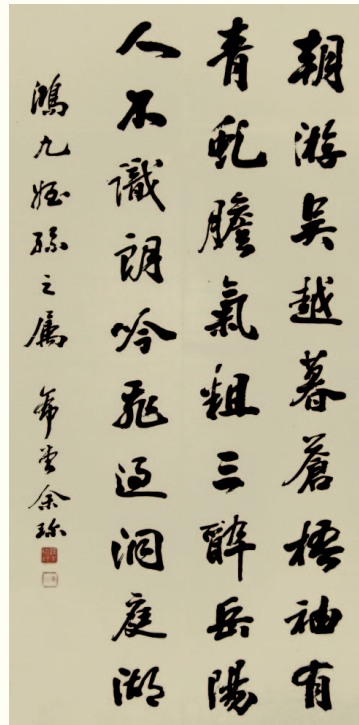
下午果然来了一伙国军，问道司务长前来买肉否，夫妻俩皆说未见。匪兵们骂道“早知这小子有贪污行为，果然他带款逃跑了”。一锅肉全卖给了这帮匪兵。事后夫妻绝口不提，谁也不知他们杀了一个匪兵，直到解放后才给亲友讲述了这段故事。但他们的名字一直保密。

借古董大店参展 酿名酒兰陵秘方

莒南县大店镇过去有户人家号称居业堂。民国时期主人名庄余珍，字希堂，号眉川，清光绪年拔贡，做过小京官内阁中书。致仕后专心练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也喜收藏文物。收藏有西汉名碑《庶孝禹碑》和东汉名碑《四面碑》。他还是收藏齐刀币的大户，有两套包括六字刀在内的齐刀币，莒国的青铜器多件。由于他对篆刻很爱好，还收藏了不少田黄和鸡血石的印章。总之他是当时临沂有名的收藏家。

庄余珍除了自己爱好收藏之外，还经常与亲朋好友进行交流。于是就萌生了聚展众家收藏的念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他父亲病故了，通知亲朋好友前来吊唁，报丧简子上写着“一律不用祭桌，只将家中的珍贵古玩带来展出即可，展后原物送还”。原来在抗战前临沂的大户人家在丧事中亲友要送祭桌，所谓祭桌就是祭奠亡人的供品，有看桌、糖桌、点心桌、菜桌、果桌、面桌等，这也是大店庄家的老例子。这次庄余珍自称“老太爷一生爱古玩，这次要让他饱一饱眼福”。

他首先做了展出的准备。庄家出殡时要从家门到墓地一路搭上席棚，这次不但搭了席棚，还准备了展厨，展橱皆镶上了玻璃，并雇专人看管以保证安全。一时间众亲友纷纷而来，古董珍玩琳琅满目，前来参观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据当时参观过这次展览的王晓六讲，展品中有几家大户的最佳。首推五莲管家窑管廷献家送来的一市斤重的田黄山子和玉



左为大店庄家旧居，右为庄余珍书法

如意。其他还有日照涛雒丁维普的明代古碑帖，费县东埠王燕谋的乾隆平西域铜版画，沂水刘家的宋元版本古籍，郯城庄坞杨家的一套清四王的山水画，苍山长辛桥宋家的十面汉唐古镜，兰陵王家的一套鄫国青铜器，临沭南古庄王家的一组清官窑瓷器，临沂城狄建鳌的一套古印章和一部《震前集柳》，纪家的一尊白玉观音造像和十把名家画的折扇。展出持续到丧事办完，展后展品全部完好退还本主。这次展示十分安全，未丢失一件，宾主皆很满意。这是抗战前唯一的一次展出，此后战乱不断，再也没有人举办这样的展览了。值得一提的是，庄余珍自己展出的田黄印章等，如今保存在莒南县博物馆，这也是这次展出的遗物吧。

临沂的名酒当推兰陵美酒。这是北方米酒的典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的兰陵酒就是铁证。此酒在兰陵延续了数千年。明代被李时珍写入《本草纲目》之中称之为金华酒，并指出它是山东兰陵所酿造，可见此酒在明代已闻名全国。当然最早还是唐代李白的诗，对此酒颂扬更是闻名遐迩。写得更具体的还是兰陵笑笑生的小说《金瓶梅》。这部明代的小说对金华酒的描写更是非常普遍，说明它是市民普遍饮用的酒。而且除了酒肆出售外，家族还自己酿造，也是赠亲友的重要礼品。这种世家大族酿造家酒的风气一直到清朝还在延续。临沂的末代进士王思衍，他家就是兰陵私家酿造兰陵美酒的典范。王思衍在兰陵镇村外的插柳口建有一座别墅，特别他致仕回家后过着隐居的生活，就亲自酿造兰陵美酒，供自己饮用和赠送亲友。

抗战前王思衍聘请临沂的塾师陈允升为塾师，教他家的子弟读书。陈先生在他家生活了数年，对他的酿酒过程十分了解。据陈先生讲，酿造此酒要严格按照配方，将米酒与药料装入瓮中，然后封口，时间是桃花开的时候封缸，等到桂花开的时候开瓮。这米酒是黍子米加麦麴酿造的，加入的配料十分讲究。这个配方王思衍一直保存在他的藏书大厅“听秋阁”里，空闲时陈先生将它抄录下来并带回了临沂。此配方一直保存在陈允升老家常旺村，幸喜是“文革”中并未丢失。现将其所抄配方公之于下：

“余设帐兰陵时，曾见听秋阁藏有兰陵美酒所加五味药材之配方，乃人参、枸杞、圆肉、大枣、郁金再加冰糖在缸内封存半载，即可饮用。其味甘醇，远胜坊间售者，故王氏

称之为五香药酒也，恐藏太久失传，故记之。”

这段记录十分重要，为研究兰陵美酒者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笑笑生乡音未改 蒲松龄沂蒙情深

明代小说《金瓶梅》描写一个家庭和市井众生相，用细微的手法将明朝社会生活描写的有血有肉，入骨三分。其作者只著了笔名兰陵笑笑生，他的真实姓名已不被人所知。因此，研究《金瓶梅》的人作了大量的考证，出现了几十个作者，但皆经不起推敲，所以说兰陵笑笑生就是兰陵笑笑生，他就是兰陵人。《金》书中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这些方言土语皆是兰陵一带的通行语言。

研究《金》书的专家梅节先生整理注释出版的《金瓶梅》在海内外最有权威，但他身在香港未到过兰陵，故对兰陵的方言土语不甚了解，因此注释的就不够确切：例如“花花黎黎”，“黎”就是临沂地区杂色的方言，外地人不懂，注释时给改成“绿”了，认为是排版之误，这一改却将原著给改错了；更有的词语只解释了一半，例如“秫秫小厮”，注者只知秫秫是高粱的别称，而不知道秫秫在兰陵一带俗称“青杆糙”，它实际上是骂人的谐音。其他土语尚有：料莫、葬弄、仵楂、倒腾、抵盗、剔竖、佯打耳聒、急急脚脚、叉口、富态、刁厥、情受、扑撒、存站、仰八叉、足此踩、楞睁、蛮声哈刺、砢磣、嚼蛆、生分、拔济、楂沙……，这一类的方言土语，临沂地区的人不看注释就能看懂，而外地人是看不懂的。

兰陵笑笑生在书中不仅使用了地方土语，而且地方名吃也随处可见。例如兰陵的名酒，当时称五香药酒，又称金华酒；地方名产糖蒜，在书中也是家常用菜；其他如十香茄子、五方豆豉等小菜，也是至今临沂的特产。

书中第六十七回有“枣胡解板”一词，释者将“胡”改为“核”，这就不是原汁原味的兰陵方言了，因为整个临沂地区对枣等的核称“胡”，至今未改。再如“羊甲葱”，如



清影松轩刊本《金瓶梅》插图

改成“羊角葱”就不通了，因为临沂一带对动物的角统称为“甲”，春天的葱生出两叶像羊角，故称“羊甲葱”。稍有点变化的是“五方豆豉”，如今称“八宝豆豉”，“十香瓜茄”如今称“十香酱菜”等等。有些至今未变，如“孝巾”，即现在的孝帽，其长度是一条裤腰料。也有的习俗和名词现在已消失了，如正月十五“走百病”的习俗，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流行，即正月十五要登上城墙走一周，即走去百病，如今这一习俗已不存在了。

尽管笑笑生离开了家乡兰陵到外地生活，写下了名著《金瓶梅》，但他的乡音并未改。他虽然写了外地的事物，如写临清的运河、报关、砖厂、太监、宴公庙……，但家乡的影子仍是临沂，如写西门庆自东京回家要过大关（穆陵关）经沂水回家。

明清两朝，山东有两部重要的小说《金瓶梅》和《聊斋志异》，《金瓶梅》作者是兰陵人兰陵笑笑生，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淄川人，但在《聊斋志异》中，也写了大量临沂地区的故事。粗略的统计有：

一、有关沂州州治者：《地震》、《莲香》、《柳秀才》、《堪舆》《商三官》。

二、有关沂蒙和称沂者：《阿纤》、《刘姓》、《医术》、《锦瑟》、《薛慰娘》。

三、有关日照者：《雹神》。

四、有关莒县者：《婴宁》、《二商》、《金和尚》。

五、有关郯城者：《莲香》。

六、有关费县者：《青城妇》。

七、有关平邑者：《九山王》。

八、有关沂水者：《钱流》、《辽阳军》、《杜翁》、《沂水秀才》、《司训》、《土偶》、《李伯言》、《金陵女子》、《罗祖》、《席方平》。

九、有关蒙阴者：《小梅》。

十、有关蒙山者：《牛瘟》、《颠道人》。

以上这些故事皆有出处，而且影响至今。如临沂城西关过去一直称八蜡庙，但自《柳秀才》一文后即称“蚂蜡庙”，由男神改为女神，至今还称“蚂蜡庙街”。《牛瘟》的故事影响至今，过去临沂城西艾山上即建有牛王庙，内中即供养着“牛瘟神”。有些地名至今未改，如《莲香》的故事发生在郯城红花埠，至今该地仍称红花埠。为什么《聊斋志异》中临沂的故事这么多，而沂水的故事又特别多，这里值得探讨的。

写作来源于生活。作者如不亲临其境哪能写出这么多生动的故事，有的甚至直名道姓：如《堪舆》，直指是“沂州宋侍郎”，宋侍郎即是明末在京做官的宋之普；《钱流》直书沂水刘宗玉，刘姓乃沂水之大姓，其家族出名人甚多，刘家一向是注重教育的，他们每户皆有家塾，专聘名师教学，从蒲松龄的年谱中，并无他在沂水教学的经历，但他经常离家教学是事实。据沂水刘姓族人传说，当年蒲松龄曾在他家教学，故他写沂水的故事特多就不足为奇了。从沂水到各县和名山蒙山他可能皆有采访，故而才写出了这么多临沂的故事。如《地震》一篇，是研究临沂地震的重要资料；《牛瘟》一篇中的治牛瘟药方“苦参散”，一直是临沂农村治牛瘟的良方。

中山寺东坡留诗 翠云观竹年书碑

蒙阴县坦埠镇有一座中山，山上有座千年古刹中山寺。此寺几经兴废，现尚保留着几棵汉松和唐银杏树，更宝贵的是寺内还保存着两块石碑，一块是唐白居易的诗碑，一块是宋苏东坡的诗碑。这两块名碑清代的蒙阴县志中皆有著录。白居易到未到过中山寺现在尚无法考证，苏东坡到过中山寺是有据可查的。

苏东坡诗碑的全文是：“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王室金堂余汉士，桃



右为蒙阴中山寺，左为中山寺苏轼碑

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春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滂冰轮。宿九仙山子瞻”。九仙山在今五莲县。原来苏东坡曾做过密州太守，这密州就是现在的诸城，苏东坡是有名的旅行家，凡到过的地方，皆留下他的诗词或书迹。诸城离五莲县是较近的地方，而九仙山又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苏东坡自然会去游览的，当然也一定要题诗的。此诗载于《苏文忠公诗集·卷十》。他既到了九仙山，当然还要去中山寺，因为中山寺是名刹，而且中山的风景更是清幽动人。苏东坡每到一处皆喜欢参观名山古寺。这次苏东坡在中山寺未曾题诗，却将在九仙山的诗句题在这里了，因为九仙山的诗句放在中山寺也还合适。由此推断苏东坡在诸城期间曾游过九仙山和蒙阴的中山，到蒙山也不是没有可能。令人欣慰的是这石碑还完好地保留在中山寺，成为中山寺的重要文物。

蒙山的东支称东蒙或云蒙，它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是旅游胜地。山之顶峰有天麻场数十亩，其平如砥。清光绪二十五年春夏之交，天旱无雨，四周村民登山祈雨，果降甘霖，故在天麻场建“东蒙山嘉惠昭应王庙”，民间俗称雨王庙。此庙与龟蒙的蒙祠遥遥相对，两庙实则祀蒙山之神。东蒙的这座雨王庙虽然不古，但却有一名碑，全称是《东蒙山嘉惠昭应王庙碑铭》，此碑为“前沂州府教授现校士馆教育习尹彭寿撰文并书”。

尹彭寿，字竹年，山东诸城人，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琅邪书院教授，撰有《说文解字补》、《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石刻考证》、《石鼓文汇》等著作。他擅写隶书各体，蒙山上的这块名碑即是以隶书所写。此碑由三块石灰岩拼成，书写工整，是他隶书的代表作。此碑在山顶翠云观西侧山坡上，一向不被人发现，故一直保护很好，未有残损，如今被发现，又增加了临沂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孙兰修智斗顽敌 八路军活捉小川

天主教临沂教区有一位96岁的老贞女，名叫孙兰修，圣名路济亚，解放后曾获得山东省“三八红旗手”，省宗教界先进工作者称号，是沂南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县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大夫。直至她安然逝世前，每日还要为省内外患者治疗。《大众日报》、《文

汇报》、《临沂大众》、《联合周报》、《中国天主教》、《临沂宗教志》、《临沂文史集粹》等书报刊，曾以《沂河岸边“林巧稚”》等为题对她的事迹做过报道。这里仅介绍她部分爱国爱教的事迹。

孙贞女热心事主爱主爱人，她在今沂南县的黄埠村传教和行医，是一位祖传的骨科大夫。她在黄埠村的小教堂里设了个小小的门诊，在当时的沂蒙山区这是少有的。

孙兰修不但是一位热心事主的好贞女，而且还是一位爱国爱教的“红大姑”。正当日寇在沂蒙大地烧杀抢掠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进了沂蒙山区，抗日救国的烈火燃遍了沂蒙大地。纪律严明的八路军开进了黄埠村，军民打成一片。战士们对孙贞女非常尊重，很有礼貌的称她为孙大姑，除了给她打扫堂院外，从不进入圣堂。不久一位部队首长带领几个伤员前来治伤。孙贞女精心的为战士治伤，使之很快康复。部队领导送来了礼品和银元答谢孙贞女，孙贞女说什么也不收。由于敌伪的封锁，八路军缺医少药，孙贞女冒着风险到临沂城，从主教堂带回了珍贵的西药和医疗器材，她的小诊所几乎成了八路军的野战医院。从将军到战士，伤员都得到了她的精心治疗。她还给徐向前元帅的战马治过伤。

在一次日寇的大“扫荡”中，八路军撤出了黄埠村，但有6名伤员留在了教堂，徐向前的战马也留在了教堂。侵略军闯进了教堂，这时三间圣堂内只有几个老年教友在念经。堂门大开，祭台上供着一尊露德圣母像，两旁摆放着芬芳的玫瑰花，整个圣堂呈现了庄严肃穆的气氛。一个名叫小川的日寇小队长，带着几个鬼子在院中搜了一阵，没发现目标就要进入圣堂。这时孙贞女不慌不忙地走出圣堂，对日寇说：“你们不能进！”日寇如入无人之境，谁敢阻拦，马上说道：“为什么不能进？”孙贞女义正严辞的告诉日寇：“圣堂是神圣庄严地地方，你们身上沾满了血污，若进入圣堂亵渎了天主，天主马上要降罚的，如果不信你们会后悔的。”说着让几个老年教友从圣堂走了出来。圣堂中什么人也没有了，鬼子伸头探脑的向圣堂看了看，确实没发现什么人，说了一声“开路”就要走。这时突然一个汉奸跑来，向鬼子报告说：“太君，后院发现了一匹马。”小川喜形于色，带着孙贞女奔向了后院，只见马厩里果然有一匹纯白色的马，小川马上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向孙贞女道：“这是八路的战马，你私通八路。”这时众教友皆为孙贞女捏了一把汗。只见孙贞女不慌不忙，十分自然的对日寇说道：“这是我自己的马，怎么会是八路的马呢？”小川马上说道：“你在撒谎，女人的要马什么的干活？”孙贞女马上答道：“我骑着它进城去买药。”鬼子哈哈大笑：“撒谎！你会骑马？欺骗皇军死了死了的！”一个日军前去牵马，突然马飞起后蹄将他踢倒在地。狡猾的小川向孙贞女说道：“既是你的马，就请你骑上去给皇军看看。”只见孙贞女走近马前，这战马看到给它治伤喂养的亲人，马上就亲孙贞女，孙贞女解开绳子顺势骑上这匹马，在院中走了一圈。孙贞女跳下马，向小川言道“太君你的骑马”，吓的小川连忙退后，并说道：“你骑马的本领大大的好。”这群野兽就这样离开了教堂。等鬼子走后，孙贞女将藏在圣堂里的伤员接了出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孙大姑智斗顽敌的英勇精神。不久反“扫荡”取得了胜利，小川这支敌军被消灭在一个山沟里。巧得很，这小川因受伤被俘了，被八路军押着来请孙贞女给他包扎。这时孙贞女正和部队首长亲切谈话。孙贞女一面给他治伤，一面告诉他：“我们实行人道主义从不虐待俘虏”。小川听后抬起头来向孙贞女问道：“你的是……”不等他说完，孙贞女马上回答道：“我的八路，你的不要害怕。”从此沂蒙山区的老乡都称她为“八路女医生”。

“东莞”地名南迁 与青、徐士族南渡 (一)

李 沅

查阅史籍，在中华大地上有三个“东莞”，即广东的东莞、江苏的东莞和山东的东莞。

《辞海》对“东莞”的注释为：

1、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省沂水，南朝宋移治今莒县，隋初改名东安。

2、郡名：①汉建安初分琅邪、齐郡置，治所在今沂水东北。辖境相当今山东临朐、沂水、蒙阴、沂源等县地。②东晋侨置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东南。

3、县名，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东部，东江下游，汉为博罗县，东晋为宝安县，唐为东莞县（置所在今深圳市西）地。

从历史发展顺序看，汉时的东莞在山东。晋时的东莞一在山东，一在江苏。江苏的东莞是从山东迁移过去的，所以称“侨县”，又称“南东莞”，意



为同时还有个“北东莞”。唐时，将广东晋朝的宝安县改名为东莞县。因此，山东的东莞最早，广东的东莞最晚。

位于山东、江苏、广东的这三个东莞，其名称相同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有其内在联系？即三个“东莞”有没有氏族、家族的血缘关系？本文就此问题作一些历史的考察：

在中国的历史版图及行政版图上，异地同名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一现象早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并成为了历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著名历史学家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部落迁移之后，地名随之，愈迁愈远，地名亦随之愈远。前代史籍，时有同名之地，散见各处，胥由于此。原在山东迁于江苏，则江苏有共地矣。更迁于安徽，则安徽有其地矣。再迁至鄂、至湘，莫不皆然。地愈远者迁愈晚，地愈近者迁逾早，地虽不同，名无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判断，山东、江苏、广东的东莞，应该有其内在的联系，是居住在古东莞地区的若干氏族、家族南迁和再南迁后，将原来的地名亦迁至新地，用原来的地名命名新住地的结果。

一、东莞之初，在山东沂水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齐悼惠王刘肥，高祖（刘邦）长庶男也。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也就是说西汉初年，山东能言齐语者，皆为悼惠王子的封地齐。

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齐王刘肥弟刘章）为城阳王（城阳先“郡”后“国”，均治今山东莒县城）。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城阳共王子刘吉侯东莞，属琅邪郡。《汉书》也载：“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王子吉为东莞侯”，东莞为县邑此为最古。这是史书上关于“东莞”的最明确也是最早的记录。

《汉书·表》载：“高阳侯薛宣，以承相侯，千九十户。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四月封。”封地为东莞。刘吉封东莞100年后，东莞又成为薛宣的封地。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载：黄巾起义时，泰山郡华人臧霸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观兄孙康，从陶谦聚众破黄巾军，屯兵开阳（琅邪国治）后曹操“以霸为琅邪相，（吴）敦利城，（尹）礼东莞，（孙）观北海，（孙）康成阳太守。”这件事大概发生在公元200年前后。

《资治通鉴》载：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二月，立皇后张氏，大赍。后，故凉州刺史既之孙，东莞太守缉之女也。”是说魏齐王曹芳，立东莞太守张缉之女为后。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引谢承《汉书》曰，赵昱年十三，母病三月，惨戚消脊，至目不交睫，“乡党称其孝，就处士东莞”，后为广陵太守。

综上所述，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封城阳共王子刘吉为东莞侯；公元前20年，汉成帝时，高阳侯薛宣封地为东莞；公元200年前后，曹操封挫败黄巾军有功的尹礼为东莞太守。广陵太守赵昱曾隐居东莞。

东莞地望何处？

《后汉书》载：琅邪国“东莞，有郛亭，有邳乡，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春秋·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杜预注：“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曰邳来间。”

关于“浮来”的地望，《水经注疏》曰：“沂水又东迳浮来之山”。守敬按：“《九域志》沂水有浮来山；《续汉志》，东莞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沂水县志》谓即《隋志》东安县下之松山，在今县（沂水）西北80里。”

关于“邳乡”地望，杜注：“东莞县北有邳乡”。《水经》云：“沐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东南流迳邳乡南，南去县八十里许。”守敬按：“据《注》似西北下有大弁



山。”《明史·地理志》：“沂水县西北有大弁山，今沭河出临朐县南，沂水县北之沂山。”这里标示“邳乡”在东莞县北80里沭河西北处。《水经注疏·沂水》又云：公来山“在邳乡西，故曰邳来间。”这里标示浮来在沂水西，邳乡在沂水东，在东莞县城北80里许。

沂水继续东南流经东莞县故城西。今人王汝涛等考证，汉东莞县遗址，即今沂水县城。

汉徐州琅邪郡东莞县旧址，在今沂水县城。后汉末于东莞县地置东莞郡，郡治所在今沂水县城北40里的高桥乡。《太平寰宇记》：“惠帝，东莞郡移理莒城。”刘宋徐州东莞郡治莒县，又东莞县，遗址在今莒县城北的东莞乡之东莞村。

又据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当时东莞郡领县五，除东莞、沂水、莒外，还有临朐、寿光。

由此观之，从西汉到刘宋，东莞县、郡之名和治所，多有变动，但均在今沂水、莒县以北地。最早的东莞县址在今沂水县城。

二、汉末南迁荆、扬二州的青、徐士家豪族与流民

（一）北方流民和士家豪族向益、荆、扬三州的迁移

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始，大一统的东汉帝国瓦解，中华大地进入了内部倾轧，外族入侵，军阀割据混战，人祸加天灾的持续不断地动乱、分裂局面。从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十六国之乱，到东晋灭亡，江南宋齐梁陈的更替，一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才结束了东汉灭亡后的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割据和动乱。在这400多年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就是北人南迁、南北融合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南移。

北方世家豪族和流民的大量南迁，应从东汉末年算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北方中原地带遭受不断的战争破坏，人口死亡是很多的，未死的人口也大量地向外逃亡。这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大流动的时期。当时人口移动的方向，有向西的，关中三辅一带的人口向陇右迁移；有向北的，《后汉书·刘虞传》：“青、徐士庶，避乱归虞（于幽州）者，百余万口。”但主要的是向南，“向南逃的，仍是以益、荆、扬三处为三个集结点。所以有“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汉末大乱，徐方士民避难扬土”。汉末晋初，90年的战乱，全国人口由5000万减到700万，对此何兹全先生说：“三国及西晋户口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的逃亡，不向政府注册，及依附豪族变成大量豪族的户口。”

（二）迁入荆、扬二州的北方人

汉末晋初的北人南迁，一种是世家豪族带领宗族、佃客、部曲及依附于自己的流民的集体迁移，一种是军阀、官吏带领官兵和部曲等的征战调防。三国时的军阀武将，转战各地，都带领着自己的宗族、家兵、部曲。“则当时居军中者，多有宗族相随”，“田畴归魏太祖，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邳”，“田畴入徐无山数年，百姓归之者五千余户”，“畴与管宁、邴原、王烈等，能为流人之主”。

汉末晋初，迁入长江中下游的北人集团有：

1、徐方万口。丹阳人陶谦，为徐州刺史，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依陶谦，并大修浮屠寺，每浴佛，就食者万余人。时曹操击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琅邪人）以宾礼。”笮融杀赵昱，后奔豫章（今南昌），被扬州刺史刘繇打败（《后汉书·陶谦传》）。徐方万人肯定被刘繇俘获，成为刘繇的部众。

2、扬州刺史刘繇。刘繇，山东东莱人，伯父刘宠为豫章太守、会稽太守，属早期南

迁汉人。刘宠弟刘方二子：刘岱、刘繇。刘岱“虚及爱物，为士所附”；刘繇有盛名，诏用为扬州刺史，“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丹阳笮融依繇为盟主”。说明这时刘繇接纳、统领了很多南迁士友和宗族。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繇与（孙）策战，兵败，走丹徒。”策告谕部下，其刘繇故乡部曲不降者，一律善待，“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刘繇的两万余青、徐人又归附了孙策。刘繇奔豫章卒，剩余的士众万余人欲奉豫章太守华歆（华歆，山东平原人，与北海朱虚人管宁、邴原为游学之友）为主，歆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其众未有所附，散居民间。由此可知，刘繇的数万故乡、兵卒、部曲，一部分归属了孙策，另一部分散落到了民间。散落民间者，官府就称为“宗贼”、“盗贼”。这些散落民间的青、徐汉人，后来又被孙权讨伐，收编到了扬州。刘繇的同乡东莱人太史慈被孙策挫败俘获后，成为了孙吴政权的谋士和说客。

3、上缭、海昏的青州人。《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载：“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

《三国志·太史慈传》：“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聚，作宗伍。”《三国志·魏志·刘晔传》载：“上缭虽小，城坚池深。贺所筑。”《通鉴纪事本末》载：“遂伐上缭，至海昏，宗帅知之，皆空壁逃迁。”说明上缭、海昏是城池壁垒，居住宗民万余家数万人。此城邑主人是“贺”，“贺”是谁？数万人是何方人士？《汉书·王子侯表》：“海昏侯贺，昌邑哀王子。（封地）豫章”。昌邑哀王，武帝子。昌邑王贺，武帝之孙，本为太子，因荒淫无度不务正业，“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为了不使昌邑王贺干预朝政，把他发配到了远方。原奏发配到房陵，实际上发配到了豫章，宣帝封为海昏侯，给他的待遇就是沐邑二千户及王家的财物。豫章郡有昌邑城、有西安县、乐安县。而昌邑、西安、乐安，都是青州的古县名。上缭、海昏的万余家中，至少有两千多户是从青州昌邑迁移过来的。

（三）江东孙吴政权的主要政治军事基础是青、徐士家

富春孙氏本属“孤微发迹”（《三国志·吴书·孙坚传》陈寿评），出身寒门，非世家大族，在江东更无乡土势力可依。《孙坚传》载：“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此时孙坚为朱的左军司马），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这就是孙氏的政治起点。

孙氏原本是袁术的部曲，“所以孙策从袁术索得的孙坚余兵，主要应是后来陆续招募补充的淮、泗兵”，“孙策率领过江的军队，以淮、泗人为主体的”。后破刘繇得兵两万余人。刘繇，东莱人，刘繇兵也多为青州兵。

“在牧守混战之际，皖北、鲁南一带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带领了他们的宗族、宾客、部曲南渡之后，急切需要避难的立足点”，而孙氏政权要在江东立足和扩展疆域，也必须倚赖这些流寓到江东来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对孙氏政权有重要影响的青徐之士族有：

（1）张氏家族。张昭，彭城人，“少好学，善隶书从自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张昭对孙权，“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三国志·张昭传》）张昭的发小和学友一是琅邪赵昱，一是东海王朗，如《三国志》载：“时选三署郎补县长，琅邪赵昱为吕（莒县）长，东莱刘繇下邑长，东海王朗留丘长。”因此张昭同与赵昱、王朗、刘繇为友。张昭侍权，不只是他个人，而是依附于他的群体，如《张昭传》所言：“及昭辅权，绥服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这个别群体多为青、徐士人。

张昭子张承、张休、张奋，都是孙氏政权中的文臣武将。张承“与诸葛瑾、步骘、严峻相友”，官至奋威将军，封都乡侯；张奋，平州都督，封乐乡侯。张昭孙，张承子有都



乡侯张震。

(2) 诸葛氏家族。诸葛瑾、诸葛恪家族，琅邪阳都人（今山东沂南），诸葛亮胞兄。汉末移居江东，诸葛瑾受到孙权优礼，以绥南将军代吕蒙为南郡太守，孙权称帝后，官至大将军。

诸葛恪，诸葛瑾长子，年轻时就为孙权器重。孙亮继位后，以诸葛恪为太傅，新秉国政；滕胤为卫将军，统领军政。诸葛恪弟诸葛融为奋威将军。诸葛恪有三子，长子诸葛绰，骑都尉；次子诸葛竦，长水校尉；少子诸葛建，步兵校尉。

诸葛直，诸葛瑾次子，《吴主传》曰：“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3) 滕氏家族。滕胤，北海剧人（今山东寿光）。滕胤父滕胄，伯父滕耽，与东莱人刘繇一起避乱渡江，后事孙权，滕胄为车骑将军，滕耽为右司马。滕胤父“胄善属文，（孙）权待以宾礼，军国书疏常令损益润色”（《三国志·滕胤传》）。滕胤三十岁时就为丹阳太守，封都亭侯、高密侯，孙亮继位后，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成为孙氏王朝的左右手。

(4) 依附江东孙氏政权的其他青、徐名士。

太史慈，山东东莱黄县人，黄巾乱时，与北海相孔融、平原相刘备为伍，刘备遣三千精兵随慈，后过江亡入山中，成为山越首领，自称丹阳太守，后为孙权折冲中郎将，收编刘繇余众万余人，守海昏。《三国志》曰：“孙权统事，以慈能制譬，遂委南方之事。”

华歆，山东平原人，华歆是聪明绝顶的大儒，是没有权力欲望的贤人，刘繇时为豫章太守。刘繇死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华歆为主，华不受。太史慈对孙策说：“华子鱼良德也。”

严峻，彭城人，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孙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及横江将军，鲁肃卒，权以峻代肃，督兵万人，镇据陆口”。（《三国志·吴志·严峻传》）后为尚书令，著《孝经传》、《潮水论》。

徐盛，琅邪莒人，遭乱避江东，权以为校尉芜湖令，后遣建武将军封都亭侯，领庐江太守，赐临城县为奉邑。

（四）江东孙吴政权的青、徐情结

在江东孙吴政权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中，青、徐士家的张氏、诸葛氏、滕氏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了十分重的作用。孙吴政权与青、徐士家的政治、历史情结，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两点，一是孙氏封王多用青、徐之地名，二是孙家与青、徐士家结成的盘根错节的婚姻关系。

1、孙氏家族的所封之王赤乌五年（公元）立子和为太子，八月立子霸（太子和弟）为鲁王。太和二年（公元）春正月，吴主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仲姬子子奋为齐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太子继位后，徙齐王奋于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阳。

汉时传统，男子封王，女子为公主。江南东吴孙氏封子为王，承继汉礼，实际上是承认自己的血统为北方汉人，是吴承汉制。《三国志》曰：孙坚，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史记·孙武传》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越绝书》曰：“吴县巫门外大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三国志集解》按：“孙武之后，传于吴越，当原于此。”

这些记载说明，孙氏的远祖是军事家孙武。孙武本齐人，战国时被吴王阖庐重用，家族由山东迁入江南。因此孙氏政权有山东情结，诸子封王时用齐、鲁、琅邪之名。

2、孙氏与青、徐名流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

吴主孙权王夫人，琅邪人。王夫人生子和，初立为太子，封为琅邪王，娶张承女（张昭孙女）为妻，即张夫人。《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载：“初，（张）承丧妻，（张）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孙）权闻而劝焉，遂为婚。”在孙权的干预下，张昭子张承娶了诸葛瑾的女儿为妻，张昭和诸葛瑾成了亲家。《张昭传》还载：“生女，权为子和纳之。”张承和诸葛瑾女成婚后生女，孙权又将此女纳为儿媳，成为孙和夫人。此孙夫人，即是张氏女，双是诸葛氏的外甥。孙氏与张氏，与诸葛氏，成了亲戚套亲戚。

孙和子孙皓即位后，立皇后滕氏。《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载：“孙皓滕夫人故太常（滕）胤之族女也。”孙皓夫人，为太常滕胤之族女。滕胤，丹阳太守，北海剧人。但东汉末，剧县属东莞郡，也可以说滕胤是东莞人。《资治通鉴》卷七十七曰：“吴滕胤、吕据之妻，皆夏口（今江苏镇江）督孙壹之妹也。”

孙壹之妹，即孙奂之女，而孙奂乃孙坚季弟孙静之子。孙奂是孙权的堂兄弟，滕胤之妻，孙奂之女，也既孙权侄女。滕胤之女，又是诸葛恪中子诸葛竦之妻。

综上所述，汉末及三国时期，江南扬州，甚至于孙吴政权中，已经有大量青、徐士家，并与青、徐文化难舍难分。

第一、青州、徐州地名鲁、琅邪、齐、东莞（东莞原属徐州琅邪，后从琅邪分出立东莞郡，含青州的临朐、寿光等县）成了孙权的儿子们的封王称号，孙吴政权对青、徐，尤其是对琅邪、东莞的偏好，表明孙吴下政权与琅邪、东莞有着内在的文化或者血缘的联系。

第二、青、徐士人或者宗族，在孙吴政权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在江南扬州地区有大量从青、徐二州以各种名义迁移过来的北方人。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青、徐地名随氏族、士族迁到扬州就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哪个氏族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时间在新居地用老居地的子命名，这就受偶然性的支配。上述的引证、叙述、分析，只能说明在汉末、三国时期，“东莞”地名落地扬州，或者说落地京口，或者落地丹阳，都有可能。但这时可能性还没有变成现实性。今江苏常州地区出现“东莞”地名，是东晋时发生的事。

临沂钩沉之符氏巾帼

高 雷

符姓作为琅邪郡望始见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唐写本《贞观姓氏录》（亦称《氏族志》残卷）。唐代与符氏同为琅邪望族的王、颜等姓，早在东晋时就将琅邪作为氏族的地域标志，这有出土墓志可以佐证。而符氏在琅邪的出现似乎晚些，现在可接触的符姓墓志最早为唐代，而且符符通用，其姓氏来源扑朔迷离，不排除有南北朝之间民族融合的成分，李世民修《氏族志》，看重的是门阀，胡汉一体，不分彼此，这一点应该引起重视。

琅邪符氏的表现唐末宋初达到高峰，朝廷亦对其家族恩礼有加，迟至宋明道二年（1033年）仍“食临沂县户三百”（《宋史》）介绍依然是琅邪望族。本篇选取的是符氏家族的巾帼英雄。

《东都事略》中讲：“诗称‘关雎’之德，所以正夫妇而化天下也。是以辅佐君子，有逮下之仁而无嫉妒之心，怀进贤之志而有忧勤之念。用能助成一代之治，以兴太平之基。”中国是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人伦秩序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齐家治国才可以平天下——家庭的稳定被视为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环节。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母亲，这个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女性是家庭必不可少的成员。作为妻子、母亲在家庭中的具有崇高地位。《孔子家语》中说：“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而作为封建王朝的一国之母，则有着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母仪天下。

符氏女性有着辉煌的历史，符彦卿一门三皇后一夫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李世民说过：“氏族之美，实繁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义。”（《贞观政要·卷七》）

宣懿皇后符氏，郡望琅邪，籍贯河南陈州宛邱县（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祖父符存审，历经三朝，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后唐天成年间追封为秦王。父亲符彦卿。后汉之时历任多处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封魏国公，拜守太保。史载符氏：“后世王家，出于将相之贵，为人明果有大志。”

符氏初嫁后汉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的儿子李崇训。有个占卜的高人，能够辨别别人的声音决定吉凶，李守贞邀请到家让他听一下符氏的声音，占卜者吃惊地说：“这是皇后啊！”李守贞早就心怀不轨，得此信息更加嚣张，说：“我的儿媳妇都是皇后，我夺取天下还有什么疑问？”于是决定叛乱。后汉派遣枢

密使郭威讨伐，乾祐二年（949）三月城破李守贞自焚死，李崇训知道无法避免祸患，自己动手杀死了弟弟、妹妹，然后寻找符氏，符氏藏到了屋子角落里，用帷幔遮蔽着自己身体，李崇训慌忙之中来不及细寻，只得了断了自己。后汉士兵攻入内宅，符氏庄重地坐在堂上，凝视着士兵说：“你们的长官郭威同我父亲有故旧之交，不许你们对我无礼！”士兵见此情景不敢靠近。郭威进入城中，令人访求符氏的下落，听说了这件事，大为赞赏，说：“此女于白刃纷拏之际保全，可谓非常人也。”（陶岳《五代史补》）即刻派人护送回符彦卿家。符氏深感郭威的不杀之恩，拜郭威为养父。

司马迁创纪传体写史，注重细节的描写，以小见大，旧、新五代史也沿袭了这种手法。上面这段史实，分为三个层次描绘了符氏内在的品质，占卜者耳中的举止得当，士兵眼中的处惊不乱，周太祖郭威口中的欣赏赞叹，表现了符氏的大家风范，也为符氏的皇后之路做了铺垫。

符氏的母亲认为符氏丈夫全家罹难，而符氏“独脱死兵刃之间”是佛祖保佑，劝说符氏出家，削发为尼，报答佛恩，符氏拒绝说：“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毁形发为！”

（《新五代史》）她母亲只能就此了之。家中出了朝廷的叛逆，符彦卿身为国公，两难为之。符氏心地坦荡，打消了他的顾虑，周世宗柴荣“素以后贤，又闻命不以出家为念，愈贤之”。（《五代史补》）这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历史由此转折。后汉乾祐三年十一月（950），后汉隐帝不顾太后的劝阻，听信谗言，诛杀顾命大臣，派官兵包围郭威开封私邸，“极其惨毒，婴孺无免者”。（《通鉴纪事本末》）郭威的眷属，包括养子柴荣的妻子刘夫人无一幸免，郭威与柴荣由于领兵在外，躲过一劫，被迫举兵进京——清君侧，史称“郭威篡汉”。

公元951年郭威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周，建元广顺，是为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冬（952）身为皇帝的郭威基于惨遭灭门，养子柴荣“未协伉俪”（《符彦卿妻张氏墓志铭》），不得不为国家社稷作出安排，主动向符彦卿家登门求婚，“纳（符氏）以为继室”。

是什么原因使符氏能够“垂于天眷，荐臻宫掖，愈盛门庭（《符彦卿妻张氏墓志铭》）”呢？

首先是符氏的内在品质，其次才是符氏的显赫家族。中国古代对一般妇女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东汉班昭的《女戒》里。内中总结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一是妇德，二是妇言，三是妇容，四是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妇德不一定要聪明绝顶；妇言不一定要伶牙俐齿；妇容不一定要装扮得鲜艳美丽；妇功不一定要技艺精巧过人。娴静贞节，能谨守节操，有羞耻之心，举止言行都有规矩，这就是妇德。言辞和内容都要有所选择，不说恶劣粗俗的语言。说话选择时机而说，以免引起他人的反感。污秽肮脏的衣服，及时地清洗干净，把衣服晾晒得整齐。按时洗澡沐浴，身体保持干净，不存污垢，着装打扮得体，这是所谓的妇容。专心纺纱织布，不喜欢戏笑打闹，能做好可口的酒菜，用来招待宾客，这是妇功。此四项，是女人的大德，不能缺少的。而对于皇后，那时则有更高的规范要求，为此唐太宗刊行了长孙皇后的《女则》，称其“足以垂范百世。”（《资治通鉴》）。《女则》今已佚失，而在宋朝以前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新唐书》中说里面记载的是“开本源，恤末事”。大致内容为：居安思危，举贤纳谏。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符氏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这种规范标准。换一个角度讲，作为一个再婚的女人，柴荣看中的是符氏的素养，而郭威看得更为深远，那就是皇后的作用，辅佐君王，长治久安，所以才



促成了这门婚事。

作为一个政治家，郭威服务前朝的时候就十分看中皇后的作用。乾祐二年（949）五月庚子，顾命大臣郭威前往邺都镇守，向朝廷辞行时，告诫后汉隐帝说：“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禀其教而行之。”（《通鉴纪事本末》）可谓意味深长。郭威全家被杀后，挥兵入京，进入京城后凡军国大事还全部请示后汉太后，按照指示推行实施。“及周太祖为六军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愿事后为慈母。周太祖即位，上尊号曰德圣皇太后”。（《旧五代史》）

当然，不能忽视符氏家族的背景；但关键的是符氏家族文化素养的厚积薄发，家庭的熏陶，正统的教育，蕴育了符氏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的人格特质，使她脱颖而出，从而达成了与后周的政治联姻，走上了政治表演的前台。

周世宗柴荣即位，册封符氏为皇后。周世宗柴荣，五代后周第二代皇帝，郭威养子，在位六年，期间励精图治，政治上澄清吏治，颁行《大周刑统》，整顿科举，破格用人；经济上奖励农耕，励行两税法；军事上严肃军纪，裁汰老弱，加强禁军。从955年起先后取得后蜀的秦、凤、成、阶四州和南唐的淮南14州，北伐契丹，收复瀛、莫、易三州和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作为辅佐，符皇后功不可没。“世宗办急多暴怒，而后尝追悔，每怒左右，后必从容伺颜色，渐为解说，世宗意亦随解，由是益重之。”（《新五代史》）后周显德三年（956），周世宗柴荣下诏亲征南唐，符皇后认为周世宗不宜亲行，陈述利害，反复阻止，世宗不听，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符氏自愿同行，奔赴战场，皇后亲临前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史载：“会大雨，营中水深数尺，攻具及士卒死亡颇多，粮运不继。”（《资治通鉴》）援军违令不到。“后以忧成疾”。（《新五代史》）回至京师后，于显德二年（955）七月在滋德殿病逝，终年26岁。世宗对符氏之死悲痛万分，为其服丧七日，谥曰“宣懿”皇后，十月，葬宣懿皇后于新郑，陵曰懿陵。史称大符皇后。

中国古代帝王、后妃、大臣等人死后，由朝廷根据他们生前事迹和品德，评定一个称号以示盖棺定论，称为“谥法”。有美谥、平谥、恶谥之说。符氏死后被谥为“宣懿”。

《逸周书·谥法解第五十四》中解释：“圣善周闻曰宣，温柔圣善曰懿。意思是说大符皇

后知书达礼，性格淳朴贤惠。更深层的意思是：家国大事未能如愿以偿，终身缺憾。所以有“‘圣善周闻曰宣’，施而不成”。

宣慈皇后符氏，世称小符皇后。魏王符彦卿次女，大符皇后之妹。据载大符皇后（宣懿皇后）病重时，自知大限将至，因放心不下四岁的儿子柴宗训，向周世宗荐其二妹代为照管，周世宗遂将其纳入宫中。显德六年（959）四月，周世宗北伐燕国，在取得了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身体患病，不得不返回都城大梁。显德六年六月，周世宗病情日趋严重，感到自己势将不起，在病床前作出了最后地安排。六月初九，立符氏为皇后。同一天下达了封皇子的诏命：“立皇子宗训为梁王，领左卫上将军，宗让为燕王，领左骁卫上将军。”

（《资治通鉴》）仅过十天，丢下了身后的幼儿寡母，柴荣撒手西去。7岁的柴宗训即位，尊小符皇后为太后，由符太后临朝听政。周世宗北伐之时，曾接到密报：“云：‘点检作天子’。”（《宋史》）为此果断的撤换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郭威的驸马）的职务，然而此点检非彼点检。显德七年（960），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胤（赵匡胤之弟）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史称这一事件为“陈桥兵变”。赵匡胤欺人幼儿寡母，黄袍加身，缺少法理基础，不得人心。后周宰相范质当面指责他说：“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王称《东都事略》）所以他急需寻找一个合法的身份，范质告诉他只有走禅让的道路。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太后如母，养少主如子，无负先帝旧恩。’”太祖挥泪许诺，然后率百官成礼。”（王称《东都事略》）作为禅让的参与者和决策人，小符皇后审时度势，顺应历史的潮流，避免了大的流血冲突，得以使宋名正言顺地继承后周的政权。宋人在《宋季三朝政要》记载这件事时仍然认为“宋太祖受周太后、恭帝禅”。可见符太后的关键地位。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奉周帝（柴宗训）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续资治通鉴》）特别命令“所司供给，务令丰厚”。（徐松《宋会要辑稿》）

建隆三年（962），年刚九岁的柴宗训被贬居房州，11年后，即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三月，不明不白死在了居住地。留有皇子五人，公主三人。柴宗训死后小符皇后出家为尼，号玉清。淳化四年十月（993），符太后薨，谥号“宣慈皇后”，宋廷以皇后礼葬于懿陵西北。

宋太宗懿德符皇后，名符金定（942-976），魏王彦卿第六女，周世宗宣懿皇后的妹妹。周显德中（956），归赵匡胤，为继室。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封弟赵匡义妇符金定为汝南郡夫人，进封楚国夫人。开宝六年（973），赵匡胤封晋王，太祖改封符金定越国夫人。开宝八年薨，年34岁。葬安陵西北。

太宗继位，追册符金定为皇后，谥懿德，享于别庙，位列太宗结发之妻淑德皇后之上以致引起了朝廷之中关于礼制之争。对于这种不寻常的情况，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先帝尹正京尹，固已疏封越国，晋邸之建，实有内助之功，则是及统百揆而亡也。”（徐松《宋会要辑稿》）反映出她在晋邸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端拱二年（989）五月，懿德皇后母亲杨氏过世，太宗辍朝。太宗至道三年，赵匡胤驾崩，宋真宗继位，诏有司议太宗配飨，此时真宗的生母太宗李皇后健在，许多人认为：应虚位以待李太后升位。宰相请以符氏配享，奏说：“懿德皇后饗封大国，作配先朝，虽不及临御之期，且夙彰贤懿之美”。

（徐松《宋会要辑稿》）真宗批复说：“礼非天降地出，酌于人情。都省以懿德皇后虽位中宫，亦合配享先帝。恭依所请，庶叶从宜。”（徐松《宋会要辑稿》）至道三年十一月懿德皇后神主升祔太庙。此后，每到大祭，宋真宗称谓太宗为皇考、懿德皇后为皇妣，自称孝子。



懿德皇后究竟有何丰功伟绩，以至让赵家父子感激涕零，没齿不忘呢？那就是：“晋邸之建，实有内助之功。”此前，同为陈桥兵变的预谋者赵普身为宰相，足智多谋，积极维护皇位传嫡，与赵匡义结怨，阻碍了宋太宗的上位。成功地驱除赵普于中枢，将为赵匡义打开了一步登天的方便之门，开宝六年（973）赵普被陷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不久赵匡义被晋封为晋王，兼领开封府尹，掌控了京畿重地。懿德皇后从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能体现懿德皇后历史地位的评价，莫过于《宋史·乐志九》中所载皇后庙祀颂歌，其赞美懿德皇后的顺安词为：“王门稟庆，帝族惟贤。功存内治，德协静专。流芳图史，垂范紃埏。新庙有恤，祀礼昭然。”

赵德芳（959—981），宋太祖第四子。娶符彦卿孙女为夫人，有三子，赵惟叙、赵惟宪、赵惟能。其六世孙为南宋王朝孝宗皇帝，七世孙为南宋王朝光宗皇帝，八世孙为南宋王朝宁宗皇帝。

现有确切证明南康郡公赵惟能为卫国夫人符氏所出，其他不详。而卫国夫人符氏是符彦卿的亲孙女，宋太宗懿德皇后的侄女。

符氏一门三皇后一夫人，她们均处于统治者的最高层，为封建帝王家作出“功存内治，德协静专”的贡献。



司马牛与邱舆

王庆全



平邑县丰阳镇南埠庄村西，几段黄土夯筑的小城的古城墙虽经岁月侵蚀仍依稀可见。我们今天早已无缘领略小城昔日的繁荣风光，但小城却因为一位历史名人——司马牛而载入史册。

司马牛，孔子学生，亦称司马耕，姓司马，名耕，字子牛，春秋末年宋国人。生年不详。约卒于前481年后。据《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他是宋国贵族出身。兄弟四人，以他最小。其二哥司马桓魋势力最大。孔子周游列国途经宋国时，司马桓魋想加害孔子，结果逼得孔子“微服过宋”。司马牛反对他的几个哥哥在宋国作乱，为了与他们脱离关系，辞官奔齐。不久，司马桓魋失败奔齐。司马牛于是离齐奔吴，誓与兄不共事君。后来从吴国来到鲁国，成为孔子的学生。

孔子教育学生是“有教无类”，因人而宜的。对于同一问题，针对不同性格的学生，孔子会作出不同的回答。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再譬如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司马牛和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张一样，话特别多。不同的是，子张的性格随和，而司马牛的性格是“多言而躁”。据《论语·颜渊》记载，有一次司马牛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就根据司马牛的性格回答说：“仁者，其言也讱。”孔子借他提问的机会，叫他有话先存在心里忍一忍，不要一不顺心就火冒三丈。



司马牛虽然兄弟们很多，但是由于其兄司马桓魋作乱于宋，其他兄弟也参与其事，致使家族人等或死于其难，或逃散他方，大有败落之势，使司马牛产生了一种忧惧情绪，出现“司马牛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感叹。子夏安慰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为改变司马牛的忧惧情绪，所以当他向孔子问“君子”时，孔子就回答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现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和“四海之内皆兄弟”已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典故，丰富了中国汉语言内容。

司马牛是儒家学派的成员，当然具备儒家的基本思想。由于古籍记载很少，至于还有什么其他特点，不得而知。所以，总起来看，他对后世的影响不大。不过因为他是孔子的学生，他反对叛乱的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有好处，所以历代官府在倡导尊孔祭孔的同时，对他也给以封赐。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在祭孔的同时，也开始祭祀孔门弟子——当然司马牛也包括在内。唐代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被封为“向伯”，宋代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被加封为“楚丘侯”。可见后代官府对司马牛也是给予重视的。

据《左传·哀公十四年》“司马牛……卒于鲁郭门之外。阮氏葬诸邱舆”的记载，司马牛最后死在鲁国郭门之外，阮氏把他安葬在邱舆。杜预注曰“泰山（郡）南武城（县）西北有邱舆城。”清《山东通志》邱舆城“在（费）县西境80里。”结合《山东省志》、《兖州府志》、《费县志》、《平邑县志》等志书记载，经文化考古部门现场调查，今平邑县丰阳镇南埠庄村西的古城即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城邑邱舆。城址呈长方形，分内城、外城。内城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外城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50米。内外城墙均由黄土夯筑而成。现外城西南角残墙最高处约6米。内城现仅东城墙高出外城2米。城内陶片遍地，有红陶鼎、白陶鬲、蛋壳陶杯、残豆柄、板瓦、筒瓦、云纹瓦当等。出土器物年代，上自原始社会晚期龙山文化，下迄东汉，前后延续两三千年，说明邱舆历史上曾有过较长时期的繁荣。邱舆故城遗址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汉时期普遍实行郡县制，西汉初分别在今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村置南（武）城县，在今仲村镇临城村东，南、北昌乐庄之间置（南）武阳县之后，邱舆作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开始削弱。西汉末更始年间起源于莒县的樊崇赤眉起义和东汉末北方战乱以及齐鲁世族南迁对邱舆造成很大影响。唐贞观元年（627年），今平邑全境并入费县后，邱舆城逐步衰败，渐成废墟。宋代，人们于城东河边聚居成村，取名为埠庄，后分为南、北两个村，南村称为南埠庄。城西三个自然村分别叫城后、大城西和小城西，盖根据与邱舆城的方位关系而得名。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除研究司马牛儒家思想外，还可以从当时居民起名字时把牛和耕连在一起的情况可知，春秋时期鲁国已大量生产铁器并普遍使用牛耕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有了更多的产品剩余，这是人类社会进入一定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后，鲁国率先实行“初税亩”，中国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邱舆位于春秋鲁国疆域之中，距离孔子出生地曲阜尼山夫子洞直线距离约20公里，离孟子出生地邹城市城北的凫村约30公里，离宗圣曾子故里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不足20公里，处在鲁文化圈的中心区域中，当然带有浓厚的孔孟遗风。

清“乡饮介宾” 《执照》《司照》解读

凌东晓



2010年3月12日，临沭县凌山头村村民凌东涛修房时，拆出清代官府公文、民间契约一宗，共20余件，距今已有100余年历史，且保存完好。其中的两份《执照》、《司照》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发给凌云峰被推选为沂州府“乡饮介宾”的证明，即今日我们所说的荣誉证书。这是目前临沭县唯一发现的清“乡饮介宾”的《执照》、《司照》。两照是凌云峰身份的证明，也是清朝沂州府举行乡饮酒礼活动的铁证，是研究清朝沂州府儒学礼仪活动不可多得的史料，弥足珍贵。这两份《执照》、《司照》现在珍藏于临沭县档案局。

凌云峰是凌山头村凌氏宗族的第十九世，我和凌东涛等都是凌云峰的嫡玄孙，他是我们的共同高祖。解读这两份《执照》、《司照》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肩上。

为了便于解读《执照》、《司照》，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历史文化常识——乡饮酒礼。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制文化在儒家文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儒家礼制中，礼分为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等五礼。“乡饮酒礼”为嘉礼之一种。“乡饮酒礼”在我国已流传3000多年，明文可考至周代，《礼记》、《仪礼》、《吕氏春秋》均有“乡饮酒礼”方面的记载。源头是远古的一种民间活动，表达对老人的尊重。周代的“乡饮酒礼”成为以礼治国、以德化人的政治工具，且成为以后历代王朝



德治教化的表率。作为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官方礼仪活动，这种乡饮酒礼复兴于宋代，盛行于明清。经康熙、乾隆年间的不断改革、规范，终于达到了完善。

“乡饮酒礼”虽是地方性质的礼仪，但有着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与程序。

首先，这种以宴饮为形式的礼仪，要求各府、州、县行政长官代表朝廷亲自到场参加，作为主人，以表示对宴请宾客的尊重，同时彰显礼仪的隆重。

其次，被邀参加乡饮酒礼的嘉宾皆由本籍致仕（退休）官员或年高德劭、望重乡里者充任，诸宾统称乡饮宾。乡饮宾分为乡饮大宾、乡饮介宾和乡饮僎宾。诸宾都有严格的身份和名额限制。乾隆三年重新整饬乡饮图式坐席后明确规定，乡饮大宾一人，由致仕（退休）官员年老有德的人担任，龄德俱重；介宾数人，在士人中挑选，则重于学问德行；至于僎宾，则非常设之席位，本由公卿大夫之居乡者来助主人招待宾客的，或有或无，或来或不来，无常数，有则备，无则缺，视情况灵活而定，有时则用县丞、主簿充任。僎宾的品级可能高于主人，也可能低于主人，僎宾的到来是为主人捧场的。乡饮宾的人选由当地学官负责考察，并出具“宾约”，报知县（或知州、或知府）复核。复核通过后还要逐级上报，由藩台转呈巡抚，由抚院咨送礼部，由礼部呈皇帝批准。被皇帝批准为乡饮宾的人，朝廷都要赏给顶戴品级，地方政府除了按规定发给乡饮宾执照以为凭据外，还要赠送匾额以示祝贺。最后历届乡饮宾的姓名还会被载入地方史志，名垂青史。参加乡饮酒礼后的乡饮宾如果有违法犯罪的，则要详细逐级呈报，予以褫革（革除功名。明清时，生员等犯罪必先由学官褫革功名，然后才能动刑拷问），咨部除名，并追究原先考选、推荐之官员的法律责任。

乡饮酒礼于每年的正月十五与十月初一分别举行一次，其地点设在各府、州、县儒学之明伦堂。作为政府的宴请活动，当时的制度规定其经费必须由官钱（国库）中开支，坚决不允许向民间摊派。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森严的国家，对于乡饮酒礼，古人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礼制程序，对礼仪活动的人员设置、座次安排与物品陈设等都作出了严格、细致的规定。

首先，乡饮酒礼中，各地主正印官（或知县、或知州、或知府）要代表朝廷率领僚属做主人，宴请众宾；儒学教谕充任司正，主持乡饮酒礼的进行；典史充任执事官，管理由老成生员（秀才）充任的引赞、读律、司钟、司鼓等诸执事人员。

其次，座次安排要严格按照阴阳五行方位与长幼、尊卑关系进行。在乡饮酒礼中，主人与大宾象征天地，介宾僎宾则象征阴阳，三宾（大、介、僎）又象征日、月、星三光。不过，礼也与时俱进，清朝诸宾的座次与周朝的略有不同。诸宾之间，按年龄排座，主人（官员）按品级排座。礼仪中的各种物品陈设更是有着明确的规定。行礼中，从迎宾、升堂、入席、落座到读律、宴饮、礼毕、送客都有着十分详细的程序规定，以此保证整个仪式的庄严、隆重。

另外，在行乡饮酒礼过程中，除了上述涉及的人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司礼人员，这就是执掌觶（音zhì，古代的一种酒具）案的扬觶官，他负责监督在场每一位人员的一举一动，是否严格按照礼仪规制进行。不论宾主，如果有人在行礼过程中高声喧哗、坐错位置，或者出现其他违礼行为，扬觶官便会立即予以制止、纠正，同时“依礼扬觶以罚”（即罚酒），保证了乡饮酒礼始终能够符合“礼”的规范，有条不紊地进行。

总之，乡饮酒礼具有明显的社会教化特征，是官员与百姓、政府与民间的重要互动舞台。可以说乡饮酒礼集中包括了以孝亲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以尚德尚齿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乡饮酒礼的活动对于礼制的建设、社会的教化、人品的塑造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对乡饮酒礼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我们再来解读《执照》和《司照》，就比较容易了。

挺进东北

本 编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根据国民党政府试图发动内战的形势，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要求山东八路军主力挺进东北，新四军进驻山东。根据中央的部署，山东分局立即对山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由罗荣桓带领山东主力部队6万人和大批干部挺进东北。

从1945年10月上旬起，山东主力部队经陆（由冀东过长城）、海两路分三批挺进东北。第一批进入东北的沂蒙山区部队有滨海第一师、东北挺进纵队，第二批有滨海第二师、山东军区教导团，第三批有鲁中第三师、警三旅，共3万余人。到11月下旬，这些部队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这些为沂蒙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胜利之师又担负起发展东北的光荣使命。



临沂城人民欢送子弟兵挺进东北



鲁中军区部队奔赴东北



山东主力部队一部乘船渡海挺进东北



新四军三师经过沂蒙解放区奔赴东北

《王忞之墓志》与 《兰亭序》真伪之争

王炳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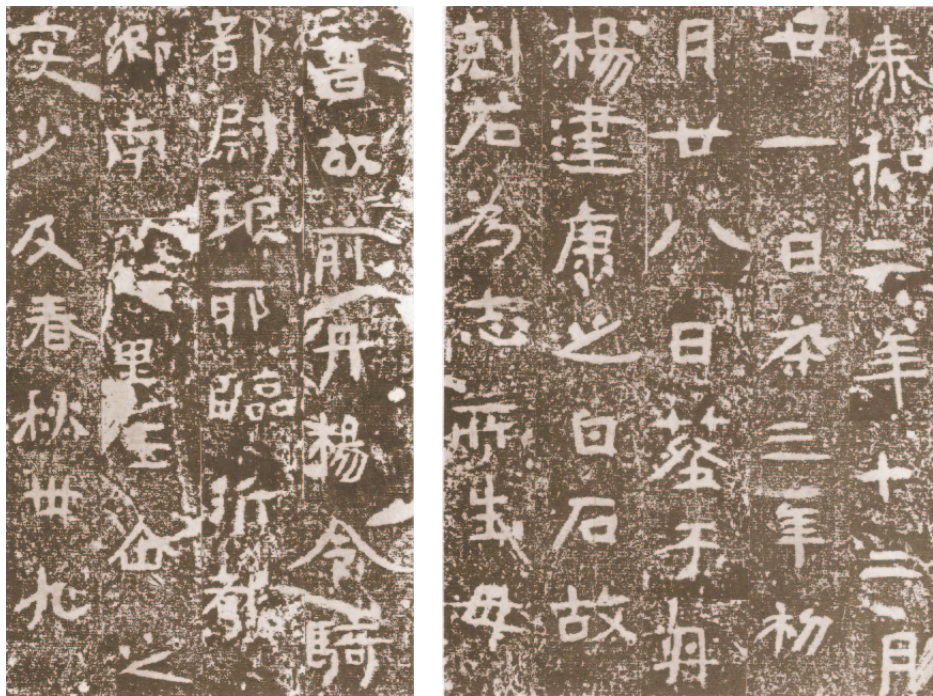
2003年秋，南京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北郊象山发掘了三座六朝时期东晋豪门王氏家族墓葬，出土一批以往东晋墓中从未发现的文物珍品。最可贵的是出土了三块极有艺术价值的墓志，是六朝墓志书法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为《兰亭序》书法真伪的大论争提供了新佐证——

这三座王氏家族墓葬位于南京象山南侧山坡，墓石距地表约10米。三座墓中均有墓志出土，可知8号墓主为东晋丹阳令、骑都尉王忞之，9号墓主为东晋振威将军王建之。其中王忞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堂兄弟。王忞之墓志共有88字，隶书体带楷意。

王忞之墓志铭文：晋故前丹杨令，骑都尉，琅邪临沂都乡南里，王忞之，字少及，春秋卅九，泰和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卒，三年初月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故刻石为志，所生母夏氏，妻曹氏，息女字媚荣，适庐江何释字祖庆，自男摹之，字敬道。

王建之墓志为隶书体带篆意。据考古专家介绍：象山乃东晋初年尚书仆射王彬家族墓地。王彬为王羲之的叔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京象山王彬家族墓地先后发掘7座墓葬，其中在7号墓葬发现王羲之的堂兄弟王兴之墓志引发了著名书法家高二适与我国文史学界权威郭沫若影响全国的“兰亭论辩”，论辩的焦点之一是东晋时期是否已有楷书：王忞之、王建之墓志的出土对深入研究探索六朝书法及中国书法的演变有着重要意义。客观上支持了高二适的基本论点。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郭沫若就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帖《兰亭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从而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令世人注目。郭老学识渊博，中外闻名，他较喜欢立新论，做史学上的翻案文章，如为曹操、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翻案等。立一家新说，自无可。1965年初，郭老在从《王敦谢鲲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提出：经过他的研究考证，一直被认为是王羲之代表作的《兰亭序》帖乃是隋代僧人智永的托名伪作。此文在《光明日报》刊出后，引起文史学界乃至日本、韩国汉学界的广泛关注，赞成者有，反对者更有。我国不少专家学者不同意郭文的结论，认为过于主观武断，但又缺乏公开撰文与郭沫若论争的勇气。独有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先生写出专文《〈兰



《王岱之墓志》局部

亭序》帖的真伪驳议》，引证多种史料，对郭文进行逐条批驳。

高二适，江苏东台人，1903年生，初读乡塾，1910年来南京，师从清末金陵诗坛七子之一、名学者顾云，攻研国文、书法。20世纪30年代初他已有些名气，集诗人学者书法家于一身，曾任国民政府侨委会主席陈树人的秘书。他擅长草书，功力不凡，其书法狂放恣肆，自具一格，受到许多名流书法家的推崇。高二适治学严谨，为人耿介，重操守，性格倔强，勇于坚持客观真理，勇于探索。他不顾友人们的劝告，请他早年的业师章士钊先生把文稿转呈毛泽东主席过目，以求得到公正对待。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饶有兴趣地关注这场学术争论，他特为此写信给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应当允许争论，允许不同看法存在。这样，高二适的文章才得以于1965年6月刊登在《光明日报》“文史哲”版，又一次引起文史学界乃至广大文史爱好者的关注。二个月后，《文物》杂志又影印发表了毛主席的信和高二适的文章。（近年有文章披露毛泽东当年实际上赞同郭沫若的观点，而高二适未因卷入论争而招祸实乃一幸事）郭沫若保持了一个时期的沉默。1972年，郭沫若又在《文物》杂志撰文《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此文新旧话重提，再一次用不少篇幅谈及《兰亭序》帖，仍认为这千古名帖必定是假的。那时正值文革时期，人们噤若寒蝉。但高二适仍不服气，又在南京家中写出《〈兰亭序〉帖真伪之再驳议》，欲继续争鸣，却无法刊登。一年后，他又完成一本《〈兰亭序〉帖论辩》，共11万字，但根本不可能出版。在那时代背景下，这场论争不了了之。几年后，高二适和郭沫若也相继作古。

近些年来，围绕《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还时有人撰文争鸣，似乎肯定《兰亭序》帖是书圣王羲之真迹的看法占上风。其实在六年前，于南京北郊郭家山发现的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名臣高崧墓志，其隶楷书体已引起书法界一些人士的关注，王岱之、王建之墓志的出土更进一步说明了问题。这无疑是很意义的事情。

日军侵华文献： 华北治安战肃正讨伐的一般要诀

大好河山

一、敌潜伏方法及对之搜索要点

敌潜伏方法虽巧妙，但不断地注意其细微的征兆和动向，同时通过对俘虏和居民的讯问，即可搜索到敌人。现将搜索敌人的注意事项列举如下：

（一）敌干部、县政府要人等，一般避开市镇和交通方便的大村，带领少量部下潜伏在偏僻的农户中，通常选择村边的房舍。

（二）敌情报员、工作人员都持有良民证，即便在皇军驻扎地附近也敢公开装成良民活动。

（三）武装匪团在同一地点，最多停留一天，在我方空隙中活动。白天多分散行动，预先定好汇合地点，时间等，准时集合。夜间则采取部队行动。

（四）敌遭我军攻击、扫荡，搜索确定无法逃走时，通常扮成农民，携带农具就地假装劳动，如不能伪装时，便潜入房内、仓库、草堆、沟渠等或躺在床上装做病人。居民怕有后患，多不敢举报。

（五）在我部队实施夜袭时，应及时派出密探、斥候等。潜入村庄从高处了望，以便发现敌人，如发现村内有灯光和喧闹之处，多半是敌军潜伏的据点。

（六）敌人往往通过收买和强迫良民，加入其户籍，还有潜入治安机关，充当职员或勤杂工，甚至还有就任乡保长等职。

（七）在县公所、公安局、自卫团、庙宇、学校、旅馆、村落附近的地隙、谷地、穴洞，民房以及房屋内的顶棚，井内，夹道等，往往有敌军伪装良民潜伏其中。

二、敌根据地设施位置及设备要领

（一）敌人平时就有计划地使群众作好“空室清野”的准备，一旦发现日军要进行扫荡时便及时将武器、被服、粮秣等各种物资，以巧妙的方法隐藏在极难发现的地方或运到偏僻的地方，以此避免我方的扫荡剔抉。

敌人占领的地方，即兵营、训练所、学校、医院或各级司令部、行政公署以及其他有重要设施的村庄，必定隐藏有武器、被服、粮秣、药材、日用品等。但隐藏地点很少在明显的建筑物内。一般是避开村庄，选在山脊、谷

民国时期的华北地区指位于中国北部的区域。泛指秦岭——淮河线以北，长城以南的中国的广大区域，包括山东。日军侵入中国后，沿用了这一地理概念，为此还成立了华北方面军，控制这一地区。驻屯山东的日军部队为华北方面军所属第二军。

此文选自日本防卫厅战史编辑室《华北治安战肃正讨伐的一般要诀》。这份文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编者

地等来往不便的独立房屋，或有两三间房舍的荒废小村，或在离开村庄一定距离的田地以及森林，洞穴等处。

但村庄外的隐藏地点附近，通常有比较明显的目标作标记，另外，附近常有小孩、老人进行监视。

（二）敌人在战斗中发生死亡时，通常让民兵或民工收回战死者的武器，于战斗结束后归还，如收回和携带武器逃走有困难，便责成附近的村长和有势力的人代为隐藏。遭到日军突然攻击，不能分散逃走时，便依靠当地自卫团，或者送到指定村庄隐藏。

三、敌根据地设施的侦察要领

（一）敌人潜伏及隐藏的方法，要贯彻到每一士兵，使之彻底掌握。

（二）为了审讯俘虏及居民，必须有多数的翻译和优秀的侦探同行，让他们参与审讯。在战场上的审讯，要通过巧妙的方法，迅速进行审讯，使之迅速招供。在释放时可带到其他地点作适当处理。敌人和附近居民是息息相通的，敌人巧妙的藏匿地点，居民必定是知道的。

（三）检查假坟或者梯田边缘等地点时，每人应携带铁通条（直径一厘米，长一米）。

（四）妥善部署扫荡搜索，要无遗漏的地按计划实行。为此，行动时要按规模编成搜索班（轻装），明确指示任务和目标，即便在行军中也应随时进行搜索。

扫荡、搜索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不论有无敌情，应经常对周围严加警戒，禁止单独行动。过去对此放松警惕，而遭敌人袭击或挂雷、地雷杀伤的，不在少数。

（2）对指定的村庄进行攻击后，是否立即进行搜索扫荡，要根据情况而定。但在攻击村庄时首先应尽量搜索俘虏和找出村内有权势的人物，进行指导宣抚怀柔等工作，设法使村民自动提供隐藏地点。

（3）攻击村庄后，将残留的村民全体集合到一处，首先进行服装检查，找出有权势的人物。然后根据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搜索。此时要让集合的村民在原地不动，仅携带提供情报的人进行搜索。搜索时与保安队等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合作最为有利，另外在冲入村庄进行搜索时，一定要对屋内残留的村民（特别是男人）。进行严密的服装检查，然后进行搜索。

（4）利用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的协助，发挥其敏感性，效果极大，但绝对不应使其单独活动。如无日军监视，往往会发生抢掠行为。这样会严重危害与扫荡有密切关系的宣抚，政治，经济工作。

（5）为了发现隐藏的地点，除进行周密细致的搜索外，运用所谓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利用各种征兆的实例，从略）

四、民匪分离的要领

扎根群众，善于掌握民心的共军，与一般民众很难分辨，尤其在敌人的根据地内更为困难。现将以前实行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手段介绍如下：

（一）长期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突然或连续使之操练军队的各种动作，就能区别出是否军人。例如：

（1）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谈话或休息时，出其不意的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判明是一般群众还是共军。

（2）凡是听到别人谈话，就有起立或站立习惯的，不是党员就是地方干部。

（3）早晨突然吹共军的起床号，根据其反应可以识破。

（二）进行身体检查，根据其肌肉发达状况可以辨别。例如，共产党员的肌肉是平均发达的；而士兵肩膀上有扛枪的茧，脚上通常也有；农民的腕部，小货商的肩部特别发



达。

还有根据日晒程度来辨别，农民通常赤膊劳动，日晒较为严重，党员和士兵比他们皮肤稍白，尤其是脖子，日晒部分和无日晒部分区别明显。然而，最近共产党员普遍参加“大生产运动”，所以经常也晒得较黑，手上也有老茧，应加注意。

（三）根据审讯及简单的谈话得以辨别：

（1）询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元某年”而说不说民国某年者，多数是受过教育者，党员嫌疑极大。

（2）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对答如流，但转问有关党内事项时，则默不做声者居多。另外，询问是否为党员时，党员多显示出兴奋过度，并强调不是党员的理由。

（3）利用审讯、谈话的机会，给以纸烟和其他物品，试验其对物品的“共有观念”。党员由于共产意识浓厚，如给纸烟，往往分给他人，并且在吃饭时也有让人而不争先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观念淡泊，有的面对审问人员往往也毫不客气的索要纸烟。

（四）根据服装的辨别方法：

（1）化装便衣人员的服装，不合身的居多，有的穿用一般农民穿不起的袜子，还有的有上身是便衣，而下身还是军用品的不协调状况。

（2）穿着便衣的人员，多数衣服不合体。还有脏的地方与一般民众的情况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沾有不是当地的土。

（3）被服一般较当地民众为好，并且较清洁，衣服上纽扣通常齐全。

（五）根据携带物品辨别的方法：

（1）仅靠良民证是非常不可靠的，特别是在敌占区内，敌人平常都有所准备，有良民证的反而是可疑的人。可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其指纹，中国人一般不关心指纹的重要性，故可借此判明。

（2）敌人尤其是情报人员，常携带自行车。

（3）一般干部携带金钱较多，另外还携带有仁丹，牙粉等生活品。

（六）其他：

（1）在拘留地点内，安插自己人与新来的匪民同住，秘密观察其言行，往往能有重大收获。

（2）在匪民混淆时，频繁观察，窥视被审者表情或偷看其眼光者，有党员或干部嫌疑。

（3）打听儿童，辨明是否真正村民，或是某人亲戚。可疑人物如称某人为熟人时，可将可疑者和起熟人分开，个别询问双方家属的情况，进行对证。

（4）党员往往在言行中故意表现得特别亲日或有恐怖态度。

姓氏百家漫谈——周姓 (中)

赵丹峰

唐及五代时期，周昉、周文矩因擅作仕女图而驰名画苑。相继任越州、宣州长史的周昉，在为官之余精心于画作，其内容多表现贵族妇人优游闲佚的生活，所画人物线条流畅，衣褶劲简，雍容华贵，略带哀愁之状。唐德宗李适闻其名，遂下诏命他绘章敬寺壁画。其创绘的“水月观音”颇具民族风韵，对当时与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少雕塑者亦加仿效，称之为“周家样”。周文矩为五代时南唐画苑翰林待诏，其创作题材与周昉相同；绘画风格亦与周昉接近，但比周昉下笔更显纤细，多用曲折战掣的笔法（即“战笔”）表现衣纹，使所画人物愈加传神，故明人张丑评其“行笔瘦破战掣”，其画风从后主李煜书法中来。他在兜率宫所作壁画《慈氏像》时大胆创新，将印度原本中的男像，画成丰肌明眸的唐人女像，神采飘逸，优雅动人，受到时人与后世的称誉。

宋元时期，在学术和文学领域，出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周氏名人。大凡熟悉中国古代思想哲学史的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相鸣放的时代，汉代是经学大盛的时代，唐代是佛学东渐后普及中国的时代，宋代以降，则是理学成为国之正统的时代。而被誉为理学开山鼻祖者，正是北宋时的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周敦颐继承《易传》、《中庸》和道教思想，依托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提出了一个简单而系统的宇宙构成论，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遂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而变



周敦颐画像

化无穷”。圣人又仿“太极”而建立“人极”。所谓“人极”即是“诚”，“诚”乃至纯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方可达到这一境界。他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与研究课题。在政治上，周敦颐继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思想，提出了“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的主张。其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后人将其编为《周子全书》。周敦颐不仅是一位哲学大师，而且还是一位散文圣手。他的《爱莲说》即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世美文。文中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作者通过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的热情赞扬，寄托了崇尚高洁正直、不随人俯仰的高尚情操与人生追求。此文问世后，莲花便成为国人心目中坚贞不渝、洁身自爱的美好象征，同时亦成为画家和诗人寄情明志的重要创作题材。

周邦彦是北宋末期代表性诗人。其词作音律严谨，语言典丽，被后来格律派词人视为宗师，旧时评论家称其为“词家之冠”。因其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与身世之感，亦有咏物之作，故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他于青年时期初旅汴京时写下的《苏幕遮》词，即颇具代表性：“燎沉香，消溽暑。乌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诗中，作者以传神之笔活画出了夏日雨后初晴时荷叶迎风挺举的美姿，令人神目疏爽。继而又神驰故国，由汴京的荷塘追忆其江南故乡的芙蓉浦（亦即荷塘），抒发一种撩人情愫的淡淡乡愁。纵观全诗，虽有哀愁点点，但乃不失疏朗轻快的基调。此词被广为传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该词评价甚高，称赞周邦彦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周邦彦还为后世留下不少美词佳句，因受篇幅所囿，只能列举上述一首，与读者同赏共飨。

周密是一位身跨宋、元两朝的著名诗人。在南宋时任义乌令。颇有民族风骨的他，入元之后决不再仕，隐居临安，以保存故国文献为己任。在《齐天乐·蝉》中，作者借咏夏日之蝉转而咏秋之寒蛩，以凝练苍凉的笔触，抒发了自己对已亡故国的怀念依恋之情和宋忘后无所依托的愤怨心境：“……伤情念别，是几度斜阳，几回残月。转眼西风，一襟幽恨向谁说？……凄凄切切，渐迤迤黄昏，砌蛩相接。露洗余悲，暮烟声更咽。”周密并非是一位婉约派诗人，他在仕宋时写下的《闻鹊喜·吴山观涛》，抒发的则是另外一种豪迈情调：“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鳌戴雪山龙起蛰，快风吹海立。……白鸟明边帆影直，隔江闻夜笛。”导致作者出现反差巨大的两种心境与诗风，关键点是由于山河沦陷、江山易帜所造成的。

周德清系元代著名音韵学家。他根据当时北曲用韵，于泰定元年（1324年）撰成《中原音韵》一书。该书作为北音韵书的创始，不仅为日后明、清曲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形成与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历史文献。

明清两代，周姓亦累出名人贤士。周忱系明代前期大臣、著名经济改革家。宣德五年（1430年），他受杨荣荐举，出任工部右侍郎，继而奉敕巡抚江南。历经宣宗、英宗两朝，先后任户部和工部尚书，在江南巡抚长达20年，有诸多重大建树。周忱有经世之才，在巡抚江南时，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于宣德八年创造并推行的平米法。当时江南地区的田赋负担极不平均，客观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周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江南地区的实际情况，适时创造实行了平米法：对科则重的田土派轻粮，缴纳折色、轻赍，使其负担减轻；对科则轻的派重粮，缴纳本色，使负担增重。又将官民田地所纳耗米划一征收。科则轻重还用纳耗调剂。所收溢额耗米存仓，以便来年减征。周忱还创设水次仓，由农民直接交纳，官为监收，以杜绝粮长贮粮私家为奸作弊。又置济农仓，储粮以备荒年。他还与苏州知府况钟奏请朝廷减免重赋。其间，他组织民众疏浚吴淞江，以增渔舟之

利。周忱的上述创建与举措，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使江浙一带呈现出民不扰而赢有余的富足祥和局面。

周京系明代著名文学家。山东沂州（今临沂市）人，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乡试（省试）第三名。翌年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一名。遂授吏部清吏司主事。万历四十六年，他奉皇帝之命持节册封朱识鋐为肃王，后又册封过开化王。因奔走万里而不辱君命，加二级。周京工诗，著有《金城集》、《吴越游稿》和《贲园草》等。亦擅书法，尤以行书见长。所书《重修石河广济桥碑》笔法遒健潇洒，被后人拓印作为摹仿的字帖。此碑现收藏于临沂市博物馆。

周臣与周之冕为明代著名画家。周臣擅画山水，其笔法严整，布局稳健，所作山水画，峰峦峻峻，山石坚凝。大画家唐伯虎、仇英等均出自其门下。周之冕擅画花鸟，其首创的钩花点叶法，丰富了中国花鸟画的表现手法。

周济与周之琦皆系清代嘉庆进士出身的词人。周济为常州词派的重要词论家，被誉为该派殿军。论词推崇周邦彦，强调作品应通过隐约迷离的手法，以画景而寓情，抒发身世之感和家国之忧。周之琦先后任刑部右侍郎和广西巡抚等要职。为官之余，善填词赋诗，并辑有《心日斋十六家词选》传世。所作《好事近·纸鸢》词是其代表作之一：“片羽又青云，摇扬半天春色。莫羡儿童牵引，怕东风无力。微茫纤纆系虚空，远影定谁识？偏是绿杨烟外，有流莺窥得。”此词生动形象，富有寓意，不愧为历代题咏风筝诗词中的佳作。

近现代以来，一批周氏贤达为了民族的复兴、中华的崛起和国家的富强，奋进拼搏、矢志不渝，在诸多领域均有重大建树。提起“五四”运动以来的周氏名人，一位豪眉慧目、和蔼可亲的面庞便会迅速浮现在亿万人民的脑海里，他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一代伟人周恩来。周恩来是前面记述的宋代哲学家、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裔。据《绍兴县志姓氏编》和有关周氏谱牒记载，周敦颐的九世孙是周澳，传至第二十一代时，便是周恩来这一辈。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古称会稽），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所以无论是在南开学校的毕业文凭或是赴欧留学的证件上，其所填籍贯均是浙江绍兴。周恩来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自1919年“五四”运动始，至1976年逝世，在其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和心血，立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

1924年8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军事部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任上，他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与政工干部。从1924年至1927的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共培养出一万余名毕业生，仅在黄埔第一期600余名毕业生中，即有共产党员110人，其中80人是入校后发展的。这些人日后均成为中共最早发动武装起义和开展军事斗争的中坚力量。周恩来在此期的重大贡献，并不仅在于他作为军校政治部主任，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军事指挥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的一个不为多数人所知晓的特殊贡献，是于1924年冬亲手创建了由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从名义上看，这支拥员130人的特殊部队，应该是保卫孙中山的贴身卫队，其实不然。这个番号是周恩来向孙中山要来的，只是对外便于掩护身份使用的。这支部队是由黄埔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周士第（后为解放军开国上将）等人为骨干，加上一批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所组成的，其经费和武器由苏联顾问帮助解决，完全听从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与指挥，从未去过大元帅府执勤。这支由周士第任队长的“铁甲车队”（并未配铁甲车，只有步枪、机关枪和手枪等）成立不久，即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开赴至广宁县，在彭湃领导下，打击地方土豪武装，保护农民运动。翌年11月，经周恩来与时任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军长的李济深商定，从李处要到一个“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的番号，由周士第领导的“铁甲车队”和前不久成立的飞机掩护队为基础，加上从湖南、广西一带招募的工农群众，组成了一支规模为2100余人的正规军队，其军官均系由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挺被任命为该团团长。不久，该团即改称第四军独立团，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叶挺独立团”。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后，该团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被誉为“铁军”。此后该团规模迅速扩大，遂一分为五，扩建为第二十四、第二十五两个师计五个团，总兵力达8000余人，后从中抽出一批骨干，新建成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专门负责警卫武汉国民政府，时称国府警卫团，该团日后成为中共领导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坚决主张反击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行径，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势力。他作为代理中央常委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于同年8月1日，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使共产党人从此走上了独立建军的武装革命道路。通过以上史实，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中共建军第一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国统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在中共六大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这期间，周恩来还作出了一项鲜为人知的特殊贡献，即直接组织和领导了党的密战情报与保卫工作。为了开展情报工作，周恩来于1928年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培训了李强等一批无线电编译人才，并创建了中共第一部电台，同时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后来，周恩来又将部分人员送去苏联进行专业培训。回国后，这批在斗争中造就的堪称国内顶尖的电译情报专家，日后被周恩来派往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中，成为红军通过破译敌人密码电报而获取重大绝密情报的“千里眼”与“顺风耳”。这批由周恩来培养的红色密电专家在日后的万里长征中，破译敌人军事电报的成功率竟达到百分之百。红军在长征途中，之所以没有遭到一次国民党军队的大的包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红军指挥中枢通过成功破译敌军的军事电报，在提前知晓对方军队调动与兵力部署的情况下，对前进方向作了避开敌军主力的及时调整，从而使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的预谋一次次落空。甩开了敌人重兵追堵的红军，最终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右二）与邓小平（右一）、彭雪枫（右三）在太行山区。

翻越雪山、涉过草地，胜利达到了陕北。作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最高领导，周恩来在上海创建并实践的密战工作与人才培养，竟在七年后的长征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实在令人感叹与敬佩。他的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与特殊贡献，在中共领袖们之中是独一无二的。

说到周恩来在党内所起的特殊作用与贡献，还应提及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此事发生于红军长征前夕，且与毛泽东有关。在过去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曾流传着一个说法，即红军在即将进行长征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并不想带毛泽东走，而是想让他留在苏区。对于这个问题，经过党史界这些年来的查证与研究，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即不是博古不想让毛泽东走，而是毛泽东本人给博古写了一封信，主动要求自己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毛泽东在信中说，他与红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交换过意见，他们都同意留下来与他一起坚持斗争。他要求将红九军团的一个师亦留下来，共同在苏区坚持斗争。最后，他在信中表示，欢迎中央再回来。有史家分析，毛泽东之所以不想走，其主要原因，一是毛泽东不想与上海来的中央诸领导在一起，这些人来到苏区后，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很快，由于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以毛泽东的倔强性格，他不想再与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共事，所以他主动提出来留下不走；二是当时撤离中央苏区叫战略转移，并不叫长征。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领导人，谁也没有想到离开瑞金中央苏区后，就会一去而不返了，更未想到会走二万五千里路程。当时中央最初的战略目标是去湘鄂西与贺龙、萧克领导的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故这次转移行动开始时亦称之为“西征”；三是毛泽东当时对蒋介石要一举拿下中央苏区的决心有所低估，因为前几次“围剿”行动结束后，国民党的大部队很快就撤走了。以上就是在中央决定暂时撤离中央苏区时，毛泽东主动要求留下来的大致原因。是谁最终劝说毛泽东终于跟着中央和红军主力一起走的呢？这个人就是时任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当博古拿着毛泽东的信找周恩来看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当天，周恩来策马从瑞金赶赴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长谈了一个晚上。是夜，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谁都不知晓。翌日晨，周恩来骑马返回瑞金，见到博古后，也还是只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句话。试想：如果周恩来不做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坚持留在苏区，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那些后来留在苏区的领导人，如瞿秋白、贺昌、刘伯坚等均纷纷牺牲了，少数能够活下来的亦都是九死一生，如陈毅，当时在苏区辗转的他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有其诗可以为证：“南国风云二十年，断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那将会是一种什么结果的长征？那还会有日后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吗？中国共产党还会在1949年就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政权稳坐江山吗？这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苦斗！今天再回首长征前夕那个特殊的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的那次特殊谈话，其对中国革命命运的决定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周恩来作为中共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其非凡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在1935年1月于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习称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上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调整中央领导人员结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会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周恩来被确定为对重大军事决策最后下决心者（即组长）。会后，他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国共两党化敌为友，再次合作共同抗日，是周恩来为中华民族所作的又一个历史性贡献。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实行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与瞩目，



周恩来在西柏坡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事变持否定态度；南京的顽固派扬言要举重兵进攻西北“平叛”；中共高层中的部分领导人亦认为应趁此除掉蒋介石，以解十年内战中受其杀戮迫害之恨。在此关键时刻，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审时度势，认为应抓住这一历史先机，冷静分析，避害趋利，顺势而为。周恩来与张闻天持相同观点与主张。经过及时的思想沟通，终于在党内高层形成了逼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此后，周恩来于危难之际，接受张、杨两将军的邀请，作为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赶赴西安，充当国民党内部纠纷的调停人。周恩来基于对当时国内复杂局势的清醒认识，提出了保蒋安全，促其抗日的调解方针。周恩来与蒋介石当年在创办黄埔军校共事时，一个为校长，一个为政治部主任，双方合作尚属融洽，蒋介石多次对人说过：周恩来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后因蒋介石反共，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的革命局面，两人才分道扬镳，走上了对抗的道路。此次周恩来不计前嫌，风尘仆仆前来充当调解人，使身陷困境的蒋介石的心灵受到了触动，经过周恩来的努力，蒋介石最终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口头承诺。很快，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开始不断接触，商谈共同抗日的大计。此时的周恩来，遂担当起了作为中共首席代表，与国民党、蒋介石先后两次在庐山、一次在南京进行会晤。由于十年内战所形成的裂痕和怨恨心结，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围绕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安排问题，会谈一度陷入僵局。但终因周恩来的卓有成效的斡旋努力，加之侵华日军步步紧逼和全民要求一致对外共赴国难的呼声日高，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1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亦于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自此，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开始正式形成。此后，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常驻重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带领国统区内的广大爱国阶层和民主人士，为抗战献策出力；同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破坏抗战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并多次找蒋介石本人面谈或抗议，从而使国共两党在整个抗战期间，基本保持了斗而不破、共同抗日的合作局面，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抗战结束，这期间，周恩来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在中共党内，是任何人所无法代替的。

在解放战争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与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有力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全国各战场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同时领导和指挥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了对国民党宣战的第二战场；筹备召开政协首次会议等，可谓功勋卓著。



冷家女儿心最热

——感受冷飞燕

刘凤才

她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近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被誉为“提灯女神”和“伤员天使”；每年5月12日的国际护士节，就是为了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而南丁格尔之所以能够获得全世界如此之高的崇敬与尊重，是因为她对护理专业、对所有的伤员，怀有一颗最热情最真诚的心。

她叫冷飞燕，是临沂市人民医院外科护士长兼胸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全国优质护理服务考核优秀个人”，“临沂市十佳优秀护士”，曾当选为“大义临沂人”；她所在的胸外科病房，是国家卫生部优质护理服务考核示范病房，山东省医疗质量示范科室。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绩与荣誉，也是因为她同南丁格尔一样，对护理专业与所有患者，怀有一颗最热忱最真挚的心。

热泪长流忆父尊

笔者与冷飞燕是初次见面。只见她身着重孝，面容憔悴，神情哀楚。出于礼貌与尊重，笔者十分谨慎地问她是何人带孝。不料冷飞燕尚未作答，两行热泪已经夺眶而出，欲罢不



能，让人不由跟着唏嘘不已。

原来她的父亲20多天前刚刚因病去世，还没出“五七”。话题也就从她的父亲开始。从此，只要一言及父亲两个字，冷飞燕的眼泪就立即象断线珍珠，语音哽咽，由此可感受到她与父亲之间超乎一般的浓厚父女之情，也可以看出她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护理专家，还是一个孝女。父亲一年前得了脑出血，经过精心治疗，特别是有一位精通护理的女儿的悉心照顾，老人慢慢得到了康复。父亲住在兄长家，冷飞燕工作再忙再累，都坚持经常去看望照料父亲；就在老人病故的前一天，她还专门给父亲送去了尿不湿，为他洗了脚，服侍老人休息后才回到自己的家。不料夜间老人突发急性心梗，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没有能够挽回老人的生命。为此，冷飞燕还后悔不已，自我埋怨。

她说：“父亲是我这一辈子最热爱最崇敬最不能忘记的人，不仅生了我养了我，而且是我人生最优秀的老师。他一辈子就知道为别人做好事、行善事，教会我做怎样的人、怎样做人，他的一言一行我都忘不了，他永远活在我这个女儿的心中。”

冷飞燕是苍山县神山镇青竹村人。父母都是老党员，纯朴善良，积极进步。她说，父亲的一生，可以用仁慈、忠孝、无私、正直来概括。他原来是铁路工人，吃“国库”、拿工资，乡亲羡慕，百姓眼馋。可是后来，只是因为爷爷奶奶年事高了，身体欠佳，身边需要人伺候，父亲是个大孝子，长年在外工作，心中对老人总是放心不下。为了尽一个儿子的孝心和义务，他毅然辞去了公职，回家服侍二老，心甘情愿地当了农民。父亲在公家干过工作，见过世面，他的品行和为人又使乡亲们十分敬重与推崇，回家不久便被选为村支部书记，一干就是若干年。他对乡亲们一片热心肠，尽其所能，为大家排忧解难。

而给冷飞燕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父亲的无私公正，耿直无介。在她只有几岁、刚有记忆的时候，有一次村里秋收分庄稼，有个人依仗自己儿子多、家庭势力大，无是生非，故意找茬，埋怨队里分给他家的东西少，找到父亲大吵大闹。父亲秉公办事，坚决执行按劳分配，就是不同意给他家多分配。

父亲识字不多，但深知人要有学问、有修养、有品德的重要性，对孩子们要求十分严格，不论儿子女儿，都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明事理，长本事，益社会。

1982年，冷飞燕考入了当时的益都卫校，学习护理专业，开始了她的“走向南丁格尔之旅”。那时，农村学生生活仍然十分困难。母亲常年操持家务，辛苦劳累，患了慢性支气管炎。每次回家，看到母亲又劳累又痛苦的样子，冷飞燕一边忍着眼泪，一边暗下决心，自己一定拼上命好好学习，将来报效所有的母亲。她品行兼优，一直担任班干部，每次考试成绩都拿100分。有一次，她一门功课考了98分，心中十分愧疚自责，晚上记日记，一连质问了自己若干个“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又成了她更加努力学习的强大动力与鞭策。

1985年，冷飞燕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临沂地区人民医院五官科病房做护理。她谦虚好学，工作积极，服务热情，份内的工作认真干，份外的事情主动干，承担了许多其他任务，经常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高度评价，1994年就被提拔为副护士长，后来又被提升为护士长、大外科护士长，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职责。经过20多年坚持不懈的学习与勤奋刻苦的实践，她成为了沂蒙山区最优秀、最突出的南丁格尔式的护理专家之一。

热衷本职善创新

临床护理工作中，静脉留置针和PICC使用、长期化疗给药等，往往导致静脉炎，注射处静脉红肿疼痛发炎，给患者造成了极大痛苦，也影响了治疗，是临床护理工作中最常见的问题，也是让护理人员与医生们挠头的难题。有一次，一位患者化疗后出现了上述情

况，疼得夜夜不能入睡，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备受煎熬。医生与患者多次请教了北京的专家，采纳他们的措施，虽经治疗，但效果都不理想。面对这一难题，冷飞燕冥思苦想，忽然从中医药上受到了启发。她想，我国的著名中药云南白药有活血化瘀通络、消炎祛肿止痛的功效，而白酒在民间一般又常作为“药引子”使用，如果以酒精调和云南白药，湿敷在患处，对静脉炎可能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果然，在对病人使用这一方法后，很快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她将此法使用到多位患者身上，屡屡见效，终于解决了静脉炎这一长期困扰护理工作的难题，深受广大病人及家属的欢迎。

这一技术也推广到了治疗其他疾病上。一位患者因长期肩部、臀部注射，造成肩、臀部肌肉发炎红肿硬结，不堪疼痛，找到科主任治疗，因一时也没更好的办法，患者只得准备去济南进行手术。当主任很遗憾地目送患者走到冷飞燕工作的病房时，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冷飞燕的发明，既然可以治疗静脉炎，也可以用在肌肉发炎上吧？他随即叫停患者，找到了冷飞燕询问。因为本技术原来是治疗静脉炎的，能否治疗肌肉发炎，冷飞燕不敢保证，建议先在其肩部进行试用。没想到只用了一次，到第二天患者的肩部肌肉就明显软化消肿，疼痛大为减轻；于是肩臀同时用药，只一星期后，患者痊愈，大喜过望，感激无比，当时就拿出一沓钱来，向冷飞燕表示谢意并作为报酬。冷飞燕婉言谢绝，患者硬是把钱塞到冷飞燕的手中，后来她灵机一动，让患者回来拿敷药的棉棒回家后用。患者欢天喜地地回去后，才发现冷飞燕把钱藏在棉棒包中，原封不动地退给了他。

有一次，新生儿科的同事们找到冷飞燕求助。原来是她们在给一个新生儿头皮注射后，发生了渗透感染，头皮发炎变黑，孩子又哭又闹，家长心疼如焚。科里找了烧伤科、小儿科会诊，不少同事认为头皮已经坏死，要手术植皮。后来，有人又想起了冷飞燕，请她来用云南白药加酒精湿敷法治疗，很快解决了问题。新生儿科的同事们不无感激地说：“冷护士长，您可算得上是我们的救星呀！”

“云南白药加酒精湿敷治疗静脉炎的临床研究”取得明显成效，被市里列为正式医学科研课题，并获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论文发表在全国护理专业最权威的《中华护理》杂志上，得到广泛认可与推广。该杂志相当权威，也相当苛刻，不炒剩饭，不拾人牙慧，只发表有创新、有突破的最新护理科研成果。能有一项成果于此发表，已是很大成绩与震动，而冷飞燕还有新的成果又登上了这个“象牙之塔”，在此处梅开三度——《冷冻治疗胸壁窦道的临床研究》和《机械通气患者肠内营养同时胃肠减压对吸入性肺炎的研究》，这在院里和业内是十分罕见的。

“冷冻治疗胸壁窦道的临床研究”课题，是她协同胸外科孙立阳主任医师研究创造的。患者胸部外科手术后，一般都会在胸部留下10多厘米长的伤口，有的伤口感染后长期不能愈合，并形成了“窦道”，采用常规治疗方法难以治愈，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也成了医护工作中的难题。孙立阳主任医师研究发明了用冷冻治疗窦道的器械和方法，获得了冷飞燕护士长的鼎力相助与紧密配合，使这一技术在临床应用并推广。这项科研项目，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在希腊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几年前，上海一位患者因胸部手术后形成窦道，跑遍了上海的各大医院，皆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后来，她从网上看到了孙立阳主任医师与冷飞燕护士长的冷冻疗法，专程从上海赶来治疗并获得痊愈，深表谢意，满意而归。

在人们对医疗职业的传统印象中，医生诊治是最重要的，而护理专业则只是遵从医嘱，按医生要求为病人打针服药，热情对待病人，就是一个好护士，专业上难有自己的特别表现，技术上难有自己的突破创新。但是冷飞燕认为，治疗疾病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就像一条完整的链条，诊治与护理，环环相扣，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关系治疗的全过程与最终效果，古人说“三分治，七分护”，就说明了护理的重要性。而且护理作为一门专业，有自己独特的知识范畴与技术要求，也面临许多需要研究与突破的难关与课题，同诊

断治疗一样，同样能够研究创新，同样能出新的成果，为病人治疗康复带来福祉。这既是专业发展的要求，也是一个护理人员的责任。让冷飞燕印象颇深、倍受感动的是，有些从北京请来的大专家，在为病人进行手术后，都对护理人员双手合十，以感谢她们并连声拜托，足见他们对护理工作与护理人员的重视与尊重，这更激发了冷飞燕不断提高专业能力与水平的自觉性与责任感。

为了丰富与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冷飞燕不但注重临床实践，积累丰富经验，而且十分注重知识的再学习。上世纪90年代，在医学院校中，还没有设置护理专科。1995年，中央电大设置了医学护理专业。为了抓住这次学习的大好时机，参加好成人高考，她把两岁多的孩子送到婆婆家，白天集中精力认真工作，下班后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头钻进被服室，悄悄地关自己的“禁闭”，悬梁刺股，埋头苦读。苦寒过后梅花放，当时全院几十个报考者只录取了八九名，而冷飞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也是全院第一批考入护理专科的。成人高等教育不脱产，她上班为病人，下班带孩子，更要抽出时间来学习功课，如此坚持了三年。其后，她又参加自学护理本科学习毕业，在山大研究生课程班结业。所有这些，使她的基础知识更加雄厚扎实。医院评定中级职称时，她在理论考试、公开答辩、民主测评当中，项项都以优秀晋级。而护理专业要晋升到副高级职称，是一件尤其困难的事情，冷飞燕也以自己的独特科研成果与专业水平，出类拔萃，顺利晋升。

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她更是认真负责，而且特别善于发现问题，善于钻研，开动脑筋，深入问一个为什么，多问几个怎么办。在护理上，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问题，在她的心里，就是值得研究与重视的事情；束手无策、无计可施的事情，在她的手中，往往就有了新的妙招，就能手到病除。

胸外科收治的不少患者是肿瘤病人。如食管癌患者，在手术前要置胃管、术后连接负压引流器，把胃液引流出来，既为胃减压也用以观察病情。但是在临床中，冷飞燕发现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与要求，有些患者插管时很顺利，但就是引不出胃液。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急性胃扩张，造成患者生命危险。冷飞燕经过反复思考与研究，终于悟出了问题：很可能是传统教科书上的操作规程与实际情况有些偏差。教科书上讲胃插管胃要求下管45—55公分。而冷飞燕却发现，这个深度在有的患者身上，只能刚刚插到贲门以下，根本达不到胃的底部，如果患者胃液不足，也就无法将胃内容物引流出来，而要插到胃底，一般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下插8公分左右。于是，她据此进行了《机械通气患者肠内营养同时胃肠减压对吸入性肺炎的研究》，也发表于《中华护理》杂志上。

这些年来，冷飞燕先后在国家级、省级杂志上发表论文20余篇。她的专业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评价、认可与推广。最近，滨州医学院专门聘任她为本院护理专业研究生导师，基本条件是导师必须有自己的研究课题，而冷飞燕绰绰有余，这在市人民医院护理专业上，属于首例。多年来，她指导和培养护士、进修人员、大中专实习生2000余人，使她们成为护理技术的骨干力量。

热诚满腔对病人

“你就像燕子一样，给我们送来春天的温暖”，这是一位富于情感表达的患者对冷飞燕的诗意赞扬。从走上工作岗位，冷飞燕对所有患者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始终怀着一颗爱心，付出满腔热情，全心全意地搞好服务。

2010年秋天，胸外科收治了一名特殊的车祸患者，是个属于“三无”（无名、无钱、无陪人）的街头流浪人员。当时肇事司机驾车逃逸，110民警把他送到了胸外科。其时，患者衣衫褴褛，满身污垢，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时间就是生命！冷飞燕和同事们不顾一切，马上对其进行心电监护、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快速输液

输血，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有序的抢救，监护仪上显示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一个生命从死亡的边缘上被拉了回来。这时，冷飞燕已经精疲力尽，她顾不上休息，又立即找来脸盆和毛巾为患者擦洗身体。其后，她一边安排医护人员轮流看护患者，一边通过多种方式寻找联系他的家人。经过精心护理，患者神志逐渐清醒，但细心的冷飞燕发现患者精神不太好。她想，患者多年流浪在外，一定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于是，在对他护理时格外细心，并经常同他拉家常，引导他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出院时还给他买了新衣、新鞋和回家的车票。这位患者临走时在病房里转了又转，看了又看，依依不舍，眼睛里饱含泪水，目光里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山西护理研究》也是很有影响的护理专业杂志之一。该杂志的一期封面，选用的是冷飞燕与同事们教术后患者用吹气球的方法锻炼恢复肺功能，十分生动。早在十几年前，她就告诉术后患者可以用吹气球的办法来锻炼恢复肺的呼吸功能，但是除了过年过节、庆典活动，平常日子，市场与商店里哪有专门卖气球的？有些患者亲属跑很多地方也买不到，只好放弃这项锻炼。了解到这种情况，冷飞燕和同事们专门跑到西郊小商品市场，批发来一大包气球，免费赠给患者。科里没有这项开支，她就用平时卖些包装、废纸等积攒下来的钱解决经费问题。她还自购绢制的“静心”花瓶，摆放在病人床头，温馨地提示患者“既来之，则安之”，稳定患者情绪，积极配合治疗。所有这些，都让广大患者体会到了家一样的温暖与关爱，既十分高兴，又十分感动。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0多年来，冷飞燕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为贫困患者送过营养品、生日蛋糕、衣物和现金；记不清有多少次毫不犹豫地带上手套，用手抠出患者的粪便；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深夜里赶回医院抢救危急患者……

冷飞燕不仅自己坚持和践行高尚医德，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整个团队，并且把医术与医德紧密结合统一起来，创造和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团队的模式与方法。她提出了“每人每天每事，尽心尽力尽责；服务只有起点，满意没有终点”的口号，做成提示牌子，随时随地提醒大家，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了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她建立了“陪人座谈会”，定时或随时与患者陪护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要求他们做到应知就会，耐心细致地为他们讲解为什么这样护理，以取得病人与陪护的理解与配合。她还通过组织护理人员开展“天使风采大赛”、“岗位技术能手比赛”等活动，激励工作热情，提升整体技能。早在1996年，她就在全院率先实施了系统化整体护理。2005年，她又在全院率先开展了专业化陪护病房，制定了“四有”（入院有人接，在院有人管，检查有人陪，困难有人帮），“四主动”（主动介绍自己、主治医生、护士、主任、护士长，主动介绍病房环境，主动介绍与疾病相关的健康教育知识，主动回答患者问题），“六规范”（规范病房管理、收费项目、礼貌用语、各项操作流程、着装与行为、征求患者意见）的整套工作规范与要求。在全院每年进行的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中，胸外科病房年年名列前茅，众口皆碑，成了全院的标杆，也成了市院优质护理服务新项目的试验示范基地。院里先后开展的护理新课题，像“整体化护理”、“专业陪护病房”等，都从胸外科病房开始。2007年，胸外科病房获得全省首批“省级护理服务示范病房”称号。

2010年，国家卫生部在全国医院系统开展了以“夯实基础护理，提供满意服务”为主题的“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在医院召开的全院示范工程动员大会上，冷飞燕代表胸外科第一个报了名，申请成为第一批试点病房。她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做到人人参与，争取个个达标。教育引导大家转变“重专业、轻基础，重技术、轻服务”的观念，改变工作模式及排班方式，落实整体护理。制定了胸外科基础护理操作流程，将基础护理做到位、做细致，达到“六洁四无”的要求。实行“包床到护、责任到人”，完善了各班、各组、各人职责、流程及标准；设计并实施了床旁护理执行单，挂到病人床尾，向社



会公开、让病人监督，用打勾的形式记录各项基础护理的执行落实情况。设计并实施了患者满意度调查表，征求每一位出院病人的意见和建议，对存在的问题查找原因，提出整改措施，等等。所有这些，都真正实现了为病人提供全程、无缝隙的护理服务，护理人员心中时刻装着病人，病人心里有护士，既提高了护理质量又改善了护患之间的关系，同时，护士的自我价值得到体现，达到了护士满意、病人满意的目的。她既率先士卒，又对每个人员的工作随时随地进行及时认真的检查督促，使全科基础护理进一步规范，服务态度更加良好，病人满意度进一步提高。通过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病人满意度均在99%以上，病人的意见本变成了表扬本，收到的感谢信和锦旗数是往年的5倍。

作为临沂市人民医院第一批“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试点病房，经受了国家、省、市三级严格的检查验收。在最后评比中，既要评出先进集体，也要评出先进个人。按惯例和做法，为了照顾平衡，先进集体与个人一般会分别授予不同的单位，不会同时集中到一个单位。而冷飞燕个人和她的团队，双双获得了这一荣誉，足见工作之过硬，成绩之突出，让人信服、折服。至今，冷飞燕及胸外科病房创造的许多经验，已在本院及全市护理专业中广泛推广。

多年来，冷飞燕还曾先后获得“市级优秀护士”、“全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个人”、“市直三八红旗手”、“市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医院先进工作者、优秀带教老师、技术操作能手、学习型先进个人、优秀组织工作者、巾帼建功标兵、医德医风与廉洁自律十佳医务工作者等众多荣誉称号。她所带领的胸外科病房还曾先后获得过“省级医疗质量示范科室”，两次“市级青年文明号”、院内优秀护理团队、最佳管理科室等若干荣誉。但是，冷飞燕继续坚定地秉承“服务只有起点，满意没有终点”的座右铭，把过去所有的荣誉与成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用对护理事业的满腔热忱，对广大患者的满腔热情，向着其所追求的“南丁格尔式”目标，不断地开拓进取。

冷家女儿的一颗赤心，永远都是最热的。



“翻译女神” 杨梅

高雪萍



杨梅（左二）随彭丽媛出访韩国

近日，跟随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访韩国的朝语翻译杨梅在网上受到追捧，网络流传的杨梅担任彭丽媛赴韩随行翻译的照片，让许多同学、校友纷纷点赞，不少山东大学、临沂一中的低年级毕业生更是亲切称她“杨梅学姐”，并在人人网、朋友圈里分享。因其出众的外貌和气质，杨梅被网友们称赞为“翻译女神”。

1989年在临沂出生的杨梅，曾先后就读于临沂第二实验小学、美澳国际学校和临沂一中，2007年考入山大外国语学院学习朝鲜语，后考入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2011级亚非语言文学读研。毕业后考入外交部工作。

杨梅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回忆，当时杨梅所在的班级是2004级2班，杨梅曾在班里担任学生干部。“杨梅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是个成熟、稳重、大气的小姑娘，平时很热心，对于班级的工作完成得很及时，高中三年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而且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在老师的印象中，杨梅的



杨梅（中）
高中毕业合影

语言表达能力很好，课上回答问题很积极。

杨梅高中前两年的班主任老师对同样她印象深刻。“虽然时间过去了好多年，但老师们对她印象都很深。”杨梅活泼但不张扬，内敛但不内向，不仅老师们喜欢，同学们也都非常喜欢她。“当时杨梅的成绩在班里一直保持在前五名，成绩稳定，自律意识很强，因为善于交流和沟通，好多同学都想和杨梅做同桌。”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杨梅在才艺方面也是非常优秀，在音乐及演讲方面尤其突出。作为业余爱好，早在初中时期她便已通过钢琴十级考试。高中时的班歌比赛，杨梅既作词又作曲，给班集体争得了荣誉。

据杨梅的班主任老师介绍，在杨梅高一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场演讲比赛，当时杨梅是最后一位参赛选手，因为比赛接近尾声，评委们基本确定好了一二三等奖，工作人员也在一旁写好了获奖证书。当最后一名选手杨梅上台后，无论从演讲内容还是语言表达及形象风度上，杨梅的表现超过了在其之前的所有参赛选手，获得了所有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评委们经过商讨决定，特意给杨梅评定了一项“特等奖”。

王自祥是杨梅高中时候的年级主任，尽管当时班级比较多，但对于杨梅的情况，他依然记忆犹新。“在高考之前的2007年年初，成绩优秀的杨梅和同年级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小语种考试，有的同学因为偏科等其他问题没有考好，而杨梅和另外一位同学通过了考试。最终，杨梅被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朝鲜语系提前录取。”说起这次考试，王自祥在自豪的同时略有些遗憾，“当时杨梅的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如果正常参加高考，我觉得考个北大或者清华应该都没问题。”

在高二时杨梅曾在《教育导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知荣而行 知耻而止》的文章，很多和杨梅同一年级的同学提起杨梅，还会记得这篇文章。作为一名高二的学生，能够以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提出“知荣知耻”的论题，通过列举历史上知耻报国的仁人志士，并从正反两方面联系身边的人和事，发出“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号召。文章选材精当，引用古人名言贴切，观点鲜明，思路流畅清晰。表现了她驾驭语言的不俗技巧和极强的文学素养。

“认真学好专业知识，在活动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懂得劳逸结合，用微笑面对一切。”杨梅曾经用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总结自己的大学生活，而在这



样简单的一句话背后却是一段光彩夺目的历程。

在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朝鲜语系读本科时，杨梅在课堂上表现活跃。其写作、演讲也很出色，由于其开朗大方的性格，赢得了同学和老师一致的好评。曾获得学校一等奖学金，还在课余时间参加了省里的韩语歌曲大赛。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研期间，她担任外语学院2011级研究生大班长、研究生会勤工助学部部长，并且是对外经贸大学第三届研究生代表大会委员。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学校一等奖学金以及优秀研究生干部一等奖学金。

杨梅认为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学习在大学生活中应是头等重要的，同时大学也是培养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最佳时期。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参加校园、社会活动，广交朋友，努力提升各方面能力。专业为韩语的她在本科期间曾两次公派到韩国交流学习，同时她还参加了不少文艺比赛。

她参加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网络歌手大赛获得人气奖，加入韩国学生访华团志愿者行列，从这些活动中她收获颇丰。其中收获最多、印象最深的就是做韩国学生访华团志愿者的活动。在与韩国学生的交流中，她发现原来两国看似交往密切，但实际上又有很多的隔阂。“交流是一件很有意思又神圣的一件事。人与人如此，国家与国家如此。所以当时找工作的时候才一心想选择这种关于交流的工作。”她如是说。

对于选择参加国考，杨梅坦言这其实是没报很多希望。但是良好的心态、优秀的专业能力和应试技巧使她成功脱颖而出，获得了外交部的工作。对于求职，杨梅认为求职应该先认识自我，确定目标，然后认真准备，但更重要的是摆正心态。要利用身边的资源，同时同学之间要合作、沟通，信息共享后，大家的机会就都增多了。

“尽小者大，积微者著”是杨梅的座右铭。坚持、心态是她成功的秘诀，正如她曾经给自己的评价：“旅途似石路，不乏艰难险阻，相信不断提高立身之能、学习处世之道的我，定能变石路为花径，收获一路芬芳”。杨梅就是这样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完善自身的综合素质，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相信，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杨梅能够继续尽小、积微，收获一路芬芳。



生活中的杨梅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出版发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之际，一部全方位、多角度，真实全面记述沂蒙革命根据地历史面貌的大型史料性著述——《沂蒙革命根据地志》由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沂蒙革命根据地位于山东省中南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建的著名革命根据地之一。在长达12年的峥嵘岁月里，山东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一直转战在沂蒙地区，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也转战在这里。刘少奇、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张云逸、谭震林、罗炳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工作过。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洒遍了革命先辈的热血，留下了革命先辈战斗的足迹。党政军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为劳苦大众的翻身，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重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为铭记革命历史，更好地继承党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弘扬沂蒙精神，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志书的形式，由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承编，历时四年，六易其稿，终成此书。中共临沂市委书记、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名誉主任张少军，临沂市市长、市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先运为志书作序。副市长、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赵爱华亲自审阅志稿。

全志分上下两册，记述时限上起1921年7月1日，下迄1949年9月30日。记事区域范围，以鲁中、鲁南、滨海三个中心区为主，亦兼及相关连地区，基本上涵盖了原临沂地区的13个县市。志书体例采用条目体，按入志内容设卷。志首设概述，以下分列十卷，另设附录。全书240多万字，史料图片1000余幅。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出版问

世，不仅填补了沂蒙革命根据地没有专门志书的历史空白，而且为人们铭记和研究沂蒙革命根据地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同时还是山东省内第一个出版此类志书的城市。

●市史志办贯彻落实全省史志工作电视会议精神。6月5日，全省史志工作电视会议结束后，临沂市史志办接着召开领导班子成员会议，研究贯彻落实电视会议精神的计划与具体措施。在充分领会此次会议精神，特别是副省长王随莲讲话中对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史志工作的四点意见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临沂市史志工作实际，研究确定了切实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意见与措施。一是要加快《临沂市志》的编纂进度，近期工作重点是对仍未完成供稿任务的单位，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采取领导协调、上门指导等多种方式，进行督促和指导，尽快完成撰稿任务，力争年内全面完成市志组稿任务；二是要根据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关于做好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的意见》要求，采取各县区重点镇先行一步的方式逐步展开村志、镇志的编修工作；三是要在做好《临沂年鉴》每年一部编纂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提升质量、丰富形式等方式挖掘年鉴更大的实用价值；四是要通过拓展方志馆建设成果、提升沂蒙史志官方微信建设、优化完善市情网资源等途径，进一步提升史志工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能力；五是要学习先进地市的史志工作经验，通过实地交流学习等方式拓展工作视野与思路。

●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到“第一书记”任职村指导工作。6月16日，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副主任段洪到市史志办选派“第一书记”任职村费县费城街道泉子山社区指导工作。朱海涛一行实地查看了社区办公场所，参加了农村新型社区污水

处理设施竣工运行仪式，在听取选派“第一书记”工作组任职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和规划后，就推动任职社区发展进行了深入座谈。朱海涛对驻村工作组近期开展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于近期带领市史志办班子成员到村现场办公。

●临沭县史志办贯彻落实全省史志工作电视会议精神。6月10日，临沭县史志办召开专题会议，就学习贯彻落实全省史志工作电视会议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一是做好《临沭县志（1986~2007）》出版工作。二是做好《临沭年鉴》编纂工作。同时启动《临沭年鉴2014》编纂。三是进一步拓展村镇志书的编纂领域，在具备条件的白旆镇和曹庄镇朱村，启动《白旆镇志》《朱村村志》的编修工作，并对编修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指导。四是加强临沭地情网站、地情资料库的建设维护工作，优化栏目结构，及时更新史志工作动态，确保时效性，提高网站的实用性和吸引力。积极争取领导支持，抓好县方志馆建设。

●平邑县地情网站升级改版。6月下旬，平邑县地情网站完成改版升级，网址：www.mswb.gov.cn。改版后的平邑县地情网设大事记、县情概括、物产风情、历史文化、人物、曾子、魅力平邑等特色栏目，突出反映平邑地情地貌和平邑史志事业的发展变化，为社会各界认识平邑、了解平邑的史志事业提供了一个窗口平台。